

總第 25

JULY 2026

在野黨<sup>TM</sup>  
Opposition Party  
Freedom, Truth, Resistance



# OPPOSITION PARTY

策劃：毛慶祥

火種不滅，精神長存

海內外民主實踐與觀察

網址：[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The greatness of a n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its moral character can best be judged by how it  
treats its people*

中國民主黨主辦

## 七月小記

七月裏，天氣很熱，世事也不涼快。

有人在聯合國門前點燃自己，有人在海邊紀念劉曉波，也有人還在追問一場洪水、一個孩子為何没能活下來，以及那些照例沒有下文的事情。事情一多，看客便嫌煩了。

世人最愛勸人“向前看”。這句話原沒有錯，祇是有些人說“向前看”，其實是叫人不要回頭。死人既不會開口，活人又肯忘記，事情便算過去了，大家也都省心。

中國人是很會省心的。

災禍若落在別人家，便叫新聞；落在自己家，才叫命運。別人坐牢，可以說他不識時務；別人自焚，可以說他過于激烈；連別人家的孩子死了，也總能換來一句輕飄飄的“節哀順變”。這樣一來，天下雖天天出事，日子倒也天天照常。

祇是世上總有幾個不肯照常過的人。

他們留下照片，寫下名字，站在街頭，說幾句不大中聽的話。所做的事未必驚天動地，却也不肯讓該忘的人忘得太舒服。

一本刊物能做的，其實不多。

不過是在衆人急着趕路的時候，稍稍停一停；在大家都說事情已經過去的時候，再追問一句：

當真過去了嗎？

火總是會熄的。

祇是有人還記得。

胡海寧  
2026年7月25日



|                                        |    |                                             |
|----------------------------------------|----|---------------------------------------------|
| 開篇<br>Prologue                         | 01 | 目錄<br>Preface                               |
| 02                                     | 03 | 05                                          |
| 在野黨簡介<br>Contents                      |    |                                             |
| 思想火種<br>The seed of ideas              |    |                                             |
| 05-06                                  |    | 人物專訪<br>Voices of Change                    |
| 07-10                                  |    | 民主火種<br>The Spark of Democracy              |
| 真相中國<br>Truth China                    | 11 |                                             |
| 11-25                                  |    | 時事評論<br>Current Affairs Commentary          |
| 26-45                                  |    | 社會評論<br>Social Commentary                   |
| 民運之路<br>The Road to Democracy Activism | 46 |                                             |
| 46-56                                  |    | 民運之聲<br>Voice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
| 57-73                                  |    | 民運行動<br>Democratic action                   |
| 74-76                                  |    | 民運風采<br>Portrait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
| 77-78                                  |    | 民運同道<br>Fellow Democracy Activists          |
| 連載<br>Serial                           | 79 |                                             |
| 79-87                                  |    | 作品連載<br>Serialized Works                    |
| 檔案館<br>Archives                        | 88 |                                             |
| 88-91                                  |    | 迫害實錄<br>Persecution Records                 |
| 92-94                                  |    | 中國記憶<br>Chinese Memory                      |
| 雜誌社介紹<br>About the Magazine            | 95 |                                             |

## 《在野党》简介

《在野党》杂志是中国民主党组党时期唯一的党刊，以传播中国的民主、人权等理念为宗旨，成立于 1998 年 9 月。《在野党》由毛庆祥先生倡议，并在中国浙江省创办，浙江筹委会成员轮值各期的编撰。出刊至第 9 期后，绝大多数成员被抓，刊物由聂敏之、陈树庆、王荣清继续出刊至第 11 期，因聂敏之等人被抓而停刊。

但民主火种一直未灭，在历经 27 年之久，在毛庆祥、谢长发、朱虞夫和郑存柱等海内外中国民主党人的共同努力下，期刊于 2025 年 6 月 25 日在美国洛杉矶成功复刊。它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延续前辈的精神火炬。

复刊《在野党》杂志分为《思想火种》、《真相中国》、《民运之路》、《视频专栏》、《作品连载》、《档案馆》等内容模块，设有官方网站 <https://www.zyd1998.com>，并于每月 25 日刊出电子期刊，纸质期刊会同步发布，敬请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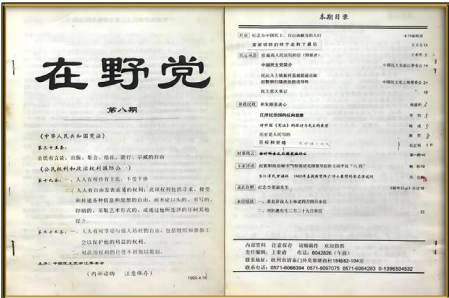
### 主要成员介绍：

**毛庆祥**（1950 年 5 月 24 日），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新《在野党》杂志的发起者。浙江杭州人，自由撰稿人、人权活动家。1976 年“四·五运动”参与者，被关押三个月；1978 年起投身杭州民主墙运动，担任《四五》、《华东》等民刊编辑，1981 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1998 年积极筹建中国民主党，主编党刊《在野党》。1999 年 6 月被捕，11 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直至 2007 年 9 月 14 日刑满获释。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朱虞夫**（1954 年 2 月 1 日），现任《在野党》杂志总编辑。浙江杭州人，诗人、异议作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1978 年底投入杭州民主墙运动，是发起人之一，主编《四五》月刊，并多次被传唤、抄家。1989 年“六四”因“参与动乱”被收容审查，撤职；1998 年积极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并于当年 11 月当选为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1999 年 6 月 19 日被捕，9 月 15 日正式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06 年 9 月 15 日出狱。出狱后仍持续民主运动，2007 年再次被捕判刑二年、剥夺权二年；2011 年因“茉莉花运动”被捕。判刑七年、剥权三年，累计服刑达 16 年。出狱后仍被严密监控，直至胃癌晚期出境治疗，目前居住在美国。

**谢长发**（1951 年 10 月 7 日），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主席，是复刊《在野党》杂志的倡议人。湖南望城县坪塘镇人，民主异议人士。1989 年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任“工自联”领袖，六四后坚持公开谴责当局暴行，被判劳动教养两年。1998 年与潘明栋等筹建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屡次遭拘留；自 2002 年起坚持定期聚会，联系各地民运人士并资助经济困难者。2005 年撰写《中国民主党宣言》、《昭告海外同胞书》等文，并筹划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008 年因批评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再度被捕，2009 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 13 年。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郑存柱**（1967 年），现任《在野党》杂志社社长。安徽合肥人，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企业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党员、海外党部高层人士。1989 年六四期间发起合肥学生运动，组织发起安徽省高校自治联合会并率学生赴京声援，是安徽省与政府谈判的学生代表之一。2000 年在上海秘密参加中国民主党，2006 年在美国洛杉矶建立海外联合总部，历任全国联合总部副秘书长及副主席、主席等职务。



图为《在野党》第八期

## 组织框架介绍:

总编辑: 朱虞夫 社长: 郑存柱 出品人: 景辉辰

荣誉主编 (目前均居住在中国大陆): 毛庆祥、谢长发、胡石根、陈西、吕耿松、查建国、陈树庆、许万平、刘贤斌、胡明君、黄燕明

《在野党》设副总编辑、副社长、轮值总编辑、副主编、编辑部、责任编辑部、美编部、信息技术部、采访部、翻译部、收稿部、校对部、宣传与发行部等职能部门和行政部、财政部、外联部、人权观察部等综合部门, 并设有日本分社, 成员多为中国民主党的海外新生力量。



图为《在野党》复刊第十二期杂志社部分成员 - 洛杉矶

## Introduction to The Opposition Party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founded in September 1998 as the only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during its formative years. Initiated in Zhejiang by Mao Qingxiang, with members of the Zhejia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editing in rotation, the journal was dedicated to advancing the values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 By its ninth issue, most of its editors had been arrested; even so, Nie Minzhi, Chen Shuqing, and Wang Rongqing continued until the eleventh issue, when further arrests forced it into silence. For years, the publication remained a symbol of democratic aspiration and the sacrifices borne by its founders.

After twenty-seven years, the flame was reignited. On June 25, 2025,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veteran leaders Mao Qingxiang, Xie Changfa, Zhu Yufu, and Zheng Cunzhu, together with a new generation of overseas activists,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successfully revived in Los Angeles. Its reappearance not only honors those who endured prison and repression but also reaffirms the commitment to record truth, preserve memory, and carry forward the ideals of freedom and human dignity.

The renewed The Opposition Party is published monthly, in both digital and print editions, with sections such as Seeds of Thought, China Unveiled, Paths of the Movement, Video Columns, Serialized Works, and Archives. It maintains an official website a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As a platform for dissent, it seeks to amplify voices silenced inside China, to link the efforts of activis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o ensure that the struggles of past and present are neither erased nor forgotten. Above all, it stands as both a witness to history and a torch for the future, sustaining the spirit of opposition through changing tim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我爱的是这个国家，不是某一个政党

——专访徐光：四年绝食、三十余年坚持

采访记者：贾嘉 王海霞 沈美花

## 人物简介

徐光，浙江杭州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创始成员之一，1989年杭州学生民主运动参与者。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期间，他在杭州武林广场参加了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行动。此后三十余年来，他持续关注民主、法治及公民权利议题，多次因参与相关活动受到拘留、监视和判刑。1999年，徐光由于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2022年，徐光因纪念“六四”被指控犯有“寻衅滋事罪”判处四年有期徒刑。自被捕即音讯全无，至亲也无法知道他的任何下落。服刑期间，他长期以绝食方式表达抗议。据亲友介绍，他曾长期依靠鼻饲维持生命，身体一度极度消瘦。2026年5月19日刑满出狱时，体重仅约90斤，出狱照片在海外广泛传播，引发众多朋友和关注者的关切，从而使拍摄者毛庆祥被抓并拘留半个月，徐光本人也被警方带走，失踪至“六四”以后回家。经过短暂休养，目前徐光体重已恢复至115斤左右，精神状态明显改善。近日，《在野党》记者贾嘉通过视频连线，对徐光进行了出狱后的首次深度专访。

“看到他的第一眼，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距离徐光出狱，已经过去两个多月。出狱当天流传出来的一张照片，让很多关心他的人久久不能平静。照片中的他，脸颊深陷，身体瘦得几乎脱形，站立时甚至需要依靠支撑。很多熟悉他的朋友第一眼甚至没有认出来。为徐光的安全，我们没有第一时间联系采访，而是希望他先把身体养好。直到这一天，视频终于接通。屏幕里的徐光穿着一件浅色上衣，虽然依然清瘦，但气色比出狱时好了许多，讲话声音平稳，精神状态也恢复不少。寒暄之后，我们问出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记者贾嘉：“徐老师，您好。我们一直都很牵挂您的身体，看到您刚出狱时的照片，很多海外朋友都非常揪心。这段时间恢复得怎么样？”

徐光笑了笑。“刚出来的时候只有90斤，现在恢复到115、116斤左右了。”

听到这个数字，我们终于放下了心。他说，恢复得快，很重要的原因是自己的心态一直比较平静。“出来以后，睡得着，吃得下，所以恢复得比较快。”

1989年，一次绝食改变了一生

很多人知道徐光，是因为他几十年来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但他说，年轻时的自己，并不是一个热衷政治的人。“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喜欢自由生活的人，喜欢过自己的小日子。国家那么大，我觉得一个普通人能做什么？”

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

杭州武林广场，也聚集了许多声援北京的学生。每天，北京学生绝食、被送往医院抢救的消息不断传来。他说，那些画面深深触动了自己。“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放在那里。我如果还只想着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心里真的过意不去。”

于是，他来到武林广场，也加入了绝食。他说，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爱这个国家，希望它越来越好。”在他看来，那不仅仅是一次社会运动。也是自己人生方向的开始。那场对学生和市民的大屠杀深深震撼了徐光，“从那以后，为国家、为民族、为自由、为民主，这些理念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四年绝食，真正支撑我的不是意志，而是信念

谈到狱中的四年绝食，很多人都想知道，他究竟靠什么坚持下来，记者问：“做出一个决定已经不容易，坚持四年，更难。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您？”

徐光沉默片刻。随后缓缓说道：“首先，我认为，我不是为了我自己。”他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也不是为了家庭，而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如果我是为了我自己，我早就不会坚持了。”

他说，每当身体因为长期绝食而承受巨大痛苦的时候，他都会不断提醒自己：“我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在承受这些苦难。”“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反而感觉不到那么痛苦了。”他说，真正能够支撑自己坚持下来的，是信念，而不是单纯的意志力。

“最难的时候，我总会想起1989年的年轻人”

采访中，徐光讲述了一段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话。他说，每当自己觉得身体和精神都快支撑不住的时候，脑海里总会浮现1989年那些年轻人的身影。“他们很多人才二十岁左右。”“没有经历过人生，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没有未来。”

而自己已经结婚、生子，也经历过人生。他说：“跟他们相比，我已经很幸运了。”每次想到这里，他都会告诉自己：“他们都能够付出生命，我还有什么苦不能吃？”他说，很多次，自己就是这样挺过来的。

“国家，不是某一个政党的国家”

采访中，我们问了一个很多人都会思考的问题。长

期遭受打压，会不会怀疑自己的坚持？

徐光认真地回答：“国家，不是某一个政党的国家。”他说，在自己的理解中：国家属于人民。不是属于政府。更不是属于某一个领导人。“我爱的，是这个国家，是中国人民，是养育我的这片土地。”他说，这一点，几十年来从未改变。“所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初心。”

采访尾声

采访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就在我们准备继续聊下去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了家人的声音。徐光笑着说：“我太太叫我了，下次再聊吧。”我们相约改日继续采访。

屏幕关闭后，我久久没有离开电脑。采访中，徐光谈得最多的，并不是自己在监狱里遭遇了什么，而是1989年、国家、人民、自由、民主，以及支撑他一路走来的信念。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他的选择，对他而言，这些信念构成了他人生的重要部分。

附录 | 徐光狱中诗作

据了解，服刑期间，徐光坚持阅读、思考，并创作了多首诗歌。以下两首诗创作于2024年，是他狱中作品的一部分。

《为国为民争民主》 作于2024年9月9日

为国为民争民主  
飘零半世心不空  
西子湖头有三忠  
为国为民呕心血  
慷慨就义赴从容  
仁爱博爱皆大爱  
自由民主普世同  
奋斗百年误歧路  
正本清源终成功

《一寸自由一寸血》 作于2024年9月14日

一寸自由一寸血  
敬天保民根自泥  
砥砺前行心不迷  
自强不息五千载  
厚德载物三万里  
弃德报怨应巨变  
误入歧途俄为师  
一寸自由一寸血  
誓争民主志不移

编辑：赵杰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采访记者：贾嘉、王海燕、沈美花与民主前辈徐光视频采访中

### *Interview with Xu Guang: Four Years of Hunger Strike and Three Decades of Persistence - "I Love This Country, Not Any Political Party"*

*Xu Guang, a Hangzhou native and founding member of the Zhejiang Committee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participated in the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in Hangzhou.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he has remained active on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and civil rights. In 1999, he was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in prison for helping establish the party. In 2022, he was sentenced to four years for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 after commemorating the June Fourth massacre.*

*During his latest imprisonment, Xu used hunger strikes to protest. Relatives said he was kept alive through nasogastric tube feeding and became severely emaciated. When released on May 19, 2026, he weighed about 45 kilograms. A photograph showing his frail condition circulated overseas and caused concern. After recovering, his weight increased to about 57 kilograms, and his health and spirits improved.*

*In his in-depth interview after release, Xu said his political awakening began in 1989, when he joined a hunger strike at Hangzhou's Wulin Square in solidarity with students in Beijing. He said the movement redirected his life and rooted in him a commitment to freedom and democracy.*

*Xu said conviction, rather than willpower alone, sustained him. At his weakest moments, he remembered the young people killed in 1989 and told himself that, unlike many of them, he had lived to marry, raise a family, and experience adulthood.*

*Despite repeated imprisonment and surveillance, Xu said he never abandoned his belief: "A country does not belong to one political party. I love this country, its people, and the land that raised m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极权主义现象之三：形式主义泛滥

作者：张兴贵

一切极权国家，总是文山会海、指导多、考察多、培训多、出差多，原因何在？想象一下，一台永不熄火的巨型绞肉机，它不是为了生产任何可见的产品，而是为了把其中的每一个个体——他们的时间、思想、情感乃至灵魂——都碾磨成同质的、细碎的、听话的粉末。这台机器的轰鸣声，便是极权主义日常运转的最真实写照：文件如雪片般飞舞，会议如潮水般涌来，指导如圣旨般层层下达，考察、培训、出差则像一场永无止境的朝圣之旅，把人从熟悉的土地上连根拔起，再按官方模具重新铸造。

极权主义的本质，绝非传统暴君的“朕即国家”，而是一种对人类存在本身的全面占领与重塑。汉娜·阿伦特将其称为“运动的铁律”：它必须永不停歇地运动，才能维持“一切皆可能、一切皆属于国家”的恐怖幻象。一旦运动稍有停滞，社会就会像野草般自发生长出家庭的温情、地方的根脉、个人的反思与多元的缓冲。这些，都是极权无法容忍的“杂质”。于是，它发明了一整套精密而残酷的日常仪式：文多、会多、指导多、考察多、培训多、出差多，等等。这些不是低效的赘物，而是极权灵魂深处必然喷涌而出的毒血。它把宏观的极权野心，转化为微观却无处不在的、令人窒息的日常枷锁。

极权意识形态不是普通宣传，而是一套自封为“科学铁律”的封闭宇宙。它宣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终点，必须把现实世界全部压扁，塞进这单一叙事之中。可现实是顽固的：它充满矛盾、地方差异与人的自发性。因此，极权必须制造一场永不落幕的认知战争。文件与指导，便是这场战争的“圣经”与“律令”。它们不是工具，而是神圣文本。顶层每一次心血来潮，都要化为成百上千份层层批示、细化到荒谬程度的“指导意见”，像蛛网一样覆盖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没有最新文件，下级便如无头苍蝇般恐惧；有了文件，便获得了“政治正确”的护身符。指导之多，恰恰暴露了极权对现实的极度不安全感，它害怕任何一粒未被驯服的沙子，都可能磨损意识形态机器的齿轮。

会议与培训，则是把抽象“真理”注入血肉的炼金术。在烟雾缭绕的会场里，在脱产培训的封闭营地中，人被集体的高压氛围所包围：读文件、谈体会、作检讨、表忠心。这不是交流，而是灵魂的公开处决与重生仪式——个体原有的经验、情感与判断被当场肢解，再按官方模板重组。

考察与出差，是这场仪式最生动的“朝圣”篇章。干部们被成群结队地拉上大巴或高铁，奔赴那些被精心包装的“圣地”——某先进村、某示范区、某革命旧址，

鲜红的标语、整齐的笑容、被反复彩排的经验介绍。它表面喧嚣繁忙，内里却是死一般的寂静——因为所有真实的声音，都已被提前格式化。回来后，他们必须立刻转化为文件、会议和新一轮指导，把这场“朝圣”的精神鸦片，注射进更大范围的躯体。

文山会海成为对生命的慢性吞噬。人的时间像被吸入黑洞，再也找不到一寸属于自己的缝隙。阿伦特说，极权要消灭“自发性”——人天然的创造力、闲暇中的沉思、与亲友的真实联结。而这些“多”，正是反自发性的日常铁锤：它们把人变成永动的陀螺，旋转得越快，越没有精力去质疑陀螺本身为什么在转。整个体系像一条衔尾蛇：文件生会议，会议生培训，培训生出差，出差又生出更多文件，永无止境地吞噬自己的尾巴。

文山会海不是可以“改进”的作风问题，而是极权灵魂的必然投影。它吞噬的不是纸张和汽油，而是人的时间、尊严与可能性。只有当全面控制的现实被彻底驯服，当个体重新找回自发性，社会才能从这台永动绞肉机中解放出来，重新呼吸到自由而真实的空气。否则，那绞肉机将永不停息，把一代又一代人，碾磨成无声的粉末。

编辑：Gloria Wang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 *Phenomenon Three of Totalitarianism: The Proliferation of Formalism*

*This essay argues that excessive paperwork, meetings, inspections, training, and official travel are not administrative in efficiencies but structural features of totalitarian rule. Drawing on Hannah Arendt's analysis, it contends that permanent mobilization preserves ideological supremacy while suppressing individual autonomy and social spontaneity. Documents and directives function as authoritative texts, whereas meetings and training become rituals of conformity and political affirmation. Inspections and study tours present carefully staged models that are replicated through additional reports and directives. Bureaucratic activity becomes an end in itself, consuming time, creativity, dignity, and independent judgment rather than improving governance. The resulting cycle isolates individuals from reflection, family, community, and genuine civic life. Formalism therefore should be understood not as a correctable administrative weakness but as an intrinsic mechanism of totalitarian domination. Genuine freedom depends upon restoring independent thought, voluntary association,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spontaneous civic participat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极权主义现象之四：领导抓得细，控制一切

作者：张兴贵

领导抓得细，控制一切，这是贯穿极权体制运行的血肉机制。从最高领袖到基层细胞，每一根神经都绷紧，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极权主义不同于传统的专制，它不满足于控制宏观权力，而是追求“全控”——全面控制人的思想、行为乃至私生活。领袖或核心集团必须“抓得细”，才能实现“控制一切”。这种“细”，体现在组织结构的毛细血管化、监控的无死角化、日常生活的政治化管理上。

首先，看组织结构的“细”。极权体制下，权力不是松散的，而是高度层级化、网格化。每一个单位、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几乎都被嵌入严密的控制链条。以 20 世纪的经典案例为例，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建立了从中央到集体农庄、再到每一个生产小组的垂直指挥系统。领导干部不仅要管产量，还要管思想汇报、个人生活作风，甚至家庭成员的言论。谁家来了客人、说了什么、信件内容，都可能成为审查对象。

这种“抓细”在中国历史上有深刻体现，单位制、街道居委会、人民公社、生产队，一直到“小组学习”和“互相监督”，把社会原子彻底组织化。领导者要求“一竿子插到底”，村支书要知道每家每户的存粮、思想动态，甚至夫妻吵架都要调解“以阶级斗争为纲”。表面是“关心群众”，实质是消除任何可能游离于控制之外的私人空间。一个人如果想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生活，都会被视为“危险”。

其次，是监控手段的“细”。极权领导者深知，粗放控制容易留下漏洞，必须依靠技术与人力的双重细密织网。现代极权更是把这一特征推向极致。大数据、摄像头、天网工程、个人信用体系、社交媒体实时监测，让“领导抓细”有了前所未有的技术翅膀。一个人今天浏览了什么文章、转发了什么观点、和谁私下聊天、消费记录如何、出行轨迹怎样……全部被数据化、标签化。一旦系统判定你为“异常”，细微的警告、谈话、限制就会接踵而至。这种控制不再需要大规模公开暴力，而是通过“精准滴灌”式的压力实现，让个体在无声中自我驯化。

更可怕的是日常生活被彻底政治化。极权主义不满足于你服从，它要你“主动拥护”。于是，早餐吃什么、穿什么衣服、朋友圈发什么、甚至表情包的使用，都可能被赋予政治意义。领导者通过反复的“学习”、表态、检查，把意识形态渗透到最琐碎的细节中。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为任何一次“松懈”都可能被解读为不忠。久而久之，人们学会了表演性忠诚：公开场合高喊口号，私下却麻木空虚。这正是极权想要的结果——它不需要

你真心相信，只需要你彻底服从，并让服从成为生存本能。

这种“抓得细、控制一切”的现象，根源在于极权主义的核心逻辑：领袖或党必须被视为绝对正确，永不犯错的化身。为了维护这一神话，就不能允许任何不受控的变量存在。经济波动、社会矛盾、思想异见、文化多样性……所有这些在自由社会被视为正常的现象，在极权看来都是“失控”的风险。因此，必须把一切抓在手里、细到不能再细。

在全球化与科技时代，极权主义并未消失，它只是换上了更精致、更隐蔽的外衣。它可能以“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共同富裕”等美好名义出现，却在实践中不断延伸控制的触角：从经济决策到文化创作，从教育内容到私人言论，从生育政策到养老安排，无一不试图“抓细”。当一个社会越来越习惯于“领导替我们想好了”“上面会安排”的思维时，我们就离极权更近了一步。

我想借用一句哲人的话：极权主义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公开的残暴，而在于它把残暴变成了日常，把控制变成了“爱”。当领导者以“为你好”的名义抓得越来越细时，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独立的思考并勇敢地发声。否则，失去的将不仅是自由，还有人的尊严和未来的希望。

编辑：Gloria Wang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 *Phenomenon Four of Totalitarianism: Micromanagement and Total Control*

*This essay examines how totalitarian regimes pursue comprehensive control through extreme administrative detail. Unlike traditional authoritarianism, totalitarian rule seeks to regulate not only political power but also individual thought, behavior, and private life.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s, pervasive surveillance,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everyday activities create a dense network of control reaching every social level. Moder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digital monitoring and data analysis, further strengthen this capacity by enabling continuous observation and behavioral prediction. Such systems encourage self-censorship and performative loyalty while eliminating independent judgment and private space.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meticulous control is not merely an administrative style but an essential mechanism for preserving ideological absolutism and preventing autonomou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freedom itself.*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龙江夜思

——2026 年五月广东之行日记

作者：牛腾宇妈妈

## 前言 / 创作手记

这些年，我一次次来到四会，只为离儿子近一点，再近一点。每次去探视前，我都会住在龙江边的龙凤大酒店。推开十楼的窗户，下面就是那条静静流淌的龙江。白天，它承载着我的脚步；夜晚，它映照着我全部的思念与眼泪。

儿子被关在离酒店只有几公里的四会监狱里。隔着高墙，我见不到他，只能借着这条江，寄托一个母亲最卑微又最深沉的爱。我沿着江边走，把带给他的礼物，以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一遍遍托付给江水；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江面被酒店灯光碎成闪烁的光链，仿佛看见了我們被拆散的日子，也看见了未来一家团圆的微光。

《龙江边的守望》和《龙江夜·母亲的守》就是我在那些不眠之夜写下的心声。文字很朴素，却是我真实的痛与守候。我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作为一个母亲日复一日的思念、等待和坚持。江水知道我所有的眼泪，它也知道我从未放弃的信念——总有一天，我要接儿子回家，我们母子一起站在龙江边，看同样的灯光倒映在水里，那时候，再也没有高墙，再也没有分离。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常常泪流满面。写完后，我把它们留在酒店的窗前、留在江风里，也留在心里。我希望有一天，腾宇能读到它们，知道妈妈从来不曾离开过他，哪怕黑夜再长，哪怕路途再远，妈妈都在这里守着、等着。

感谢龙江，它成了我与儿子之间最温柔也最坚韧的桥梁。

愿每一个读到这些文字的人，都能感受到一个母亲最深沉的爱。

牛腾宇妈妈 2026 年 5 月于四会·龙凤大酒店

## 龙江边的守望

我住在四会的龙凤大酒店，窗外就是那条静静的龙江。夜里灯光落进水里，碎成一条颤抖的光链，像我这些年碎掉的心。

儿子，你被关在四会监狱，离我只有几公里。每天早上我推开窗，看着江水向你那边流，我就在心里一遍遍叫你的名字——腾宇。

酒店的房间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我自己的心跳。偶尔沿着龙江走，走过那座桥，走到能望见监狱高墙的地方。

风吹过江面，带着湿凉的水汽，我把带来的衣服、吃的、想对你说的话，都交给它，希望它能替我送进去一点点。

晚上我睡不着，就站在阳台上看着江里的倒影。那些酒店的灯光、高楼的影子，在水里晃啊晃，像我们被拆散的日子。

我常常想，如果你能站在我身边，我们母子俩一起看这条江，该有多好。

腾宇啊，妈妈在这里等着你。龙江每天都流，它知道我所有的眼泪，也知道我所有的坚持。

我住在这家酒店，把日子过成一条长长的河，只为有一天，能接你回家。

江水啊，请你替我抱抱我的孩子，告诉他，妈妈的爱从来没离开过，哪怕高墙再厚，哪怕黑夜再长。

## 江水知我心：绥江边的母亲守望

我住在四会的龙凤大酒店，已经好几个日夜。推开十层的房间窗户，夜风带着湿润的水汽扑面而来，下面就是那条静静流淌的龙江。灯光从酒店、从两岸的楼群倾泻而下，在江面上碎成一片闪烁的金银碎屑，像无数细小的心愿在水里颤抖，又被缓缓流动的江水带向远方。

儿子，你就在离我不远的四会监狱里。我每天站在这里，望着江水向你所在的方向流去，心里便生出一种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痛。白天，我沿着龙江的岸边走，风吹起我的头发，我把为你准备的礼物，还有那些压在心底的话，一遍遍默念给江水听。希望它能穿过高墙，替我抱一抱你，替我告诉你，妈妈就在这里。

夜晚的龙江最温柔，也最残忍。酒店的霓虹、高楼的灯光、桥上的车灯，全都倒映在水里，被波纹轻轻揉碎、拉长、晃动。那些光影像我们被拆散的日子，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我常常久久地凝视着它们，仿佛看见了小时候的笑脸，看见了我们曾经在一起的平凡时光。江水不说话，它只是默默地流，把所有的思念、所有的眼泪、所有的等待，都卷进它的怀里，带向未知的下游。

这里的一切都沾染着水汽，连梦里都是潮湿的。深夜我睡不着，便披衣站在阳台上，任由龙江的夜风拂过脸庞。远处监狱的方向偶尔亮起一点冷光，我的心就跟着揪紧。儿子啊，妈妈知道你受苦了，可妈妈只能用这种方式陪着你——守在这条江边，守在这家酒店的窗前，把自己活成一条不肯断流的河。

龙江，你见证了我所有的眼泪，也请你见证我的坚持。总有一天，我会接你回家，我们母子一起站在这江边，看同样的灯光倒影在水里，那时候，它们一定不再是破碎的，而是完整的、温暖的，像从未被分开过一样。

江水缓缓，夜色深深。我在这里，等你。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前进吧，为了那终将到来的春天！

作者：张兴贵

二十八年。对于一个生命而言，这是从青春走向成熟的黄金时期；而对于中国民主党而言，这二十八年，是一部在荆棘中开辟道路的长诗，是一场在至暗时刻坚守灯塔的修行。我们在这里回望，不是为了沉溺于往昔的伤感，而是为了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重新确认我们灵魂深处的坐标。

## 一、浴血之魂，在废墟上挺起的脊梁

回溯 1998 年，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年份，那是中国民主党人的破茧时刻。从那一天起，我们就注定要与“沉重”二字为伍。这二十八年来，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经历过高潮时的激昂，也品尝过低谷期的苦涩。无数的民主党人，在时代的巨轮面前，以肉身抗衡强权，以血肉之躯撞击冰冷的壁垒。有人失去了自由，有人流离失所，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为什么？为什么在每一次沉重的打击之后，那面旗帜依然能在硝烟中重新挺立？因为我们深知，民主不是一种装饰品，它是国家尊严的底色，是民族文明的归宿。二十八年，我们用血泪书写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党的编年史，而是一部关于“良知如何对抗遗忘”的抗争史。我们挺起的不仅仅是脊梁，更是这个民族不甘沉沦的最后一份倔强！

## 二、旗帜的重量，将民主与自由刻入骨髓

有人问，政党的生命力源于何处？我们给出的答案是：源于灵魂的刻骨。我们不仅将民主写在旗帜上，更是将其植入我们的血管；我们不仅将自由作为追求，更是将其视为我们立党之魂的唯一养料。这绝非轻飘飘的口号，而是我们每一个民主党人的自我拷问。当你看到一个政党能够将“民主”作为旗帜，这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依附权力的捷径，选择了最艰难的逆行。这意味着我们要去对抗陈腐的积习，要去挑战权力垄断的堡垒。当我们将“自由”注入党魂，我们便告别了教条与盲从。我们的自由，是思想的解放，是即便在最极端的封锁下，依然能够保持逻辑的独立、人格的尊严。我们要建设的未来，不是一种权力的更迭，而是一个人人可以挺直腰杆、自由呼吸的时代。

## 三、伟大的力量来自人民的共鸣

任何政党的合法性，都不源于自封的荣耀，而源于它与这片土地上受苦人民的共鸣深度。一个政党的兴衰，终究取决于它是否站在了文明进步的一边。中国民主党的二十八年，是一场漫长的长征。我们清醒地看到，历

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尽管黑暗有时会遮住太阳，但文明的火焰从未熄灭。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二十八年，是因为我们的根扎在了土地里，扎在了那些渴望权利、渴望公平、渴望尊严的普通人的心底。我们不需要宏大的叙事来包装自己，我们的力量，就源于那一个个真实的声音，那些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感受到一丝希望的人群。

## 四、勤奋的意义，在微光中积聚风暴

什么是勤奋？在这个时代，勤奋不是简单的劳作，而是智识的坚持与灵魂的抗压。这种勤奋，不是为了争夺一时的名利，而是为了将文明的火种，在压抑的寒冬中一代代传下去。我们不只要做抗争者，更要做建设者。我们深知，当那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来临时，中国需要一批拥有现代治理素养、拥有民主精神内核的建设者。因此，我们的勤奋是沉默的，也是深沉的。我们在海外的每一次呐喊，在国内的每一次守望，都是在为自由的回归铺路。我们用行动告诉所有人：不要放弃对民主的信仰，因为中国民主党在这里，因为这面旗帜从未倒下！

我们站在二十八周年的节点，回望过去，心潮澎湃；展望未来，责任如山。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化，随着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民主的需求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我们要完成一次自我的升华。

我们要让民主党成为一个更加理性、更加专业、更加具有感召力的政党。我们要让世界看到，民主的力量不是破坏，而是建设；不是分裂，而是团结。我们的旗帜，要成为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路标；我们的魂，要成为点燃这片土地上每个人自由意识的火种。

在这条漫长的路上，我们是孤独的吗？不，我们不孤独。因为在每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中，都有我们的回响。请收起悲观的叹息，擦干泪水，握紧手中的旗帜！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目标，是让民主的阳光，普照神州大地，让每一个中国人，不再需要为说真话而战栗，不再需要为争取自由而牺牲！这就是我们的党魂！

前进吧，为了那终将到来的春天！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香港殷鉴未远，台湾岂容自毁长城

——评郑丽文访陆输诚、访美受挫与驱赶抗议者的威权嘴脸

特约评论：缪青



郑丽文见面会暴力驱赶抗议者现场 - 图片来自网络

## 导语

香港的沉沦，已经为台湾写下了一份血淋淋的政治警示录：在中共极权统治之下，没有独立主权作保障，所谓“高度自治”、所谓“和平共处”、所谓“制度承诺”，都不过是可以随时收回的政治恩赐。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却先赴北京面见中共党魁习近平，向北京递交政治投名状；继而又赴美国活动，在旧金山遭遇侨界冷遇，在洛杉矶面对民运人士抗议时，更放任乃至纵容现场人员强行驱赶抗议者，事后还为此辩护。郑丽文这一连串表演，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失态或政党路线之争，而是赤裸裸暴露出国民党亲共路线的危险本质：它所兜售的所谓“和平”，并不是建立在民主、自由与主权之上的和平，而是要求台湾放下警惕、压低反抗、交出主体性的“投降式和平”。从香港看台湾，郑丽文的所作所为，正是在把台湾一步步推向“香港化”的险境。

## 一、香港已经把结局演示完毕：没有主权，所谓自由终究只是“恩准”

今天谈台湾前途，任何人都无法绕开香港的现实悲剧。

2020年《香港国安法》强行实施后，香港在极短时间内由一个拥有相对自由空间、法治传统和公民社会活力的国际城市，迅速沦为中共高压统治之下的政治禁区。反对派议员被清洗，立法会被重组为橡皮图章；媒体接连停刊，记者与评论人被捕入狱；公民团体纷纷解散，纪念六四、公开抗议、街头表达都被视作政治罪行。曾经写入国际文件、曾经被反复宣示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在中共绝对权力面前不过转瞬即逝。

香港的遭遇，已经把一个最朴素、也最残酷的政治常识昭示得明明白白：在没有独立主权作为最后屏障的前提下，任何自由、法治、自治和生活方式，都只是强权暂时允许存在的“特许品”，而不是人民自己真正拥有的权利。

香港之所以沦陷，不是因为它不够繁荣，不是因为它不够文明，也不是因为香港人没有为自由抗争，而是因为它从来没有掌握决定自己命运的主权。既然主权不在香港人民手中，那么北京在统战需要时可以承诺自治，在维稳需要时也可以立刻撕毁承诺；今天可以说“高度自治”，明天就可以以“国家安全”为名将一切自由连根拔起。香港最惨痛的教训就在于：在中共统治逻辑之下，任何权利如果不是建立在人民自己掌握主权的基础上，最终都只是一纸可以随时作废的许可证。

因此，香港已经彻底打破了那种幼稚而危险的幻想——仿佛只要不刺激中共、只要与北京“理性协商”、只要接受“一个中国”的政治前提，就能够换来和平、稳定和制度保障。香港用自己的命运证明：对中共退让，不会换来自由；向极权妥协，不会换来尊严；寄望于北京守信，只会换来更彻底的控制。

## 二、郑丽文赴京“朝拜”，不是和平交流，而是向中共递交政治投名状

正因为香港的结局如此清晰，郑丽文在此时此刻窜访北京、面见习近平，才显得格外刺眼，也格外危险。

国民党近年来不断以“和平”“交流”“降低战争风险”为口号，试图把对中共的让步包装成“务实”，把对主权的淡化包装成“理性”，把对北京的靠拢包装成“负责任的两岸政策”。然而，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交流”二字，而在于：一个刚刚亲手毁灭香港自由、长期对台湾实施军事威胁、外交打压与认知作战的极权政权，究竟有什么资格向台湾谈和平？

郑丽文赴北京，绝不是在平等地位上与北京进行对话，而是在中共设定的政治舞台、政治语言和政治框架中接受统战安排。习近平接见她，不是为了尊重台湾民意，不是为了寻求真正的和平，而是为了向台湾、向美国、向国际社会制造一种假象：仿佛台湾的主要在野力量愿意接受中共的政治前提，愿意把台湾前途重新拉回到“一个中国”的叙事框架之中，愿意配合北京共同压制台湾主体意识的成长。

说穿了，郑丽文此行的真正功能，不是替台湾争取和平，而是替中共的对台统战输送合法性；不是替台湾守住安全，而是在替北京修补“一国两制”彻底破产后

的政治叙事裂缝。她向习近平递上的，不只是一个国民党主席的“善意”，而是一份明明白白的政治投名状：即台湾内部依然有人愿意在香港血迹未干之际，继续为中共“和平统一”的骗局背书，继续协助北京削弱台湾社会的警惕、瓦解台湾人民的防卫意志。

这种行为，已经不能用“路线分歧”轻描淡写带过。因为在香港已经沦陷、台海威胁日益升级的现实下，任何主动向中共输诚、替中共话术背书的举动，客观上都是在伤害台湾的民主安全，侵蚀台湾的主权防线。

### 三、旧金山洪门拒绝出席，不是礼数问题，而是对亲共路线的公开切割

郑丽文赴美后，旧金山洪门组织拒绝出席其见面会，引发舆论关注。若从浅层看，这似乎只是侨界活动中的礼节争议或沟通问题；但若放在郑丽文先赴北京、后赴美国的完整脉络中观察，就会明白，这绝非简单的人情冷暖，而是一种清晰的政治表态。

洪门及其相关侨团，在海外华人政治史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其历史传统与反清、共和、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海外支持网络有着密切关联。也正因此，当这样一类带有强烈传统“中华民国派”色彩的侨界力量，都不愿为郑丽文站台，不愿出席其见面会时，这本身就已经说明：郑丽文这条路线，已经让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看清其危险性。

问题不在于国民党可不可以与中国大陆交流，而在于郑丽文在香港沦陷之后、在习近平不断加大对台军事与政治压力之际，依然选择主动赴京“朝拜”，并将自己包装成所谓“和平使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旧金山侨界对她保持距离，恰恰说明海外华人中仍有许多人清醒地意识到：今天任何替中共“和平统一”叙事背书的政治人物，实际上都在帮助中共削弱台湾主体意识，削弱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削弱台湾人民保卫自由生活方式的意志。

因此，旧金山洪门拒绝出席，绝不只是一个面子问题，而是一种公开的政治切割：即使在海外传统侨界内部，也并非所有人都愿意为这种亲共、媚共、投共的路线背书，更不愿意成为中共对台统战链条上的一环。

### 四、洛杉矶驱赶抗议者，撕下了郑丽文“和平”伪装下的威权面具

如果说赴京面习暴露的是郑丽文的政治立场，那么洛杉矶抗议风波则暴露了她更深层的政治本质——那就是对民主社会中异议权利的蔑视，以及对威权政治逻辑的本能亲近。

在民主社会，政治人物面对抗议、质问与批评，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尤其对于一个刚刚与习近平会面的台湾在野党主席而言，海外民运人士、反共侨胞和关心台湾前途的人，对她提出质疑、在公开场合表达抗议，

不仅正当，而且必要。因为这不是私人恩怨，而是攸关台湾命运、华人民主运动与中共统战渗透的重大公共议题。民众有权追问：香港已经变成今天这样，郑丽文凭什么还要向中共输诚？习近平已经把“一国两制”撕得粉碎，郑丽文凭什么还要兜售“和平幻觉”？

然而，郑丽文一方面对这些质问，采取的却不是公开回应，不是据理辩论，而是驱赶、隔离、压制，任由乃至纵容现场人员将抗议者强行排除出场。更恶劣的是，事后她并未表示歉意，反而为这种做法辩护，仿佛只要打着“维持秩序”的旗号，就可以合理化对反对声音的驱逐。

问题正在这里：这绝不只是一次活动现场的失控，而是一次政治本能的暴露。

因为这种逻辑与香港这些年所经历的一切，实在太相似了。香港的自由不是一天失去的，而是在一次又一次“为了秩序”“为了稳定”“为了国家安全”的名义之下，被一点点剥夺、压缩、封堵。先把抗议者说成“闹事者”，再把异议者说成“破坏稳定者”，最后再把压制包装成“必要管理”，把驱逐合理化为“维持秩序”。当一位自称“和平”的台湾政治人物，面对抗议时首先想到的不是保障对方说话的权利，而是如何让对方闭嘴、离场、消失，这就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修养问题，而是一种与威权政治高度兼容的思维方式。

郑丽文在洛杉矶驱赶抗议者，驱赶的不是几个让她难堪的反对者，而是台湾民主最宝贵的东西——异议的权利、公开批评的权利、在权势面前不沉默的权利。一个面对习近平可以笑脸相迎、面对抗议民众却冷酷驱赶的人，口中的“和平”到底是为谁服务，答案已经不言而喻。

### 五、从香港看台湾：台湾独立的正当性，首先是捍卫自由与生存的正当性

也正因为如此，今天再谈台湾独立的正当性，已经不能停留在传统统独论战的层次，而必须回到一个更根本、更现实的问题：台湾为什么必须坚持主权独立？

答案并不抽象。因为只有独立主权，台湾人民才能继续掌握自己的命运，继续以自己的选票决定谁来执政，继续以自己的法律保障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公民抗议和社会多元。台湾经过数十年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形成一个由2300万人民共同授权、自我治理的民主共同体。台湾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而不是来自北京的恩准；台湾制度的运作来自台湾社会内部的宪政秩序，而不是来自某个中央政权的“特别许可”。这一点，与香港有着根本区别。

香港的自由，是北京“允许存在”的自由，所以北京可以随时收回；台湾的民主，则是台湾人民自己流血流汗争取而来的民主，所以台湾绝不能把它交还给一个从未尊重自由、从未尊重人权、从未尊重人民授权的极

权政权。香港的崩塌，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台湾独立主权的现实必要性：主权不是抽象名词，不是象征姿态，而是 2300 万台湾人民免于沦为第二个香港的最后防火墙。

从国际法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台湾早已具备固定领土、常住人民、有效政府与对外交往能力等国家构成要素。台湾之所以必须坚持主权独立，不是为了追求一个虚幻名号，而是为了守住最具体的日常自由：记者能否继续报道真相，人民能否公开批评执政者，法官能否依法律而非政治命令判案，公民能否上街抗议而不被以“维持秩序”为名拖走。说到底，主权从来不是遥远的政治口号，它关乎的是一个社会明天还能不能自由呼吸、还能不能有尊严地活着。

## 六、结语：香港的答案已经写明，台湾绝不能重蹈覆辙

郑丽文赴京，是向中共输诚；郑丽文赴美受挫，是其亲共路线遭遇的必然后果；郑丽文驱赶抗议者，则更把她“和平叙事”背后的威权底色暴露得一览无余。她所鼓吹的，不是建立在民主、自由与主权基础上的和平，而是一种要求台湾先放下戒心、先放弃主体性、先压制反共声音、最后再接受中共政治安排的“投降式和平”。

然而，香港已经把这种道路的终点演示得清清楚楚：凡是没有主权保障的自由，最终都会沦为恩赐；凡是建立在对极权幻想之上的和平，最终都会变成更彻底的奴役。

今天台湾最不需要的，就是再去相信“只要与北京谈、只要不刺激中共、只要淡化主权就能换来安全”的陈词滥调。台湾真正需要的，是从香港的伤口中读懂现实：主权不是可有可无的口号，而是台湾民主最后的防线；独立不是抽象的姿态，而是防止台湾沦为第二个香港的唯一保障。

因此，郑丽文所代表的路线，绝不只是国民党内部的一种政策选择，而是关乎台湾是否继续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共同体存在下去的根本问题。面对中共，任何以“和平”为名、以“交流”为饰、以压制异议为手段、以淡化主权为目标的政治路线，都必须被严厉揭露、坚决拒绝。

香港已经失守，台湾没有资格再犯同样的错误。台湾的道路，绝不能通向香港；台湾的未来，更不能交到习近平和郑丽文们手中。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宣传部部长

《北京之春》《在野党》旧金山记者站站长

缪青撰文于旧金山 06/20/2026

## Hong Kong's Lesson Must Not Become Taiwan's Future: On Cheng Li-wen's Beijing Visit, Failed United States Tour, and Suppression of Prot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Hong Kong'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follow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demonstrates the incompatibility of authoritarian rule with meaningful autonomy. Without sovereign authority resting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guarantees such as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institutional commitments ultimately depend upon the discretion of the ruling power rather than the protection of law. Hong Kong is therefore presented as a warning for Taiwan.*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recent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Kuomintang politician Cheng Li-wen. It argues that her meeting with Xi Jinping in Beijing should be understood not as ordinary cross Strait dialogue but as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united front strategy.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such engagement strengthens Beijing's political narrative by suggesting that influential Taiwanese political figures are willing to operat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One China," despite Hong Kong's experience. The article contends that this approach weakens Taiwan's bargaining position while lending credibility to Beijing's preferred framework for cross Strait relations.*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Cheng's subsequent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It notes that some overseas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San Francisco declined to participate in her activities and interprets this as political distancing from positions perceived as overly accommodating toward Beijing. It further examines an incident in Los Angeles in which protesters were reportedly removed from an event by organizer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defending such actions reflects an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instinct inconsistent with democratic principles, where peaceful criticism and public protest constitute legitimate form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aiwan's sovereignty is not merely a constitutional or diplomatic issue but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judicial independence, freedom of expression, political pluralism, and the right to peaceful dissent. Drawing lessons from Hong Kong, it argues that accommodation with authoritarian rule cannot provide lasting peace or liberty, and that preserv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popular sovereignty remains essential to Taiwan's future. The central claim is that freedom cannot rely upon promises issued by an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because such promises may be revised or withdrawn whenever political priorities change. Lasting security depends upon accountable institutions,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civil liberties, and citizens willing to defend democratic values against external pressure and internal accommodation through sustained civic vigilance and participat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官方“金丝雀”与地下“十字架”

——从秋雨教会遭冲击看中共的伪宗教自由

作者：孙浩亮



家庭教会信徒迫切祷告 - 图片来自网络

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在国际舞台上始终坚称“中国公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然而，这一叙事在现实的铁幕下正不断被撕裂。2026年6月14日，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三十多名神职人员与信徒在四川江油的一场主日聚会中，遭到大批警察、特警以及民宗局官员的暴力冲击，晏鸿、吴五清等多位长老被处以行政拘留。这场针对非官方家庭教会的精准打压，再次将中共精心包装的“伪宗教自由”推到了聚光灯下。

要理解这场持续数十年的信仰拉锯战，必须将其放在中共的核心宗教工具——“三自教会”政策的显微镜下进行审视。

## “三自”的异化：从独立自主到行政附庸

“三自”原则（自治、自养、自传）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时，表面上的政治口号是割断中国基督教会与西方帝国主义的行政隶属关系。但在数十年的演变中，“三自教会”已经从一个号称独立自主的宗教组织，完全异化为国家机器的一个行政分支。

在“三自”体制下，所谓的“自治”变成了“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自传”则演变为“必须按照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来阐释圣经”。近年来，官方强力推行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更是要求教堂升国旗、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政治纲领凌驾于神圣教义之上，当讲台上的宣讲必须经过意识形态的严格政审，“三自教会”在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替官方统战、维稳的政治工具。

## 过滤器的逻辑：顺我者“合法”，逆我者“取缔”

秋雨圣约教会之所以成为官方持续打压的重点，恰恰是因为它拒绝加入“三自”体系。这揭示了中共“宗教自由”的本质：它不是保护公民信仰权利的普世原则，而是一种顺从性的分级管理体制机制。

愿意交出思想控制权的教会：被纳入“三自”系统，赐予“合法”外衣，成为官方用来对国际社会展示“宗教繁荣”的政治盆景与金丝雀。

坚守宗教独立、拒绝政治渗透的家庭教会：则被直接贴上“非法聚集”、“危害社会秩序”的标签，遭到从日常监控、截访、逼迁，到如今直接动用警力包围冲击的严酷打压。

这种“非此即彼”的过滤器逻辑，充分暴露了其宗教自由政策的虚伪性。真正的宗教自由，核心在于公民能够按照其良知和信仰自由选择聚会场所、敬拜方式和神学立场，而不是必须在“成为体制的传声筒”与“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之间做单选题。

## 2026年暴力冲击的深层警示

2026年6月14日秋雨教会信徒在异地酒店聚会仍遭六七十名警察包围，这一细节传递出了更为严峻的信号。它表明官方对独立信仰的容忍度已经降到了冰点，其监控和打压网络已经不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即使信徒们退出了市中心的传统教堂，转而走向边缘的非正式场所，甚至异地秘密聚会，国家机器的触角依然无孔不入。

连数名年幼的孩子也被一同押上大巴车和警车的画面，更是将这种政治威慑的残酷性展露无遗。这种打压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消除某种现实的安全威胁，而是为了在精神层面上制造恐惧，迫使所有独立于党体制之外的社会自组织——无论是宗教团体、民间NGO还是维权社群——彻底丧失生存空间。

## 结语

秋雨圣约教会的十字架并没有随着2018年的取缔而消失，反而随着2026年盛夏的这场冲击变得更加沉重。当一个政权需要动用特警、大巴车去围剿三十几个坐在酒店房间里唱诗、祷告的平民和儿童时，它所展现的绝非强大，而是一种深刻的意识形态不安全感。

通过“三自”政策将宗教豢养为权力的附庸，同时用警棍和拘留证去消灭真正的独立信仰——这就是秋雨教会事件背后的真相。中国离真正的宗教自由，依然有着一条由铁网、警灯和伪善谎言所筑成的漫长鸿沟。

编辑：Gloria Wang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一个甲子的抢掠交响乐

——从“三大改造”到新时代的伟大闭环

作者：漠北孤侠



新华社最近又发表了社论，题目叫《三大改造 伟大进程...》。读完这篇宏文，我不禁抚掌大笑。在这个流行“复古”的年代，中共喉舌终于不再遮遮掩掩，而是迈着正步、吹着喇叭，带大家集体穿越回了那个借尸还魂的激昂年代。

正所谓“初心不改，抢掠不止”。一个甲子的轮回，历史在这片土地上画了一个完美的黑色幽默同心圆。当年那些靠“暴力、谎言与明抢”起家的招数，换了个数字化的马甲，又雄赳赳气昂昂地跨回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 看呐，这一场优雅的“合法洗劫”

要看懂今天的戏码，必须先复盘一下当年那场被冠以“伟大历史进程”的“三大改造”。那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用枪杆子和厚脸皮共同谱写的“抢劫交响乐”。

农业改造上演的是一出从“耕者有其田”到“地主变长工”的戏码。中共进城前，拿着《新民主主义论》对农民兄弟信誓旦旦，承诺跟他们干就能分田地。农民兄弟一听，热血沸腾，推着小车把中共送进了北京。结果屁股还没坐热，“三大改造”枪声一响，先是互助组，再是初级社，最后变成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农民兄弟手里的土地证还没捂热，就被一夜之间收归“集体”。这分明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钓鱼执法”加“空手套白狼”。

工商业改造则是从“白天敲锣打鼓”演变为“晚上跳楼自杀”。对于城市里的资本家和手工业者，中共发明了一个充满温情的词汇——“赎买”。听起来像是国家掏真金白银买资产，实际上核定资产时全是官方说了算，给的“定息”低到连通胀都跑不赢，而且只给几年。更绝的是政治高压，资本家们白天要戴红花、敲锣打鼓地把自家的工厂、店铺双手奉献给国家，晚上回到家则看着账单抱头痛哭。当时上海的市长陈毅每天上班的第一句问话就是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的是受不了公私合营和政治运动侮辱、选择跳楼自杀的民族资本家们。这不叫改造，这叫优雅的持枪抢劫，抢了你的钱，还要

你全家 kneeling 唱赞歌。

## 不仅谋财，更要灭绝人性的制度阉割

“三大改造”的恶果，绝不仅仅是让中国经济在几十年里陷入了绝对贫困，它更深远的罪恶，在于对中国社会实施了一场全方位的、百年难愈的精神阉割与人性荒芜。这种全方位的摧毁，深刻地体现在社会的不同层面。

在经济层面，改造前本有着产权清晰的百年老店与市场内生动力，改造后则将产权彻底消灭，变为了权力绝对垄断，导致社会彻底丧失了创新与生产的效率。

在制度层面，过去民间保有着宗族自治、社团以及法律与公序良俗的缓冲空间，改造后党权的触角彻底延伸至床头，告密制度化，形成了全能型的极权统治。

在文化与人性层面，传统社会敬天法祖、讲求仁义礼智信与私产不可侵犯，改造后则流毒至今，变为了见利忘义、唯权力是从，人性彻底沦为一片寸草不生的荒漠。

产权的覆灭带来了契约精神的死亡。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但“有恒产者有恒心”是千百年来民间的共识。买卖有契约，土地有地契。“三大改造”以国家暴力的形式，在极短时间内把数千年积累的私有产权砸得粉碎。这直接导致了一个恐怖的认知深入中国人的骨髓：在这个国家，任何财富都是暂时的，唯有权力是永恒的。契约变成了废纸，信用变成了笑话。

最惨烈的摧毁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的族群心灵深处。为了配合这场掠夺，中共动用了全套的谎言机器和阶级斗争话语体系。儿子批斗父亲，妻子揭发丈夫，伙计背刺老板。传统文化中的基本伦理被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阶级仇恨。当一个人连自己合法赚取的财产都无法保护，甚至要把出卖亲人当作生存技能时，这个族群的人性就彻底荒芜了。这种灵魂的沙化，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普遍的互害模式，这笔孽债，哪怕过了一百年，都未必能还得清。

## 一甲子的轮回，抢掠基因的必然觉醒

历史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押着相同的韵脚。今天，距离当年的“三大改造”刚过约一个甲子，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又卷土重来了。

看看近些年上演的魔幻现实剧吧：民营企业家们被要求“听党话、跟党走”，甚至有御用文人公开高呼“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大型互联网巨头、教培行业、游戏产业，在一夜之间被



行政命令砸得粉碎，或者是被强行入股，实现了新时代的“公私合营”。各路大亨纷纷“杯酒释兵权”，主动把辛辛苦苦创立的企业控制权双手奉还。

这到底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有人总觉得，当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共改邪归正了。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对于一个以“消灭私有制”写进根本章程的组织来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过是它在当年的抢掠政策导致国民经济彻底崩溃后的“养猪策略”。猪养肥了，圈养大了，国库空了，或者觉得这些肥猪开始威胁到猪圈主人的绝对安全了，那怎么办？杀猪取肉，顺理成章。

这根本不是什么政策的摇摆，而是这个政权骨子里的基因觉醒。它的初心就是抢掠，它的本领就是暴力，它的合法性全部建立在谎言之上。指望它能世代代保护私有财产、遵守市场规则，就像指望一头狼能长期茹素一样，纯属痴人说梦。

### 此劫难逃的族群与宿命的黑色幽默

新华社的社论还在继续高歌猛进，它在赞美那个摧毁了中国社会生机的“伟大进程”，实际上是在为下一轮更惨烈的掠夺吹响冲锋号。

看着台下那些一边鼓掌、一边瑟瑟发抖的现代“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历史老人露出了最尖锐的嘲笑。六十年前，他们的爷爷辈敲锣打鼓送走了资产；六十年后，他们拿着智能手机，在宏大叙事下，战战兢兢地交出自己的股权和钱包。

这一片土地，以及在这片土地上寄养的族群，似乎陷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莫比乌斯环。因为谎言，他们放弃了思考；因为恐惧，他们服从了暴力；因为懦弱，他们默许了抢掠。既然当年的历史教训被他们当成了“伟大的成就”来歌颂，那么历史就绝不会吝啬于让他们把当年的苦难再重新品尝一遍。这算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求仁得仁”？

匪帮的初心确实从未改变，而这个族群的劫难，恐怕也才刚刚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上海的主要商业街南京路 - 引用图片来自大纪元

### A Sixty-Year Symphony of Plunder: From the Thre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s to the Great Closed Loop of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sharply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Thre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s" of the 1950s and connects them with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industry and commerce, and the absorption of handicrafts into state controlled structures amounted to large scale expropriation carried out through political coercion, ideological pressure, and administrative force.*

*The essay contends that these campaigns destroyed private property, weakened contractual norms, and replaced independent economic life with centralized political control. It further argues that the damage extended beyond material loss. Traditional ethics, family trust, social cooperation, and personal dignity were undermined by class struggle, denunci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ed fear. In the author's view, the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taught generations that wealth was insecure and that political power outweighed law, contract, and moral obligation.*

*Turning to the present, the article interprets tighter control over private enterprises, technology companies, education firms, and other sectors as evidence of historical continuity. It rejects the idea that reform and opening represented a permanent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describing market liberalization instead as a temporary retreat after earlier policies damaged the economy. Once private wealth expanded and independent economic actors gained influence, the state,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resumed efforts to reassert control through regulation, political supervision, forced restructuring, and pressure on business leaders.*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renewed official praise for the Thre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s is not merely historical commemoration but a warning sign. It suggests that the same political logic that justified past expropriation remains active under new technological and administrative forms. By describing this pattern as a closed historical loop, the author warns that a society unwilling to confront the violence and deception of its past may be compelled to experience similar losses again. The essay ultimately calls for reflection on property rights, institutional accountability, historical memory, economic freedom, civic trust, and the recurr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ological authority and organized expropriation across successive generations of citizens, workers, farmers, and entrepreneur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Lobga Rangzen 自焚前的遗言

——图伯特的责任与团结

作者：Lobga Rangzen  
中文翻译整理：华语青年挺藏会



自焚者 LobgaRangzen 于行动前，在自家车库留下遗嘱，并在自己的脸书上发表。Rangzen 是他自己选的名字，是藏语 [ 独立 ] [ 自由 ] 之意。

以下为其遗嘱内容整理 ( 听译 )：我们在国外举办任何活动，都是为了抗议中共对境内藏地的高压政策，反抗中国对藏地藏人的统治。今天，我想说几句话。对图伯特境内的藏人，我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因为他们一直冒着生命危险，以最大的勇气，为拯救图伯特的语言、文化与尊严，不断努力。因此，我没有什么资格再对他们说什么。我今天主要是想对流亡藏人说四点：

第一，流亡藏人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我们在流亡当中，享受着自由民主的生活。这样的自由民主，是尊者达赖喇嘛给予我们的。尊者让我们拥有自由，并不是要让我们自己内耗，也不是要让我们用民主自由之名，在内部彼此斗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图伯特的自由发声，为图伯特的未来想办法。尊者达赖喇嘛曾经说过，生活在国外的藏人，不要因为自己有了房子、有了车子，就感到满足，因为图伯特境内的藏人仍然生活在苦难之中。

第二，我们要明白，藏人的苦难，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尊者达赖喇嘛是世界的和平导师，他为所有众生的和平与幸福奔波，所以他不会把话说得太多、太重。但是我们自己要明白：为什么图伯特境内的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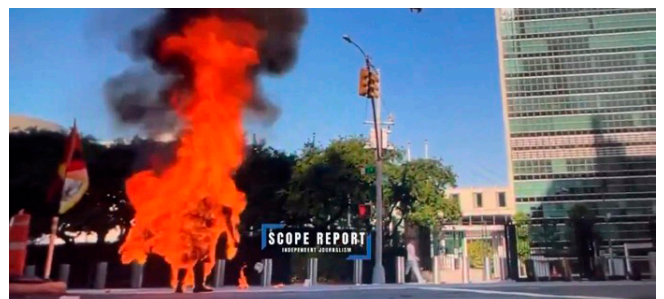
没有任何自由？为什么我们的民族面临被消灭的危机？为什么我们连供奉尊者达赖喇嘛法相的权利都没有？这都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很多人说我们没有国家，不是的，我们有国家，只是我们的国家被中国占领了。

第三，流亡藏人不要再分地域、教派，而要真正团结起来。中共打压藏人时，并不会区分你是康巴人、安多人，还是卫藏人；也不会区分你属于哪一个教派。他们同样打压所有藏人，也同样破坏所有宗教。所以，我们在外的藏人，真的不应该再分什么康巴、安多、卫藏，也不应该再分各个教派。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团结起来，为恢复藏人的自由、为藏民族的独立，做出更多努力。

第四，不要因为我的行动而停止应该去做的事；真正的哀悼，是继续为图伯特奋斗。如果这一次我要做一个大的行动、一个引起轰动的行动，我双手合十请求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而停止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做的，是为了保存自己的语言与文化。所以，该跳舞的还是要跳舞，该唱歌的还是要唱歌。因为这些都是为了让年轻一代的藏人，能够接受并传承自己的语言与文化。特别是现在，我们即将迎来尊者达赖喇嘛九十一岁华诞。我希望全球各地的藏人，都要盛大举办尊者的祝寿活动。这些都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行动，就只停留在悲哀或默哀之中。

我们真正需要悲哀、需要默哀的，是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此发起更大的行动。我今天要做这个行动，不是因为我缺乏衣食住行，不是因为我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住的，也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生活问题。这一切，是为了图伯特的独立，为了图伯特的抗争。因此，我双手合十请求大家：如果你们真的要哀悼我，请按照我在这里所说的愿望去做。希望每一个人都为图伯特的事情继续努力，继续奋斗。最后，我想说：图伯特民族的独立万岁！博嘉洛（图伯特必胜）！

编辑：黄吉洲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 洛尔然赞 (Lobga Rangzen) 遗言

——2026 年 7 月 2 日自焚前最后公开讲话

编者：冯仍



2026 年 7 月 2 日，旅居美国的藏人活动人士洛尔然赞 (Lobga Rangzen) 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外，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国对西藏长期实行的高压统治。经送往医院抢救后，于当晚因伤势过重去世。

据现场视频显示，洛尔然赞在联合国总部外竖起雪山狮子旗，并开启 Facebook 直播，随后点燃自己，以生命表达对西藏命运的抗议。

据其友人介绍，洛尔然赞在行动前，于自家车库录制并发布了最后一段视频，同时在个人 Facebook 页面发表遗言。值得注意的是，“Rangzen (然赞)”并非其本名，而是他为自己选择的字，在藏语中意为“独立”“自由”。这一名字既体现了他的政治信念，也成为其毕生追求的象征。因此，本文尊重其本人意愿，统一采用“洛尔然赞 (Lobga Rangzen)”这一译名。

在遗言中，洛尔然赞向仍生活在西藏境内、长期承受高压统治的藏人表达敬意，并将主要内容留给流亡海外的藏人。他呼吁流亡群体珍惜自由民主的环境，不忘自身责任，停止内耗、加强团结，继续为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及民族未来努力。他强调，自己此次行动并非出于个人生活困境，而是希望以生命唤起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持续关注。

以下内容根据洛尔然赞生前公开发布的视频进行听译整理，力求忠实呈现其原意。为便于中文阅读，个别语句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作了适当调整。

以下为其遗嘱内容整理 (听译)：

我们在国外举办任何活动，都是为了抗议中共对境内藏地的高压政策，反抗中国对藏地藏人的统治。今天，我想说几句话。对境内藏人，要谢谢他们，我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因为他们一直冒着生命危险，以最大的勇气，为拯救我们藏民族的语言、文化与尊严，不断努力。

因此，我没有什么资格再对他们说什么。我今天主要是想对流亡藏人说四点：

第 1，流亡藏人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我们在流亡当中，享受着自由民主的生活。这样的自由民主，是尊者达赖喇嘛给予我们的。尊者让我们拥有自由，并不是要让我们自己内耗，也不是要让我们用民主自由之名，在内部彼此斗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图伯特的自由发声，为图伯特的未来想办法。尊者达赖喇嘛曾经说过，生活在国外的藏人，不要因为自己有了房子、有了车子，就感到满足，因为图伯特境内的藏人仍然生活在苦难之中。

第 2，我们要明白，藏人的苦难，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尊者达赖喇嘛是世界的和平导师，他为所有众生的和平与幸福奔波，所以他不会把话说得太多、太重。但是我们自己要明白：为什么图伯特境内的藏人没有任何自由？为什么我们的民族面临被消灭的危机？为什么我们连供奉尊者达赖喇嘛法相的权利都没有？这都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很多人说我们没有国家。不是的，我们有国家；只是我们的国家被中国占领了。

第 3，流亡藏人不要再分地域、教派，而要真正团结起来。中共打压藏人时，并不会区分你是康巴人、安多人，还是卫藏人；也不会区分你属于哪一个教派。他们同样打压所有藏人，也同样破坏所有宗教。所以，我们在外的藏人，真的不应该再分什么康巴、安多、卫藏，也不应该再分各个教派。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团结起来，为恢复藏人的自由、为藏民族的独立，做出更多努力。

第 4，不要因为我的行动而停止应该去做的事；真正的哀悼，是继续为图伯特奋斗。如果这一次我要做一个大的行动、一个引起轰动的行动，我双手合十请求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而停止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做的，是为了保存自己的语言与文化。所以，该跳舞的还是要跳舞，该唱歌的还是要唱歌。因为这些都是为了年轻一代的藏人，能够接受并传承自己的语言与文化。特别是现在，我们即将迎来尊者达赖喇嘛九十一岁华诞。我希望全球各地的藏人，都要盛大举办尊者的祝寿活动。这些都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行动，就只停留在悲哀或默哀之中。

我们真正需要悲哀、需要默哀的，是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此发起更大的行动。我今天要做这个行动，不是因为我缺乏衣食住行，不是因为我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住的，也不是为了我



个人的生活问题。这一切，是为了图伯特的独立，为了图伯特的抗争。因此，我双手合十请求大家：如果你们真的要哀悼我，请按照我在这里所说的愿望去做。希望每一个人都为图伯特的事情继续努力，继续奋斗。最后，我想说：图伯特民族的独立万岁！博嘉洛（图伯特必胜）！！！！

2026年7月2日

编后记：

洛尔然赞（LobgaRangzen）的离世，是一场沉重的悲剧，也是一份无法回避的历史证词。

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他的抗议方式，他在遗言中所表达的，对民族命运的忧虑、对文化遗产的坚持、对自由与尊严的追求，都值得被认真记录。尤其是他提醒流亡者不要因身处自由社会而忘记仍在高压之下的人，这不仅关乎西藏，也关乎所有被专制统治压迫的人群。

《在野党》刊载此文，是为了保存这份公开遗言的文献价值，也是为了提醒读者：真正的纪念，不应止于悲伤，而应继续关注那些仍被剥夺自由、信仰、语言、文化与尊严的人。

愿逝者安息。愿自由终有归途。

资料来源：

本文遗言内容主要根据以下公开资料整理：

- 1、“华语青年挺藏会（LhasaSpring）”发布的《洛尔然赞遗言》听译整理；
- 2、洛尔然赞（LobgaRangzen）生前公开发布于Facebook的视频及文字内容；
- 3、网络公开报道及现场公开视频等公开资料。

由于原视频为藏语，经公开中文听译后整理，本文无法保证所有细节与原始藏语表达完全一致，如有出入，请以原始视频内容为准。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 ***The Final Testament of Lobga Rangzen: Last Public Statement Before His Self-Immolation on July 2, 2026***

*This article documents the final public statement of Tibetan activist Lobga Rangzen before his self-immolation outsid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on July 2, 2026.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he raised the Tibetan Snow Lion flag, began a livestream on Facebook, and set himself on fire in protest against Chinese government policies in Tibet. He later died from his injuries. The article explains that "Rangzen," meaning "independence" or "freedom" in Tibetan, was a name he deliberately adopted to reflect his political convictions.*

*Based on publicly available video recordings and translated transcripts, the article reconstructs the principal themes of his farewell message. Rather than directing criticism toward Tibetans living inside Tibet, whom he praised for their courage under severe political pressure, Rangzen addressed members of the Tibetan exile community. He urged them to recognize the responsibilities that accompany life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avoid internal divisions, strengthen unity across regional and religious differences, and continue preserving the Tibetan language, culture, relig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statement argues that Tibet's hardships originate from the loss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calls upon Tibetans abroad to remain committed to what the speaker described as the struggle for Tibet's future. Rangzen emphasized that his action was not motivated by personal hardship, poverty, or despair, but by the hope of drawing sustain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Tibet and encouraging continued public engagement.*

*He also asked supporters not to suspend ongoing cultural, educational, or community activities because of his death. Instead, he urged them to continue celebrating Tibetan traditions, transmitting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to younger generations, and commemorating the Dalai Lama's birthday. In his view, genuine remembrance would consist not of prolonged mourning but of continued dedication to the causes he regarded as essential.*

*The editorial note concludes that, regardless of differing views regarding his method of protest, his final message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document reflecting concerns about cultural preservation, human dignity, religious freedom, and the future of the Tibetan people. It states that the article is published to preserve the documentary value of his publicly released testament and to encourage continued attention to communities living under political repression and restrictions on fundamental freedom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独立日与自焚者

——写在美国独立日

作者：袁平

今天是美国独立日。这是一个本应值得欢庆的日子。

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向世界宣告：人人生而平等，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对于一个经历过专制社会的人来说，自由两个字，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东西。

然而，今年的独立日，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就在两天前，7月2日，一位流亡藏人——洛嘎·让赞（LOGA RANGZEN），在联合国总部前点燃了自己的身体。我已经记不起，这是我所知道的第多少起藏人自焚事件。但每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我都会沉默很久。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则新闻。

2009年开始，我在四川阿坝州工作、生活了五年多。此后的十几年里，我的人生轨迹几乎一直围绕成都和阿坝州展开。也许是因为我曾是一名NGO志愿者，也许是因为我从事的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许只是因为我喜欢与当地人喝酒聊天、真诚相待，所以我有机会听到许多普通人永远不会知道的故事。

这些讲述者中，有参与过镇压工作的体制内人员，也有被镇压者的亲人、朋友和同学。

他们告诉我，他们如何向藏人开枪；告诉我人被打死后的样子；告诉我抓捕后的藏人被押进军营，被扒光衣服，再被关进用螺纹钢焊成的铁笼。那个笼子的高度，只够一个成年人匍匐爬行。他们长期被关在里面，风吹日晒，吃喝拉撒都在笼中完成。

还有人向我讲述，他们如何与军人一起，用枪托砸向那些抬起头来的藏人，又如何站在铁笼上，对着里面的人撒尿，以此羞辱他们。直到今天，这些画面依然停留在我的脑海里。

与此同时，我也听过很多藏族朋友讲述他们亲人、朋友和同学的遭遇。有人因此终身残疾，有人永远失去了生命。

我甚至曾经与一位刚从印度见过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的老活佛有过很长时间的交流。他是我一位藏族兄弟的亲叔叔。让我惊讶的是，他能说一口极其标准的普通话。他说：“这普通话，是我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坐了十八年牢学会的。

那一刻，我沉默了很久。

2009年以前，我从未真正进入过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直到汶川地震改变了我的人生。

借着志愿者的身份，我走遍了四川、青海许多藏族聚居区，也去过凉山彝族自治州，还曾在新疆一位哈萨克族朋友家生活了一个多月。这些经历，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国少数民族处境的理解。

小时候，我生活的城市里，经常能看到推着小车卖葡萄干和羊肉串的新疆商贩，也能看到腰间佩着藏刀、蹲在街边卖藏药的康巴汉子。我偷偷抓过人家的葡萄干，也偷偷摸过康巴汉子的藏刀。他们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对我发过火，总是一脸憨厚地笑着。

后来，一切慢慢变了。

社会上开始不断流传各种关于他们的传闻。有人说藏人一言不合就拔刀。有人说新疆人偷鸡摸狗、横行霸道。甚至有人说，他们杀了人警察也管不了。慢慢地，人们开始害怕他们、排斥他们。

我在成都武侯祠附近，不止一次看见这样的画面：一位藏人正常走在人行道上，迎面走来的汉族人却主动绕开。而那位藏人什么也没做。我后来才明白，这种恐惧，并不是来自真实的相处，而是来自长期的宣传。因为后来认识了越来越多少数民族朋友，我开始知道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并不是所谓的“无法无天”。恰恰相反。他们很多时候，比普通汉人承受着更加严厉的管理。

新疆朋友告诉我，他们已经很多年不敢在公共场合讲本民族语言。更不敢轻易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一旦承认，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很可能就是无休止的盘问。有人因此失去自由。有人只是因为喝醉酒、因为街头争吵、因为一些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被送进所谓的“学习中心”。在那里，家人甚至不知道他们去了

哪里。

我曾经和新疆朋友一起自驾旅行。每经过一个检查站，当地朋友都要下车。查身份证、录指纹、扫虹膜。而作为汉族游客的我，只需要坐在车里等待。每一次，我都觉得极度不舒服。

我终于意识到：同样生活在一个国家里，不同民族的人，所面对的世界竟然完全不同。

很多汉族人把藏区寺院简单理解成“烧香拜佛”。但真正生活在那里以后，我才知道，那远远不是全部。寺院不仅是宗教场所。它还是学校，是医院，是文化中心，也是语言、艺术和历史得以延续的重要地方。许多藏人，就是在那里学会识字。因此，当寺院被限制的时候，被影响的不只是宗教。更是整个民族文化的延续。

前不久公布的新法律第六条写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国家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这是一句很好听的话。但是，一个社会是否真正尊重差异，不应该看它写了什么，而应该看它做了什么。

真正的民族团结，不是让所有民族越来越像。而是每一个民族，都能够自由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信仰与生活方式。

很多人会把洛嘎·让赞的离去称作“自焚”。但在我心里，我始终觉得：他不是死于那一天的火焰。真正一步步把他逼向火焰的，是长期压迫一个民族文化、宗教、语言和信仰自由的现实。

如果一个人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信仰，能够自由传承自己的文化，能够自由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我相信，没有人会选择用这样痛苦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每一次藏人自焚，我看到的都不是一个人的死亡。我看到的是一个民族一次又一次向世界发出的呼喊。也是一个人在生命最后一刻，仍然告诉这个世界：“我们还在。我们没有放弃。”

洛嘎·让赞，我并不认识你。但因为我曾生活在阿坝，曾听过太多藏人的故事，也曾与许多藏族朋友一起生活、工作、喝酒，所以今天，当我看到你的名字时，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则新闻。

你的离去，让我再次想起那些我见过、听过、却始终无法忘记的人。

你的火焰，并没有照亮联合国的大楼，却给我带来了一丝光亮和温暖。它提醒我：不要沉默！

继续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讲出来。哪怕只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这样一个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信仰与尊严，选择燃烧自己。

今天，美国庆祝独立。而我，更愿意把这一天，献给一位为了自由而燃烧自己生命的人。

洛嘎·让赞（LOGA RANGZEN），请安息。

愿你的名字不会随着新闻过去而被遗忘。

愿你的牺牲，不只是短暂地照亮天空，而能成为更多人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相的勇气。

我向你致敬。也向所有为了自由、为了信仰、为了民族文化、为了人的尊严而承受苦难的人，致以最深的敬意。愿有一天，没有人再需要用燃烧自己的身体，去告诉世界：自由，本来就属于每一个人。

编辑：张致君 校对：周敏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 Independence Day and the Man Who Chose Fire

*Written on United States Independence Day, this essay reflects upon the death of Tibetan activist Lobga Rangzen, who died after self-immolating outsid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on July 2, 2026. The author contrasts the ideals expres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ith memories of political repression witnessed while living and working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in the Tibetan region of Aba, Sichuan.*

*Drawing upon personal experiences, conversations with Tibetans, government personnel, religious figures, and friends from Tibetan and Uyghur communities, the essay recounts stories of detention, surveillance, cultural restrictions, and discrimination. It argues that monasteries serve not only as religious institutions but also as centers of education,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al continuity.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the erosion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freedom gradually drives despair rather than any single event.*

*The essay concludes that Rangzen's death should be understood not merely as an individual tragedy but as a symbolic appeal for freedom, dignity,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human rights. It calls upon readers to remember his sacrifice and continue bearing witness to the experiences of oppressed communities rather than allowing his name and message to fade from public memor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以团结之名，行侵略之实

作者：李聪玲

202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中国政府表示，这部法律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然而，在我看来，这部法律并非真正促进民族团结，而是进一步强化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文化、教育、宗教和言论领域的控制封锁的一项立法。我反对这部法律，因为我认为，真正的团结并不能建立在独裁统治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自由、平等、尊重和多元之上。

民族团结从来不是要求所有民族拥有同一种思想、同一种文化、同一种历史叙事。一个真正成熟和自信的国家，应当能够包容不同民族保留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和历史记忆，而不是通过法律去塑造一种唯一正确的民族认同。当国家将特定的民族观念上升为法律要求，并贯穿教育、文化、媒体和社会治理时，这已经最大程度压缩了合法表达和文化发展的空间。

对于许多流亡藏人而言，这部法律进一步加深了他们长期以来的忧虑。西藏的藏语教育、宗教活动和传统文化近年来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管理，因此担心新法律会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使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的传承更加困难。中国政府则表示，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并持续投入资源保护藏族文化、发展教育和改善民生。围绕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及其影响，各方长期存在明显分歧。对于许多流亡藏人而言，这部法律的出台，不仅是一项新的立法，更像是他们长期担忧不断累积后的又一个象征。

就在这部法律生效后不久，一名被流亡藏人组织确认身份的藏人活动人士Lobga Rangzen，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自焚身亡，希望借此引起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据警方，这名男子因严重烧伤死亡；流亡藏人组织表示，他希望通过这一极端方式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的未来以及藏人的处境。中国政府则一贯表示，西藏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并反对任何分裂国家的活动。

没有任何生命应该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他的政治立场，自焚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人间悲剧。它也提醒世人，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的声音长期无法被听见时，可能会采取极端而悲剧性的方式表达诉求。这起事件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也让许多流亡藏人感到，他们的民族认同、文化传承和宗教自由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事实上，自2009年以来，已有一百多名藏人在中国境内以及流亡社区发生自焚事件。这些事件在流亡藏人看来，是对西藏现状的绝望抗议；而中国政府则认为，这些行为受到分裂势力煽动，

危害社会稳定，并依法予以打击。

对于许多维吾尔人而言，这部法律同样引发担忧。近年来，新疆政策持续受到国际关注。一些联合国专家、人权组织以及部分国家政府批评当地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并对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受到限制表示关切；中国政府则坚决否认这些指控，表示相关措施属于依法反恐、去极端化和促进发展的政策，并认为外界批评存在政治化倾向。正是在这种持续存在重大争议的背景下，这部法律可能进一步巩固现有民族治理模式，使民族文化和宗教表达面临更大的压力。

台湾，中华民国，长期以来拥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司法体系、货币、护照、选举制度以及完整的公共行政体系，形成了独立运作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基于这一现实，我认为台湾应由生活在台湾的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不应成为约束台湾社会的依据，也不应通过国内立法影响台湾人民的政治选择。这其实是侵略台湾的另一种说辞。

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稳定的国家，不应害怕人民保留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认同。真正的国家自信，不需要依赖法律去规定人民应该如何理解自己的民族，也不需要通过统一的政治叙事来证明国家的合法性。历史反复说明，民族认同无法依靠命令形成，也无法依靠法律消除。任何忽视文化多样性的政策，都可能削弱信任，而不是增强团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如果在实践中进一步强化对民族认同、宗教活动、语言教育和文化表达的管控，而缺乏充分保障合法文化权利和表达空间，可能会进一步加深部分少数民族群体的疏离感，而不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团结。

我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希望未来有关民族事务的立法能够更多建立在尊重人权、保护文化多样性、保障公民自由和坚持法治原则的基础上。我相信，一个真正团结的社会，不是所有人都说同一种声音，而是不同民族都能够在平等、尊严和自由中生活，共同塑造彼此信任的未来。真正的民族团结，不是统一思想，而是尊重差异；真正的国家强大，不是消除多元，而是能够包容多元；真正持久的稳定，不是来自恐惧，而是来自人民对公平、自由和尊严的共同信任。

编辑：李晶 校对：王滨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广西横州水库溃坝洪水

—— 苦难之地上被反复重演的失责

作者：周敏



2026年7月6日21时，横州市娘山水库水位已达88.15米且仍在上涨。当地水利部门直到深夜23时才发布通告，决定于次日凌晨2时30分开闸泄洪，要求横州镇、莲塘镇通知涉及的村庄群众远离河道。从发现险情到实际泄洪，留给下游群众的反应时间三个半小时，这短短200分钟是在深夜——手机信号本就容易在暴雨中中断，村民酣睡，村干部逐户敲门通知的效率可想而知。

而在几十公里外的六蓝水库，情况更为凶险。据下游村民梁微转述，8点通知泄洪，9点多堤坝就塌了——从通知到决堤，几十分钟而已。何等仓促。

六蓝水库坝体最终出现两处溃口，总长约50米，洪水直冲云表镇下辖的邓圩、振兴、黄菴、亚陂等多个村庄，部分区域水淹二楼。据南宁市应急管理局通报，此次洪涝灾害受灾人口约5.5万，转移疏散4.8万，另据多方消息，横州因灾死亡、失联人数持续攀升。

同时发生了两个灾难：泄洪与决堤。前者是有预案、有闸门控制的主动排水，后者是坝体本身失去控制的被动溃决。横州这次的实际情况，是官方通报的“漫顶、决堤”——也就是说，是一次没能及时调洪、最终酿成溃坝的险情。把泄洪当作事后解释的挡箭牌，掩盖不了大坝本身管理和预警的失败。

六蓝水库其实早已被官方点名为问题水库，且有村民反映，险情发生前一天水库已经蓄满了。一座已知存在隐患的中型水库，承担着十几万亩农田灌溉任务、下游又是人口密集的乡镇村落，为什么没有在汛期来临前完成除险加固？为何直到坝体开裂、水位逼近极限，才仓促决定开闸？这些问题比半夜泄洪更值得深究——

失责不单单发生在泄洪的那一瞬，而是隐藏在此前数月甚至数年的隐患排查与投入之中。

近些年，从郑州7·20地铁隧道进水，到涿州为保京畿而分洪淹没大片农村，几乎每一次极端降雨引发的重大伤亡，事后复盘都会指向同一组问题：预警发布滞后、基层通知不到位、工程设施带病运行、决策链条冗长。郑州事故后，国务院调查组认定其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处理了数十名相关责任人。但公众普遍的感觉却是，处理停留在行政处分层面，没有对决策链条更高层级的追问，也未能转化为可验证、可监督的制度改进。涿州分洪的争议则更进一步：为保护上游城市而牺牲下游农村的决策逻辑本身有其防洪工程学上的合理性，但决策过程是否充分论证？受灾群众的知情权和补偿是否到位？至今缺乏透明的公开说明。

这次横州，同样的剧本，同样的家园尽失、生灵涂炭。

古代治水同样依赖人力和经验，技术条件远远逊于今日，但问责机制要直接得多。比如明代，对河防官员实行严格的岁修考核，堤防失事导致伤亡，主管官员依情节轻重要被杖责、革职乃至更重的惩处。且这种问责通常发生在事故之后不久，责任人是谁、受了什么处分，是可以公开追溯的。这套制度当然有其时代局限，但它至少建立了一条清晰的因果链：谁主管、谁负责、出了事谁承担。

今天的问责机制在技术能力上远胜古人——遥感监测、水位预警系统、应急指挥体系一应俱全。但在责任落地这一环，却比古代更加模糊。灾害发生后，通报中充斥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搜救转移”这类程序性表述，偏偏很少看到对“为何险情发现到预警发布之间存在数小时空窗”、“为何已知隐患水库未能提前加固”等



具体问题的正面回应。技术进步了，但透明度和问责的具体性没有同步提升，这才是问题。

这次横州灾情中，还有一个值得记录的现象是：大量最初的求救信息，来自身处异地、通过社交平台为家乡父母求助的普通网民，而不是官方来主动通报。云表镇一位居民的父母被困在了两层自建房顶楼，是女儿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后，才联系上了应急部门，得到的回应却是：救援行动已经展开，但由于洪水涨势过猛，呼吁市民先自行前往高处——这是不是把最初的自救责任推回给了受灾群众本身？与此同时，本地民间自发组成的救援队伍，在断网断电、道路被淹的情况下持续搜救转移群众，成为实际救援力量的重要补充。

但民间救援长期面临的困境是：缺乏统一协调、没有官方授权往往寸步难行，装备、信息、人力都要自行解决，一旦深入险情区域出现意外，责任归属也不明确，这使得很多本可以更快抵达现场的民间力量，不得不在“救不救、怎么救”之间反复权衡。一个健康的应急体系，理应是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的协同，而不是让民间在审批空白与责任真空中自行摸索。如果政府救援迟缓，又不能为民间救援提供便利通道和明确规则，受灾群众实际上是两头落空。

批评这类事件，不是简单地情绪宣泄，而是要把几个具体问题铺开在桌子上，倾听一个清晰的答案：

六蓝水库作为已知的“问题水库”，此前的除险加固计划执行到了什么程度？谁对此负责？

从险情预警到实际泄洪/决堤之间的时间窗口，是否符合应急预案的最低标准？如果不符合，是谁在哪个环节延误了？

民间救援力量在此次灾害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官方是否应当、以及将如何为民间救援提供更明确的协作机制？

此次灾害的死亡、失联人数最终核实结果如何？相



关责任人是否会被问责，问责结果是否会公开？

这些问题的答案，悬而未决。灾情在笔者打字的同时还在发展中。一些说法（包括社交平台上流传的、尚未获得官方或主流媒体证实的很多求救、遇难细节）仍需要时间和更多信源去核实。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次事件的问责最终仍旧止步于几份谨小慎微的通报，那么下一次暴雨时，会不会又一个深夜发出的泄洪通知，把同样的悲剧再来一遍。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 *The Hengzhou Reservoir Disaster: Accountability Repeated on Flooded Ground*

*This article examines July 2026 flooding linked to the Niangshan and Liulan Reservoirs in Hengzhou, Guangxi, and argues that the disaster reflected recurring failures in flood management, infrastructure maintenance, emergency warning, and accountability. It notes that downstream residents received limited notice before water discharge and the subsequent dam breach, leaving people little time to evacuate during the night.*

*The article distinguishes planned water release from uncontrolled structural failure. It argues that reports of overtopping and breach raise questions not only about emergency operations but also about earlier inspections, reinforcement work, risk assessment, and reservoir management. If Liulan Reservoir had already been identified as unsafe, the author asks why repairs were not completed before the flood season.*

*Comparisons with earlier disasters in Zhengzhou and Zhuozhou suggest repeated patterns of delayed warnings, aging infrastructure, slow decision making, and opaque investigations. The article highlights the role of residents and volunteer rescue teams, many of whom relied on social media while official information remained incomplete.*

*The author calls for disclosure of casualty figures, maintenance records, emergency timelines, rescue coordination procedures, and accountability findings. Without transparent answers and enforceable reforms, similar warnings may arrive too lat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六蓝水库溃坝，人民之觉醒

作者：王海舟

横州六蓝水库服务站7月6日深夜2点30分发布通告第4号函称经会议商讨，6点整水库闸门全开泄洪，大雨是天灾，但水库深夜预警泄洪和“塌方”难道不是人祸？深夜开会，凌晨泄洪，是故意想让大家在熟睡中安乐死吗？

2026年7月6日上午，广西南宁市横州市六蓝水库坝体出现严重缺口，洪水倾泻而下，瞬间吞噬了下游的六蓝村、独田村、官平村等村屯。房屋被淹没至二楼，车辆被无情卷走。据网友现场投稿，受灾人口已达30万以上，失踪人数达数万人。台风“美莎克”的强降雨是诱因，但六蓝水库的决堤彻底将灾害推向深渊。

必须正视的是，在中国很多洪水灾难中，主因往往是人祸而非天灾。大坝泄洪时机不当、对下游民众通知不及时，经常导致更严重的次生灾难。不下雨不泄洪、一暴雨就集体泄洪或决堤，这种人为灾害年年上演。政府就是灾难的制造者，人民的生命只是用来制造新闻或掩盖事实的工具。7月6日横州六蓝水库溃坝，数千村民逃难至村头山坡，24小时内山坡区域网络信号以及通信信号全部被屏蔽。

而在六蓝水库溃坝的同一天，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地震救灾的发电机、净水机、帐篷、毛毯等首批80吨中国政府援助物资已经通过包机抵达委内瑞拉。

7月7日，新闻发言人毛宁宣布：习近平主席向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代总统致慰问电。中国政府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基础上，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援助，中国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现汇援助。自己国家水深火热，救灾不力；对外援助打肿脸充胖子，不遗余力。

广西人民一定记住这一天，中国人民也请记住这耻辱的一天。

80吨救灾援助委内瑞拉已经送达，但广西灾民们收到多少援助？

由此想到中国政府掩盖了整整50年的世界上最大人为灾难，1975年河南省板桥水库溃坝事件，该事件发生后震惊全球，

24万人在短短6小时内瞬间失踪，1100万人遭受灭顶之灾！板桥的血泪悲剧，至今仍令人心惊胆战！

而此次六蓝水库溃坝事件和当年的惨案如出一辙，同样的灾难面前重复犯错误，这样的政府已经不具备执政能力，也从来没有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生命安全放在眼里。

救援物资没有到，信号屏蔽车先到了，官方一面呼吁民间救援力量组织冲锋舟进行救援，一面又要求民间应急救援力量先得到指挥部的批准，所谓指挥部到底是以救人还是为封消息为目的不得而知。在21世纪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官方总是想掩盖事实，到底在怕什么？

广西六蓝水库2009年除险加固投资7362万，水库总库容9276万立方米，招标书上显示本次加固主要特点为大坝采用混凝土防渗墙加高压摆喷加固。溢洪道原为开敞式实用堰溢洪道改建道，按100年一遇洪水设计过闸流量达到1469m<sup>3</sup>/s，达到大（2）型水闸，结果就是泥巴墙抹了层水泥。

在2023年又再次启动了总投资高达3.8253亿元的灌区改造加固项目。巨额资金本应换来安全屏障，可短短三年后，它就在暴雨中垮塌了约50米。面对惨烈现实，人们不禁质疑：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工程款是否被贪污？施工是否存在偷工减料？“刚加固就决堤”明显是利益输送、质量稀释的典型案例，严重动摇了公众的信任底线。

中国水坝主要是土石坝结构，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门槛极低—泥土、碎石就地可取，无需工厂生产，普通劳动力即可施工，是人类最古老也最普及的筑坝方式，全球各国早期水利建设均以此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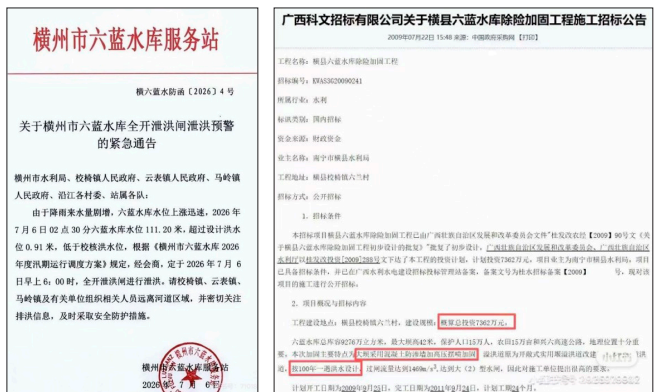
中国的比例之所以更极端，与特定历史背景直接相关：现有水库中87.1%的堤坝建于1979年以前。近半数坝龄已超过50年，彼时主要依靠群众运动式的「土法施工」，既无精密浇筑技术，也无充足资金，混凝土坝根本无法大规模推广。加之中国小型水库占全部水库数量的95%以上，这一规模的工程因为当时的技术和原材料局限，不得已选用造价低廉的土石坝。

因此，土石坝高占比，是中国在极短时间内、以极有限条件建造全球最多水坝的必然结果。

专业人士指出：中国多数坝龄已超过50年，当时主要依靠群众运动式的“土法施工”，这些水坝现在全部是安全隐患。

这么看来，毛泽东时代的遗祸和危害还远远没有结束；而习近平则把这场对人类思想以及躯体的屠杀和毁灭之祸又上升到了极致。把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当泄洪代价，这笔账，到底该谁来埋单？！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 中国 60 年来十大国耻

转载自“全球热门网”w8.smirt.ch

## 之一：国共内战

八年抗战，不是中国的耻辱而是光荣。但是此后的国共内战，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国耻。当打败共同的敌人后，即便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我们竟然没有智慧和诚意找到一个和平建国的可行办法。淮海大陆，140万中国儿女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相残杀！当一个中国农民的孩子把刺刀恶狠狠地捅进另外一个中国农民的孩子胸膛的时候，无论是毛还是蒋，都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几年前，《大决战》上映，面对这种手足相残，电影院里一片欢呼，这欢呼，是这种耻辱的更耻辱的注解。

## 之二：北韩冤魂

无论那场战争，胜也罢，败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把半个韩国的人民圈于一个人类最残暴的政权下60年！是我们使他们在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中受尽煎熬！历史不会原谅我们的！感谢美国吧，使我们的罪孽减少了一半。

## 之三：反右

摆出谦虚的态度，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实际却是“引蛇出洞”，好一网打尽。世界上，除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欺骗，有比这更无耻的事情吗？

## 之四：三年饥荒

这场饥荒的耻辱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其始作俑者都要以“自然灾害”来掩饰——这其实使耻辱更加强烈。在饥荒的时候，我们在大批出口粮食；在饥荒的时候，我们拿出了比苏联债务更多的钱去援助第三世界；在饥荒的时候，凤阳书记感喟：多好的劳苦人民啊，宁可饿死也不抢国家粮食...这话反过来就是：多奸的政府啊，看着老百姓饿死也不打开仓救济。

## 之五：十年文革

那是一场活动，也是一场耻辱。一个民族做了这样的事情，就根本没有资格再自吹自擂。提起日本侵略者，中国人会把一堆的贬义词奉上。可是，日本人最起码没有这样对待日本人吧？什么样的民族会把自己的国家精英关进牛棚？什么样的民族会把自己的社会脊梁摧残殆尽？什么样的民族会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答案已经有了：中国人！

## 之六：篡改历史

中国其实是最没有资格指责日本篡改历史的。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把对中国有天高地厚之恩，存亡续绝之义的盟友描绘成野心狼。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闭口不提为国血战捐躯的国军将士的赫赫功勋。中国的历史教科

书，把在东北犯下滔天大罪的苏联当成恩人。中国的教科书，竟然指责美国扔下原子弹。

## 之七：中国农民

在奴隶时代，人生下来就被区分为贵族和奴隶。在中国，人生下来就被区分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如果你不幸成为前者，那么你生而低人一等，无法享受和后者一样的公民权。无法享受和后者一样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生为农民，你将承担城市人三倍的赋税，将无法自由迁移，无法和城市人享受同样的工作待遇，你甚至不拥有世代耕种的土地，因为那是国家的。这样的制度，这样一个现代的农奴制度，存在了近60年。在21世纪，依然存在。一个民族的奇耻大辱。

## 之八：一九八九

我无意讨论这件事情的是是非非，那太危险（这种危险本身也是一种国耻），我只想问一句：难道我们——不仅是政府，还包括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没有能力和智慧和平解决这件事情，而必须用这样一种惨烈的方式吗？当一个民族只会用枪杆子，而不用正义和真理的力量去解决问题的时候，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吗？

## 之九：克拉玛依大火，九江决口，SARS，矿难

这似乎不是一件，但从更深一点的层次，它们的性质完全是相同的。他反映了一个自诩为人民代言人，自诩为人民利益代表的政权，堕落到了何等的地步。

克拉玛依的那句：让领导先走，已经彻底撕毁了一个执政党当年成立时赤裸裸的信念。九江决口后的庆祝晚会里那群众鱼贯呼万岁的镜头，让世界为之呕吐。SARS从星星之火累及世界，是中国对世界人民犯下的罪行。至于最后一项，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以至于很多人已经习惯性的麻木了。

## 之十：审查，屏蔽

21世纪，一个宪法保障人民公民权的国家，一个宪法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的国家。竟然不允许自己的公民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一个帖子竟然仅仅因为含有敏感词而被屏蔽，一个有完全行为能力和思考能力公民的观点竟然需要被审查！中国的公民是什么？是昏智还是幼童？需要别人来“导向”，来代替我们思考！真是极烂极臭的，如果有人惧怕真相，那么我高度怀疑：他其实知道自己蛮横的，并不是真理。

编辑：钟然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网络长城的“新城门”

——从输出红色革命到输出数字威权

作者：漠北独侠

在极权政治的叙事逻辑中，“控制”与“渗透”永远是一体两面的核心课题。海外媒体披露关于北京计划在严密监控下，允许“走出去”与“请进来”两类特定人群通过官方合规通道访问国际互联网的消息，恰恰为这一逻辑提供了最新的注脚：“暴力”+“谎言”治国。

这绝非中国互联网走向真正开放的信号，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数字出征”。其背后折射出的，依然是这个政权赖以起家且从未动摇的治国方略——“枪杆子（刀把子）+ 笔杆子”，即“暴力”加“谎言”的现代翻版。

核心逻辑的“与时俱进”：旧瓶装新酒的数字传教

从历史的纵深来看，此次大幅扩大体制内人员“持证翻墙”的范围，其一贯逻辑与一个甲子前向东南亚及全球输出红色共产理论、鼓动暴力颠覆别国政权的做法并无二致。

六十年前，输出的是粗砺的阶级斗争口号；而今天，裹挟在高效、快速、极具煽动力的互联网叙事中的，是精心包装的“大外宣”话语。在对内筑起更高、更严密的“网络防火墙”，严厉打击普通民众使用VPN等“翻墙”行为的同时，官方却组织起一支“政治绝对可靠”的互联网正规军。这种“只许我输出，不许你流入”的策略，旨在国内形成彻底的信息真空，在国外实现精准的舆论污染。

这本质上是一种披着互联网技术外套的隐密意识形态输出，其性价比更高，爆发力更强，破坏性也更具隐蔽性。

环环相扣的“大棋局”与混乱制造者

这套日臻成熟的“网络舆论战”与“混合战”战法，在近年来的国际局势中已初显成效。从欧洲极右翼与极左翼思潮背后的网络水军推波助澜，到美国大选期间的虚假信息认知战，再到东亚邻国的舆论分化，其终极目的清晰可见：唯恐天下不乱，趁乱谋取地缘利益。

在这盘步步惊心的大棋中，互联网舆论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整体战略紧密交织：

供应链武器化：从稀土等稀缺原材料的出口管制，到关键药品的供应链卡脖子。

灰色地带冲突：从频繁发生的关键海底光缆“意外”中断事件，到由国家背景黑客发动的针对西方基础设施的互联网军队攻击。

终极宏大叙事：所有这些看似孤立的“点火”行为，最终指向的都是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将全人

类的命运、数据、言论与财富都攥在极权手心的威权乌托邦。

破局之法：打破不对称，重筑自由世界的防线

面对这头兼具暴力与数字化谎言的庞然大物，国际社会与自由力量如果继续采取传统的、被动的“对等原则”，势必将在不对称博弈中节节败退。破解这套“数码极权输出”的组合拳，必须直击其痛点：

## 1. 打破信息黑箱：定向精准“推墙”

既然北京最恐惧的是国内民众获知真相，那么自由世界最强有力的反制不是被动防御其“外宣”，而是主动向中国国内定向输送真实，未经过滤的信息。加大对反封锁技术（抗审查翻墙工具、卫星互联网等）的研发与资金投入，让中国普通民众能够自由连接世界，从根本上瓦解其国内的洗脑基本盘。

## 2. 建立法律与技术防火墙：严惩“持证网军”

国际社交平台 and 西方政府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些在省级、国家级网信办层层政审、备案后“奉旨出征”的账号，绝非普通网民，而是由国家机器驱动的“舆论军人”。必须建立严格的身份溯源机制，对于来自特定官方通道、有组织操纵舆论的账号，应果断予以封禁和制裁。同时，在法律层面将此类行为定义为“外国代理人”的隐蔽干涉。

## 3. 强化基础设施弹性与技术反制

针对黑客攻击、切断海底光缆、供应链要挟等物理和数字层面的混合威胁，自由阵营必须加快推行供应链重组与去风险。建立多轨制的备用网络（如低轨卫星通信网络），提升关键基础设施的免疫力，并在遭受国家级网络攻击时，保留实施“对等反击”的威慑能力。

历史早已证明，依靠暴力维持的体制，必须依赖谎言来续命。企图通过选派大量党员干部冲进国际互联网来抢占所谓的“宣传制高点”，恰恰暴露了其对自由信息和真相进入国内的极端恐惧。多披一层互联网的外套，改变不了其反人类、反自由的本质。自由世界唯有放弃幻想，以攻代守，方能在这场数字时代的文明攻防战中，彻底粉碎其威权扩张的迷梦。

早已是惊弓之鸟的中共，妄图以互联网之“网”护其政权免于崩溃，妄想症再次加重而已。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君不见星链和美国的破墙计划步步为营、进逼围剿，挣扎苟活的中共只能望“网”兴叹、徒唤奈何。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谁在害怕真相？

作者：张宇

小洛熙已经离开我们半年多的光景了。

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尚未学会说话，尚未来得及认识这个世界，却在一场本应救治生命的医疗过程中失去了生命。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社会而言，当这样的悲剧发生，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应该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做出了关键决定？手术是否必要？风险是否被充分评估？责任是否存在？制度是否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原本应当成为事件发展的中心。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却看到了一幅越来越荒诞的画面。围绕小洛熙死亡本身的讨论逐渐被边缘化，而围绕她父母、支持者以及发生者的关注却不断增加。那些要求公开调查的人被警惕，那些持续追问的人被质疑，那些从全国各地赶来提供帮助的陌生人被贴上各种标签。原本应当面对质询的对象逐渐退到幕后，而提出质询的人却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仿佛在不知不觉之间，问题已经发生了转换。

一个婴儿为什么会死，似乎不再是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还有人不断追问她的死亡，反而成为新的问题。

当一个社会面对悲剧时，如果焦点开始从事实转向提问者，从责任转向质疑者，从调查真相转向管理舆论，那么真正被改变的就不仅是事件本身，而是整个社会处理问题的逻辑。

人们会发现，在很多公共事件中，总有一种熟悉的轨迹不断重复：问题出现、公众追问、舆论升温、讨论的重心开始转移；不再是谁造成了问题，而是谁在传播问题；不再是谁应该负责，而是谁在组织关注；不再是真相是否被查明，而是声音是否被控制。于是，真正的问题被不断后移，而提出问题的人则越来越靠近风暴中心。这也是为什么小洛熙事件已经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医疗责任的讨论。

它正在变成一面镜子。

透过这面镜子，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不只是一次医疗争议，而是一套更加深层的治理逻辑：当中国共产党无法迅速消除问题时，它往往会优先消除问题带来的影响；当真相可能引发更多追问时，追问本身便会被视为风险；当公众要求解释时，管理公众有时比解释问题更加重要。

因此，这篇文章真正想讨论的，并不是某一场手术的技术细节。而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失去了生命。那么今天，究竟是谁还在害怕真相？

## ●从医疗事件到维稳事件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当一名婴儿在医疗过程中死

亡，事件的发展方向应该十分清晰：公众关注事实，媒体追踪调查，家属要求解释，监管机构查明责任。整个社会围绕着同一个核心问题运转：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然而在中国，许多公共事件的发展轨迹却往往截然不同。

最初，人们讨论的是事故本身，但随着时间推移，讨论的重点却逐渐从事故转向舆论，从责任转向稳定，从真相转向控制。原本应当被放在显微镜下审视的决策过程、监管机制和责任链条，反而慢慢退到幕后。而那些不断发声的人，那些要求调查真相的人，那些拒绝接受含糊解释的人，却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

这并非偶然。

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长期建立的治理逻辑中，许多公共危机首先被定义为“稳定问题”，其次才是“责任问题”。当一起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时，体制最优先考虑的往往不是如何公开透明地回应质疑，而是如何防止事件继续扩大影响。于是，一个原本关于生命与责任的事件，开始被纳入维稳框架之中。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治理体系最具争议、也最令人不安的地方。

一个真正自信政府不会害怕调查，因为调查能够证明自身的清白；一个真正尊重生命的政府不会害怕追问，因为追问能够帮助发现问题；一个真正相信法治的国家不会害怕公众监督，因为监督本身就是法治运行的一部分。

但当一个政权对质疑表现出本能的紧张，对讨论表现出持续的警惕，对公众形成共识表现出明显的不安时，人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它究竟是在维护真相，还是在维护权力的形象？

中国共产党经常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但在许多公共事件中，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优先顺序：首先考虑舆情是否可控，其次考虑事件是否扩散，然后才轮到责任是否厘清。这样的逻辑之下，生命容易被抽象成为数字，家属容易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而社会关注则被当成需要处置的对象。

也正因为如此，小洛熙事件所引发的讨论，早已超越了一场单纯的医疗争议。它让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痛，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治理惯性：当问题出现时，中共体制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如何回应问题，而是如何管理问题带来的影响。

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今天讨论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婴儿的死亡，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当悲剧发生之



后，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在寻找真相，还是在寻找让人停止追问真相的方法。

• 帮助他们的陌生人也会成为目标？

如果说小洛熙父母遭遇压力还可以被解释为维稳体系对于“事件当事人”的惯性反应，那么更值得警惕的现象是：那些与事件毫无直接关系、只是出于同情和良知而提供帮助的人，也开始成为被关注和被怀疑的对象。

在许多国家，当一个家庭遭遇重大不幸事件时，来自社会的支持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陌生人捐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志愿者协助整理资料、媒体帮忙传播信息，这些都是公民社会自发运转的一部分。它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仍然存在信任，也意味着当个体面对强大机构时，不会被迫独自承受一切。

然而在中国，这种自发的社会联结却经常被赋予另一层含义。

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小洛熙事件，当一些陌生人从全国各地到宁波来声援家属、帮助维权、陪伴他们继续追问真相时，围绕这些支持者的质疑和警惕也随之出现。在一些官方网络舆论中，人们熟悉的标签再次出现：有人被怀疑是“境外势力企图分裂”，有人被暗示“借机炒作”，有人被怀疑是“别有用心”，有人甚至被指责是在制造对立、影响稳定。

这样的逻辑其实并不陌生。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公共事件时，往往并不把公民之间的自发组织视为社会活力的一部分，而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潜在风险。因为对于高度依赖集中控制的治理体系而言，最令人不安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人们开始因为这个事件而形成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联接。

这正是维稳逻辑最核心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害怕的往往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引发的社会共鸣。

因此，人们经常看到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面对公众的质疑，中国体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如何回应质疑；面对社会的关注，首先考虑的也不是如何公开信息。相反，更多精力被投入到控制影响、限制扩散和削弱关注之中。原本应当被鼓励的社会互助，被怀疑为有组织行动；原本应该被尊重的公民参与，被视为需要警惕的因素。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维护秩序。但从更深层来看，它反映的是一种对社会自主力量的不信任。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批评中国共产党的维稳体系已经形成一种固定模式：当问题无法迅速解决时，注意力便转向那些持续关注问题的人；当公众无法被说服时，重点便转向如何减少公众之间的联系；当真相无法尽快平息争议时，管理争议本身往往会被置于更优先的位置。

然而，一个值得所有人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离世之后，人们给予家属支持都能被视为风险；如果普通公民表达同情、提供帮助都可能被怀疑

为别有用心；如果社会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联结都需要被纳入维稳视野，那么真正受到威胁的，究竟是社会稳定，还是社会本身？

• 中国共产党最害怕什么？

中国共产党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具体事件。

它害怕的，是人们通过一个事件开始形成共同认知；害怕的是原来互不认识的人因为同一种愤怒而站在一起；害怕的是公众在官方叙事之外建立属于自己的判断体系。

对于一个拥有庞大宣传系统和严密社会控制体系的执政党而言，最重要的并不仅仅是管理现实，更是管理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当一种解释能够被普遍接受时，统治成本会大幅降低；但当越来越多人开始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得出结论时，中共独裁者的权力对于社会认知的控制力就会逐渐削弱。

因此，中国共产党最敏感的，从来不是单个受害者，而是受害者背后逐渐形成的公共共识。

从这个角度看，小洛熙事件所触碰的，其实正是中国共产党最不愿意面对的东西——社会自发形成的信任与联接。在官方控制之外，人们互相帮助；在官方控制之外，人们互相交换信息；在官方控制之外，人们独立思考。这种过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独立公共空间的出现。而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最警惕的，恰恰就是这种不依赖中共权力授权而形成的公共力量。

对于任何权力而言，最难控制的从来不是愤怒。

而是觉醒。

一个社会是否文明，不在于它如何对待强者，而在于它如何对待最弱小的人；一个政权是否自信，也不在于它拥有多么强大的权力，而在于它是否有勇气面对真相。

如果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离世之后，最需要被管理的是声音，最需要被压缩的是讨论，最需要被警惕的是关心她的人，那么我们不得不追问：究竟是谁在害怕真相？

因为真相从来不会伤害一个正当的制度。

害怕真相的，绝对不是失去孩子的父母，不是要求解释的公众，也不是伸出援手的陌生人。

真正害怕真相的，永远是那些无法面对真相的人。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民主不只是少数服从多数

作者：吕峰

很多人对民主有一种简单甚至片面的理解：少数服从多数。

这句话没有错，但并不完整。

试着想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成为了少数，你希望多数人如何对待你？

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倾听，自己的意见能够被尊重，而不是因为人数较少，就被忽视，甚至被迫作出牺牲。

因此，少数服从多数，只是民主作出公共决策的一种程序，而不是民主的全部。如果民主只是简单地让51%的人决定49%的人的命运，那么民主就可能沦为“多数人的暴政”。我觉得真正的民主，不仅要尊重多数人的选择，也要保障少数人的权利，并允许不同意见公开表达、接受讨论和检验。

所谓少数派，并不仅仅是人数较少的人。他们可能是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同宗教信仰者、不同职业群体，也可能只是某一个议题上与你意见不同的人。

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永远属于多数。

今天，你可能站在多数人的一边；明天，你可能因为一次选举、一项政策、一种身份，甚至一句不同意见，而成为少数。因此，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并不是给予少数人特殊待遇，而是在保护未来的每一个人。

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

假设一座城市需要建设一座垃圾焚烧厂。为了整个城市的环境卫生，它可能有建设的必要。但新的问题来了：建在哪里？没有人愿意把垃圾焚烧厂建在自己家附近。对于整座城市而言，附近居民只是少数；但对于这些居民来说，他们却要承担噪音、气味、交通增加以及生活品质下降等影响。如果只是简单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那么既然绝大多数人支持建设，他们似乎就只能接受。但真正成熟的民主社会不会如此运作。即使最终为了公共利益，垃圾焚烧厂仍然需要建设，也不能因为受影响的人数较少，就忽视他们的声音。

政府应当充分公开信息，认真听取居民意见，研究是否存在更合理的方案，并尽可能保障受到影响居民的合法权益。

民主不是保证每个人都满意，而是保证每个人都尊重。

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少数人的意见一定

会被采纳，而是意味着他们拥有表达意见、参与讨论、争取自身权益的机会。多数人作出最终决定，但不能因为人数占优，就否定少数人的尊严和合法权益。

民主还意味着，任何观点都不应因为属于少数而被拒绝表达。

历史告诉我们，多数人的意见并不一定永远正确，少数人的声音也不一定永远错误。例如，伽利略支持日心说时，他的观点长期属于少数；马丁·路德·金争取美国黑人的平等权利时，也曾遭到广泛反对。但随着公开讨论、事实积累和时间检验，他们的理念最终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并推动了社会进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少数人的意见一定是真理。历史上也有许多少数意见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

民主的价值，不是默认多数一定正确，也不是假定少数一定正确，而是让不同观点都有表达和接受检验的机会。一种观点是否正确，不应仅仅由支持它的人数决定，而应当通过事实、理性讨论和时间来检验。

正因如此，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不仅要尊重多数人的选择，也必须保障少数人的权利，倾听少数人的声音。因为今天需要被倾听的是别人，明天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不是没有分歧，而是能够包容分歧；不是要求所有人意见一致，而是允许不同观点和平共存，在讨论中寻找共识，在争论中接近真相。

美国宪政思想家詹姆斯·麦迪逊曾强调，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要体现多数人的意志，也要防止多数人的权力侵害少数人的权利。民主的意义，不只是让多数人赢得投票，更是让每一位公民，无论属于多数还是少数，都能够在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下享有平等的尊严与权利。

民主，不只是少数服从多数。它既尊重多数人的选择，也守护少数人的权利；既允许公共决策形成，也允许不同声音存在。只有当每一个人的尊严都受到尊重、每一种观点都有表达和接受检验的机会时，民主才能不断修正错误、推动社会进步，并真正守护每一个人的自由。

编辑：李晶 校对：王滨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时代沉船与最后的乘客

——现在入党之于1911年当太监？

作者：漠北孤侠

历史总是以一种近乎残酷的幽默在重演。

当“中共105年”的宏大叙事在官方的扩音器里唾沫飞溅时，清醒者听到的却是帝国晚钟的沉闷余响。《爆点周刊》的这组专题，恰如一把手术刀，切中了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焦虑与荒诞：在一个政权不可逆转地滑向衰败周期时，那些削尖了脑袋试图挤上这艘破船者，究竟是在计算一场精明的投机，还是在自掘坟墓？

这个提问，与我长久以来的观察与论证不谋而合。我曾多次以此类比警示身边的年轻人。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认知不仅决定阶层，更决定生死。

当下的乱世通感与民国前夜，历史惊人地齿合了。今天的中国，正弥漫着一种奇特而凄厉的末路狂奔之氛围。这种氛围，经历过1949年前夕民国乱世的人绝不会陌生，而当下的不堪尤甚于当年。

把历史的镜头拉回1949年前夕，那是一个法币恶性贬值、金圆券形同废纸、百业凋敝的绝望时代；豪门权贵垄断了最后的资源，底层官员则朝不保夕；整个社会思潮混乱、人心思变，旧秩序在风雨飘摇中摇摇欲坠；在国际上，那个政权也失去了西方核心盟友的强力支持，彻底陷于孤立。

再看当下，历史的宿命感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地方债台高筑，消费呈现断崖式下跌，大厂裁员潮此起彼伏，百业凋敝的惨状随处可见。官场上更是“官不聊生”，极端的形式主义内卷与选择性反腐并存，人人自危。更可怕的是社会心理的全面崩溃，绝望从底层向上蔓延，戾气在街头爆燃，遍地献忠。而在地缘政治上，脱钩断链，内外交困，国际处境全面恶化。这不仅仅是经济数字的下滑，而是气运的散尽。一种萧杀、凄厉之气在神州大地弥漫。曾经支撑起所谓“盛世”的红利已经全部透支干净。剩下的，只是一个庞大机器在没有润滑油的情况下的剧烈摩擦与空转。

荒诞的当下：1949年加入国民党，还是大清亡国当太监？“现在加入中共”成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黑色幽默。过去，加入体制是一场稳赚不赔的买卖：交出部分的灵魂，换取稳定的庇护、垄断的资源和高人一等的特权。那尚算理性投机。然而，当体制的泰坦尼克号已经撞上冰山，船舱开始进水，甚至连头等舱的贵宾都在悄悄争夺救生衣时，你却还在岸上砸锅卖铁、买一张通往底层的站票。这已经不是投机，这是纯粹的智商欠费。如果说在1949年前夜加入国民党，尚算一场赌徒在收盘前的盲目下注；那么今天，在一个数字化极权已经将社会压榨至极限、经济引擎彻底熄火时刻选择加入中共，其荒谬程度，无异于在清朝灭亡的前夜，主动净身去当太监。你以为能赶上伺候老佛爷的最后一口剩饭，殊不知迎接你的，是整个帝制大厦的轰然倒塌，以及随后无尽的羞辱与清算。

体制已经给不起当年的溢价了。当下的体制内，正在从当年的避风港演变为高风险的绞肉盘。首先是利益在疯狂缩水，降薪潮、砍福利、延迟退休轮番轰炸，体制内的铁饭碗正在变成泥饭碗。其次是责任在无限放大，终身追责制、政治倒查二十年，每一项签字都可能成为未来清算时的呈堂证供。最致命的是绑定的代价极高，数字化极权是一把双刃剑，它记录了所有人的行为，一旦沉船，留在名册上的每一个签字，都是一张无法抵赖的罪恶账单。

历史的大潮往往在极少数人的觉醒中发生质变。年轻人之所以彷徨，甚至在恐惧中选择顺从，根源在于认知的闭塞。天地之道，昭昭如日。世界潮流演变至今日，文明与野蛮、自由与专制的对决已经进入下半场。全球供应链的重组、文明世界对极权主义的合围，已经形成了滔滔之势。这不是某一个党派、某一个集团的胜负，而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在这个节点上，选择脱离中共，甚至以各种形式投入到结束暴政的大潮中，绝非盲目的激进，而是基于底线逻辑的智勇计策。共产恶魔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它的经济逻辑不可持续，它的政治逻辑反人性，它的社会逻辑制造互害。

勇敢地与黑暗切割。当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只要你提前跳出雪域，你就是见证新生的人。

你不需要沦为这场漫长政治噩梦的殉葬品。今天的你手握互联网时代的火把，理应看得更清、走得更快、行得更远。

《爆点周刊》所追问的“中国人该如何走出这场漫长的政治噩梦”，答案其实就写在每个人的选择里。

政权的衰败是物理规律，人心的背离是化学反应。当一个政权需要靠“遍地献忠”的恐惧来维持脸面，靠密不透风的监控来维持稳定时，它就已经在精神上宣告死亡了。

历史不相信眼泪，更不怜悯赌徒。那些至今仍对体制抱有幻想、试图通过入党来分一杯羹的投机者，终将在不久的将来发现，他们以为买到的是通往特权阶层的门票，实际上却是一张通往历史耻辱场的单程车票，必将一同沉入历史最深、最黑的泥潭。顺天应人，断然切割，才是智商测验的“斩杀线”。

编辑：李晶 校对：王滨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从李斯的仓中鼠，看懂环境决定论

作者：概率鹿梦

民国有一件事，今天很多人听了会觉得反常识。

上海的工人，北京的人力车夫，一星期反而能吃上几顿肉。可关中那些家里有地的地主，平时吃的却很差，也就过年吃上点肉，平时连油泼面都没法天天吃。

美国学者史谦德在《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里写过一个细节。

一个从河北逃难到北京的地主婆，住在西城小院子里，有一天掀开隔壁人力车夫家的锅盖，看到的是白面馒头，韭菜炒鸡蛋，凉拌黄瓜，上还浇了蒜末和香油。她当场就愣住了。因为在她原来的认知里，自己家有二百亩地，照理说应该比这种连一垄地都没有的人过得体面。可现实恰恰相反。她家一年到头粗粮掺着吃，对方却能经常吃到白面。

书里还提到，北京的人力车夫一星期至少能见几次荤腥。未必是什么大鱼大肉，可能只是下水，可能只是几片肉，但至少不是长期不沾肉味。反过来看山河四省不少地主，真正吃肉往往要等到年节，平时连白面都舍不得敞开吃。

民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冷链，没有成熟的仓储系统，也没有今天这种可以把物资高效率铺到全国的物流网络。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物资天然汇集，交易更密，流通更快，哪怕只是从城市缝隙里漏出来的资源，也足够让底层人分到一点油水。

可在中原和关中，哪怕你是地主，也只是守着土地。土地能产主粮，不代表能自动变成丰富的副食。当地没有足够发达的交换网络，也没有那么强的商品供给，地主也不会轻易拿好地去大规模养猪养鸡，顶多散养几只，图个过年应景。结果就是，账面上看有地，有产出，有身份，实际吃的并不好。

所以很多人对旧中国的想象是错的。他们总以为地主一定顿顿细粮，城里苦力一定食不果腹。

为什么造成这种现象？

中原地区的地主，手里虽然有地，但所处的社会结构、流通效率、物资丰裕程度，根本不是一个级别。他

拥有的是局部优势，不是系统优势。局部优势一旦离开大环境托举，含金量会迅速缩水。

大城市具有财富溢出效应，我举个现代的例子，香港，别看香港房价非常贵，但是香港收入很高，购买力就强，他们来内地旅游，买内地的商品，购买内地的服务，反而性价比特别高。200块钱如果放在山东的小县城，可能非常值钱了，能从山东大集上吃一周。但在香港也就是一顿晚饭。

同理，北京那些土著，卖一套房子就顶我们济南人奋斗一辈子的，这也是李斯那句仓中鼠和厕中鼠真正厉害的地方。

李斯两千多年前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和粮仓里的老鼠，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老鼠还是那只老鼠，差别却大得离谱。住在厕所里的，只吃污秽，天天吃不饱还提心吊胆，见到人和狗就乱窜。住在粮仓里的，吃积粟，躲在大屋之下，没有惊扰，没有饥寒。于是李斯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它直接戳破了一个现实：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差距，常常不是从能力开始拉开的，而是从环境开始拉开的。你站在厕所边上，再聪明，也要先为活着发愁。你待在粮仓里，哪怕本事没大到惊天动地，也更容易活得体面。

平台不一样，看到的世界不一样，能分到的资源也不一样。你以为地主一定比车夫过得好，恰恰说明你低估了环境对人的塑造，也高估了有产者这三个字的含金量。

所以李斯后来做的第一件大事，不是苦练能力，不是原地熬资历，而是换地方。他离开楚国，去了秦国。他知道继续待在原来的环境里，天花板早就写好了。一个人最怕的，不是眼下吃苦，是真把低处当成了命运，把困局当成了理所应当，把那些消耗当成了成长。

很多人读历史，总喜欢赞叹成功者的才能。李斯有才能，这没问题，但真正让他翻身的那一步，是先看懂了环境。这个判断比很多所谓努力都重要。方向错了，勤奋只会把人更快送进死胡同，让人撞南墙。位置不够好，能力会被压成生存工具，根本长不成资本。资源

薄，机会少，规则坏，人再硬，也很难把自己从泥里拔出来。

贫穷并不只是财富的多寡，贫穷首先是一种资源匮乏的处境。你处在一个资源稀薄的地方，周围没有高质量的信息，没有成熟的分工，没有稳定的信用，没有足够大的市场，你就算比别人更勤快，也只能在小池塘里扑腾。你看到的天花板，很可能不是你的能力上限，是环境先把上限封死了。

说到底，贫穷有三层。

第一层最浅，叫缺钱。这个谁都看得见。

第二层更深，叫缺资源。你想做点事，找不到人合作，找不到渠道，找不到信息，找不到更大的盘子。

第三层最致命，叫待错环境却不自知。很多人一辈子困在第三层。他们很努力，也很能吃苦，也愿意忍，但始终没有离开那个不断消耗他的环境。最后能力没有被放大，时间被浪费了。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换个城市，命运就松动了。有些人换个行业，收入结构立刻变了。有些人进入更高一级的平台，原来不值钱的本事忽然就值钱了。外人看着像逆袭，其实没那么玄妙，无非是从厕中鼠挪到了仓中鼠旁边。人还是那个人，能量却完全不同。因为平台会给能力定价，环境会给努力结算，系统会决定你一分力气能换来多少回报。

很多穷人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不努力，在于对贫穷的理解太道德化了。他们总觉得穷是自己不够拼，不够狠，不够能熬。于是拼命打磨自己，咬牙忍耐，逼着自己继续适应烂环境。最后发现自己越来越累，处境没什么变化。原因很简单，你在错误的地方自我加压，只会让系统更高效地榨干你，就是一句俗话：你越能干活，干的活就会越多。一个人长期待在低势能环境里，连痛苦都会被合理化，他会把本该逃离的地方，当成修行之地。

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什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都是把痛苦合理化，自我安慰，然后继续接受生活的鞭打。

李斯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他没有歌颂苦难，也没有美化出身。他看了一眼老鼠，就把很多人一生都没想通的问题想明白了。你活在井里，你必然认为世界就那么

大。

当然，环境重要，不等于能力无用。能力依然重要，只是它的发挥有前提。你至少得先进入一个让能力有机会沉淀、有机会交换、有机会增值的地方。否则能力会退化成廉价劳动力，见识会退化成生存经验，聪明也足够用来规避风险。

很多人喜欢讲逆天改命，听着热血。可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变化，没有那么戏剧化，也没有那么传奇。真正有效的一步，通常很朴素，就是先离开那个把你越待越穷的地方。离开一套坏规则，离开一个低密度市场，离开一群只会拉你向左的人，离开一个看似能活却很难积累的系统。这个动作，往往比埋头苦干重要得多。

所以，两千年前李斯看透的是贫穷的底层结构。穷，不只是口袋里少了几个钱。穷，是你身边没有粮仓，头顶没有屋檐，背后没有系统。

很多人一生都在证明自己能吃苦耐劳。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别总待在只能吃苦的地方。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Through Li Si's "Granary Rat"*

*Using Li Si's story of the "granary rat and latrine rat," this essay argues that environment often shapes opportunity more decisively than individual ability. It contrasts Republican era urban laborers, who sometimes ate better than rural landowners, to show how access to markets, circulation, and concentrated wealth could outweigh land ownership. A person's advantage depends not only on effort or assets but also on the system that gives those advantages value.*

*Li Si's decision to leave Chu for Qin illustrates this insight. Rather than glorifying hardship or remaining trapped by limited conditions, he recognized that changing one's position could matter more than working harder within a restrictive environment. The essay describes poverty in three layers: lack of money, lack of resources, and failure to recognize that one is trapped in the wrong environment.*

*Ability matters, but it requires a setting where talent can be exchanged, accumulated, and rewarded. The conclusion urges readers not merely to prove they can endure suffering, but to leave systems that convert effort into exhaustion rather than opportuni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为什么我开始向往台湾的民主

作者：李彬妹

如果有人在很多年前问我，什么是民主，我或许只能给出书本上的定义：人民拥有选举权、政府依法行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时候，这些词汇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似乎离普通人的生活十分遥远。我从未认真想过，一个制度究竟会怎样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后来，我开始接触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闻、书籍和历史资料，也逐渐了解到台湾民主发展的历程。随着了解不断深入，我发现，自己向往的并不是某一个地方，而是一种能够真正保障普通人权利的制度。

很多人谈论民主，总喜欢从政治人物、选举结果或者政党竞争开始。但在我看来，民主真正的价值并不体现在这些宏大的政治场景，而是体现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一个社会是否允许不同意见公开存在？一个普通人是否可以公开批评政府而不必担心遭受报复？媒体是否能够持续监督公共权力？法院是否能够依据法律而不是权力作出裁判？这些问题，看似普通，却直接决定了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

我开始关注台湾，并不是因为它没有问题。事实上，没有任何社会是完美的，民主制度同样会出现争议、冲突甚至混乱。但正是因为存在不同声音，人们才能通过公开讨论、媒体监督、司法救济和民主程序不断修正错误，而不是让一种声音长期垄断公共空间。

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台湾社会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几乎无处不在。政府提出新的政策，媒体会持续报道，专家会发表意见，民间团体会组织讨论，普通民众也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看法。最终，一项政策是否合理，不再只是行政机关单方面决定，而是在不断沟通、辩论和修正中逐渐形成社会共识。

有人认为，这样的过程效率太低。我却越来越觉得，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决策速度，而是决策质量。因为每一项政策背后，都关系着无数普通家庭的生活。如果没有充分讨论，没有不同意见的参与，没有对权力的监督，再高效的决定，也可能给很多人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

正因为如此，我越来越理解民主制度为什么如此强调程序。

程序并不是繁文缛节，而是为了防止任何权力轻易越过法律边界。每一道程序，都是对权力的一次约束；每一次公开讨论，都是社会对公共利益的一次平衡；每一次司法审查，都是法律对行政权力的一次提醒。

我逐渐意识到，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不是政府拥

有多大的权力，而是政府愿意接受多少监督。

台湾几十年来的发展，也让我看到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从威权时期到今天的民主社会，它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改革过程。新闻自由不断扩大，司法制度持续完善，政党轮替逐渐成为常态，公民社会越来越活跃。这些变化告诉我，一个社会的发展，并不仅仅依赖经济增长，更依赖制度不断自我修正的能力。

当然，我并不认为台湾的民主已经做到尽善尽美。那里同样存在政治对立、社会分歧和各种现实问题。但是，我更关注的是，当问题出现时，人们可以公开讨论，可以依法监督，可以通过制度推动改变，而不是只能沉默接受。

这种能力，比所谓的完美更加重要。

我曾认真思考，一个普通人为什么需要民主？后来我发现，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普通人没有权力，没有资源，也没有能力去左右公共决策，唯一能够保护自己的，就是一套公平、公开、透明的制度。

民主不是为了让所有人意见一致，而是为了保证不同意见都能够被听见；法治不是为了让政府更方便管理人民，而是为了让政府首先受到法律约束；新闻自由不是为了制造对立，而是为了让真相拥有被社会看见的机会。

正因为不断了解这些制度运行的细节，我开始越来越向往一种真正尊重人的社会。

这种向往，并不是因为某一个地方比另一个地方更加富裕，也不是因为哪一种制度永远不会犯错，而是因为我希望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拥有基本尊严、每一种声音都有表达空间、每一项公共权力都必须接受监督的环境之中。

我相信，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拥有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的科技，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普通人在面对公共权力时，依然拥有法律赋予的底气；能够让每一个家庭在规划自己的人生时，不必担心自己的选择轻易被外界取代；能够让每一位公民在表达不同意见时，依然相信法律会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

也正因为如此，我越来越相信，民主不是一句政治口号，而是一种能够让普通人拥有安全感、尊严感和未来希望的制度安排。正是这种制度，让我看见了另一种社会发展的可能，也让我更加坚定地相信，尊重个人权利、保障公民自由、限制公共权力，才是一个现代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基础。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中国式招标三不讲

作者：武书剑

18世纪，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与之相应的，社会很多方面都出现了变革，政府也需要进行大量建设，因此就需要对相关产品和服务进行采购。为了节约开支，就需要对政府在公共工程中的采购行为进行监管，这就要保持采购行为的公平透明，于是，“招标”就在这种大背景下诞生了。1782年，英国开始用招标方式开展工程建设等项目。到了18世纪末，英国已经比较广泛地通过招标方式来做工程建设。并通过了《公共工程法案》之类的法规，从而确立了“招标制度”。与英国相比，美国、德国等其他国家的招标制度要晚了将近半个世纪！因此，英国，是公认的招标投标制度起源国，被看作是“招标”制度的祖师爷。招标制度从诞生的第一天，就是作为一种“公共采购”或“集中采购”的手段出现的，专门用来规范政府花钱办事。随着文明的传播，这套做法逐渐传到全世界，成了现在商业竞争里的核心机制。

1980年，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国也开始在工程建设等领域试点引入招标投标方式。2000年1月1日，《招标投标法》正式施行，标志着该制度正式成为资源配置的法定机制。和英国相比，我们晚了两百多年。

然而，作为后起之秀，我们的“招标”有着自己的特色。

从后发优势的角度看：我们用只有了二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英国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

从制度自信的角度看：英国是“招标”，我国是“全过程”招标。

从道路自信的角度看：招标，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而是所有企业的“权利”。

从理论自信的角度看：中国式招标，体现了中国国情、中国特色，是中国对世界的独创性理论贡献。

中式招标，是西方先进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招标制度进行中国本土化改造后的重大创新成果。

那么，中国式招标，到底有哪些特点呢？概括起来有五大项：

其一、用流程的严谨性，掩盖结果的预设性；  
其二、用程序的合规性，掩饰内定的合理性；  
其三、用台上的公开性，掩护台下的隐蔽性；  
其四、用竞争的激烈性，佐证报价的公平性；  
其五、用博弈的复杂性，保证权力的稳定性！

再好的经，到了这儿，保证能给你念歪！  
再干净的水，到了这儿，保证能给你搅浑！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文化自信！

在一个没有规则意识的地方，“讲规则”，就是一个笑话；

在一个没有程序正义的地方，“讲流程”，就是一个笑话；

在一个没有契约精神的地方，“讲契约”，就是一个笑话！

在一个不讲规则、不讲流程、不讲契约的“三不讲”地方，引入招标机制，就是个笑话！

编辑：李晶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 *The Three Unspoken Rules of Chinese Style Tendering*

*This essay traces the origins of competitive public procurement from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to modern China before presenting the author's critique of Chinese tendering practices. It argues that formal bidding procedures often emphasize legal compliance, transparency, and competition while concealing predetermined outcomes through informal arrangement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procedural complexity may create the appearance of fairness without ensuring impartial decisions. The article identifies recurring concerns involving rule of law, procedural justice, and contractual integrity, arguing that effective procurement depends upon institutions that consistently enforce transparent rules rather than merely following formal processes. It concludes that public trust requires accountability, genuine competition, independent oversight, and mechanisms ensuring that procedures produce fair outcomes instead of symbolic compliance alon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从严防出境到足不出省

—— 数字监控下的格栅化与中国命运的脆断

作者：周敏

2026年的中国体制内，正在悄然蔓延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物理围城。

过去，人们的目光聚焦于公职人员、高校教师、甚至医护人员被集体收缴护照、限制出境的政治红线。然而，一场更深沉、更密不透风的控制网格，已经悄无声息地在境内铺开。如今，不仅出国成了奢望，体制内人员哪怕是在周末或法定节假日离开工作的城市、跨越省界，乃至前往省会，都必须在数字化人事系统中层层报备、审批。至于“进京”，更是成了一条不可触碰的最高级别敏感红线，非必要绝不批准。

这场从防范外逃向全面禁足的演变，撕开了盛世稳定的面纱，露出了一个处于高度恐慌中的庞大巨兽，正通过压缩个体的空间移动自由，来饮鸩止渴般换取一时的安全。

这种境内出行限制，并不突兀，它是中共在过去的岁月中，将特殊时期的危机控制成功转化为日常驯化的标本。

2015年前后，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对裸官及涉密人员的护照管控成了常态。此时的控制，有鲜明的指向性和阶层性。然后，真正为全民和全体制内戴上物理枷锁的，是2020至2022年期间建立的数字化防疫网格。那三年里，行程码、健康码、以及“离市报备、离省审批”的连带责任制，每个人已牢牢钉在行政区划的网格里。

防疫的技术硝烟散去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套已经运转成熟的追踪和审批机制并不曾随之解体，它被无缝切换成了“政治纪律”与“安全管理”的一只钢爪。到了2026年的今天，这只钢爪已经深深嵌入日常。基层公务员、教师、公立医院的医生，只要双脚跨过地级市的行政边界，其行踪就会在后台暴露无遗，面临的是轻则通报批评、重则影响仕途的纪律处分。

这本质上是毛时代“单位制”与清“里甲制”的还魂。鲜活的个人沦为了行政单位的数字化财产。

中共牺牲一整个社会的活力，将十四亿人（尤其是作为社会中坚的公职与技术阶层）锁死在各自的行政网格里，背后是现实且自私的政治算计：

首先，是消灭一切跨区串联的火种，维护绝对的局部政治安全。

北京与各省省会是政治、资源与权力的中心。限制基层人员（主要是接触底层矛盾、握着社会资源的体制内人员）随意进京和省会，能从物理源头上彻底切断潜在的越级反映、群体性聚集、或跨地域维权串联的风险。

其次，通过连坐，逼着中层官僚进行战战兢兢的自我审查。

顶层设计了“谁的人出错，追究谁的责”的连带机制，维稳压力自然地转嫁给了基层单位。保住乌纱帽的

本能，驱使各个领导们层层加码、宁杀错不放过。这种设计何其狡猾，不劳烦中央频繁下达红头文件，下面的官员为了避责，自发地把绞索越拉越紧。

再次，是高强度的心理驯化。

当一个人去别处看病、带孩子去邻市探亲、去省会旅游都需要递交申请、解释原因、交代同行者时，他在心理上对组织的顺从和依附会被无限放大。体制内人员的原子化和驯服度来到空前的高度。是的，空前。

然而，历史之演进并不会因为权力的意志而偏转。把自由移动压缩到格栅里的极致统治，正为中国的未来铺设一条通往系统性崩溃之路。

1.经济内卷枯竭经济的本质是人、资金和信息的自然流淌。今天，有着很好消费力和投资能力的体制内阶层被禁足，那么旅游、跨省商业和技术交流陷入死水。生产要素怎能匹配优化？资金只能在本地停歇，前来迎接的就是创新能力的窒息与经济活力的干涸。

2.社会僵尸化当肉身的移动被卡死，思想的激荡和阶层跨越也随之抱死。整个社会慢慢地万马齐喑，鸦雀无声。没有社会活力的翻腾，没有民间自治的热情，只剩下了一潭死水。

3.高压下之黑天鹅风险人们的自由流动，实际上可以稀释很多局部矛盾。当人在本地遭遇体制的压抑或不公，他可以通过前往外地、寻找新的空间来化解痛苦，寻求新生。今天，所有的通道都被焊死了，每个人都被生生按在原地的矛盾旋涡里。

如今，“谁审批谁负责”导致了官僚系统的全面躺平。除了看住下属和惰性维稳，基层官员没了真正解决问题的欲望。放眼看去，一片极致的紧绷。一个微小的局部危机（如地方财政崩塌、突发群体事件），过去可以通过社会的弹性来消化。而在格栅时代，说不定哪天、哪地，就会因系统没了弹性而触发全盘的连锁反应，引来大脆断。

从大历史周期来看，这种对内层层设防、对外紧闭大门的姿态，昭示着中国正在主动放弃融入全球竞争、利用民间活力开疆拓土的路径，退缩为一个内向型、防御姿态的传统集权帝国。

我们正见证着，由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恐惧现实而生发的大倒车。统治者用长远国运和全社会生命力为抵押品，去换取眼前几年的物理上的苟且安全。

历史的规律密密地写着：高压的铁幕焊得越紧，烧毁时就越火光冲天。连自己体制内的细胞都无法自由游走时，彰显的哪里是强盛？分明是走向末路前无法掩饰的颤抖。那些被困在栅栏里的肉身暂且沉默着。但历史的清算，早已在微澜死水之下，开始暗流汹涌。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写在美国独立日》

作者：金米



今天，美国二百五十岁了。

白天我生活的社区歌舞升平，等到夜晚时分，烟花再次照亮夜空，人们举杯庆祝独立。

今年以来，我查阅最多的历史资料都和美国有关。此时此刻，再次回绕我耳边的，是两百五十年前杰斐逊写下的那句振聋发聩的话：

“人人生而平等。”

这句话曾穿越大洋，跨越世纪，激励过革命者、废奴主义者、妇女运动者，也激励过无数普通人。许多人未必记得写下它的人是谁，却记得它本身。

只是，当那支笔停下的时候，写下这句话的人，仍拥有自己的奴隶。

历史往往如此。它并不总是由完人创造，而常常诞生于理想与现实的缝隙之间。

而历史，从来不应该是“圣人”的传记，而是体现出凡人与理想的拉锯。杰斐逊没有做到“人人平等”，但他写下的那句话，却活成了后来无数人的武器。

废奴运动拿它说话，民权运动拿它说话……今天，仍有人拿它追问美国：为什么还会有歧视？为什么还会有贫富悬殊？为什么还有新的不平等？

一句没有兑现的话，反而成了最锋利的尺度。它先审判了写下它的人，又继续审判这个国家。

于是，我忍不住想到我的中国。

我想，一个国家真正的底气，不是宣称自己没有問題，而是允许人民不断指出问题。不是要求所有人歌颂自己，而是不害怕自己的建国理念被反复检验。

争吵并不可怕，分歧也不可怕。

可怕的是，没有人再敢发问，使得个人在集体面前失去对抗能力。到最后，所有问题都只剩下一个标准答案，它有个好听的宏大又伟光正的名词：统一。

二百五十年过去，美国依然有偏见、有撕裂、有利益集团、有各种各样的不公。

但《独立宣言》依然摆在那里。

它没有因为让人难堪而被删除，没有因为让人尴尬而被修改，没有因为不断被引用来批评现实而成为禁忌。

烟花易冷。

真正留在历史里的，不是庆典，不是口号，而是那句两百五十年前写下的话：人人生而平等。

人会背叛自己的理想。而一个国家的高度，恰恰在于，它是否允许人民永远拿着理想，去要求现实。

庆典活动，真正留下来的，不是掌声和烟花的绚烂，而是人们还能不能继续追问：我们离那些写在纸上的理想，还有多远？因为人会背叛自己的理想，理想也会反过来审判人。

两百五十年过去，今天的美国仍存在偏见、撕裂和争吵，也仍有人相信自由和平等值得继续完成。

我想真正伟大的，从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句话。

而让这句话掷地有声的，是一代代坚守格言的人。一个国家真正值得庆祝的，不一定是完美地做到，或者做好了的一切，而是它曾经写下了一句连自己都还没有做到的话，并允许后人不断拿这句话来要求它。

2026年7月4日夜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玩火！

作者：武书剑

## 一、防诈

问：电信诈骗那么猖獗，从中学生到博士生都逃不过。为什么不开设一门防诈骗课程呢？

答：如果学校开始防诈骗课程，学生们就会讨论、思辨、研究、反思、质疑、批判、颠覆。慢慢地，他们就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判断的能力；就有了分辨真伪的能力、分辨是非的能力、分辨善恶的能力、分辨黑白的能力、分辨对错的能力。

他们就会发现：

谁，一直都在胡说八道！

谁，才是最大诈骗集团！

## 二、欺诈

喊在嘴里的口号，如果不落实，就是欺诈；

挂在墙上的标语，如果不兑现，就是欺诈；

写入宪法的条款，如果不激活，就是欺诈。

台上一套，台下一套，是欺诈；

嘴里一套，心里一套，是欺诈；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欺诈。

信息不公开，是一种欺诈；

财产不公开，是一种欺诈；

司法不公开，是一种欺诈；

政务不公开，是一种欺诈。

暗箱操作，是一种欺诈；

钓鱼执法，是一种欺诈；

数据造假，是一种欺诈；

虚假宣传，是一种欺诈。

画大饼，是一种欺诈；

放卫星，是一种欺诈；

样板戏，是一种欺诈；

正能量，是一种欺诈。

演抗日神剧，是一种欺诈；

亩产十万斤，是一种欺诈；

美帝纸老虎，是一种欺诈；

关闭评论区，是一种欺诈。

说到底，帝王将相口号喊得多么伟大、许诺的目标多么宏大、无非就是：打江山、坐金銮、睡女人、抢财产、掌权力、防造反！

但，他们依然要高喊为了“公平正义、自由平等、

法治民主”；高喊为了“黎民百姓、天下苍生、人类福祉”。

这他妈，就是妥妥的诈骗！

## 三、玩火

从湖南湖北刮起一阵“三资”改革的妖风，正在席卷全国，再现欺诈本色；

所谓三资，就是：

资源资产化，资产证券化，资金杠杆化。

第一步，把本村的100个光棍看作一项“人力资源”，然后登记成“具有劳动收益和资源增值的”国有资产。这就是资源资产化。

第二步，给这项国有资产做一个估值，打包成“人力资源收益权凭证”万份，到金融市场发行。这就是资产证券化。

第三步，用套现的钱，去其他村引进更多的光棍，做大估值，继续到金融市场发行，变现。雪球越滚越大。这就是资金杠杆化。

各地政府，把各类犄角旮旯的资源，登记成资产，押上未来、押上信誉，美化包装，重新估值，编制一个好故事，打包出售，骗取真金白银！

这不是“玩火”！

这是跳“火坑”！

武书剑

2026年6月30日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八十年过去了，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承诺兑现了多少？ - 图片来源于网络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计划生育 - 违背人性

作者：沈美花



- 图片来源于网络

共产党急功近利的人口之策：违背人性，实行人口计划生育，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违背生物自然繁衍规律的残暴政策，还把这一政策定为共产党统治下的基本国策。这一计划生育的历史代价与长远遗患！

共产党始于20世纪八十年代、持续数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曾被奉为解决人口压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国策。如今站在人口结构失衡、老龄化危机凸显、生育意愿持续低迷的时代节点回望，这项曾被寄予厚望的政策，早已暴露出深刻的制度缺陷、执行乱象与长远恶果，其带来的社会创伤与人口负债，正在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民族的发展走向。

计划生育最根本的问题，是共产党简单粗暴干涉公民基本生育权，将本属于家庭的自主选择异化为国家强制管控的行政任务。生育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然权利，是家庭延续与社会繁衍的根基，而在共产党的政策高压之下，数以万计的普通家庭失去了决定子女数量的自由。为完成层层下达的人口指标，共产党的基层出现大量违背人性的执行手段：强制上环、结扎、大月份强制引产，超生家庭处以高额罚款、财产查封没收、开除公职，在农村没有钱财的，上屋扒房顶，牵牛赶猪，导致无数家庭因生育问题支离破碎，留下难以抚平的身心创伤。共产党以残暴行政权力践踏个人人权的行为，违背人性，违背法治精神，也彻底撕裂了共产党与民众之间的信任纽带，其造成的人类社会伤害，远比短期人口控制的收益更加沉重。

政策推行的短视化，直接酿成了人口结构的系统性崩塌，为今日社会埋下多重隐患。当年共产党的决策者只聚焦于人口总量控制，却完全忽视人口结构的平衡发展。长期独生子女政策，直接催生了全球最严重的人口性别比失衡，大量男婴被选择性保留、女婴被遗弃或堕胎，造成数千万适婚男性婚配困难，加剧婚恋矛盾、拐

卖犯罪、家庭不稳定等社会问题。同时，独生子女一代成为社会主体后，421家庭结构全面形成，一对夫妻要赡养四位老人、抚养一个孩子，养老压力、育儿压力被无限放大，家庭抗风险能力极度脆弱，一旦出现突发变故，整个家庭便陷入绝境。更为致命的是，计划生育直接透支了国家未来的人口红利，引发深度老龄化危机。数十年严控生育，让中国生育率长期跌破人口更替水平，如今人口总量已进入负增长阶段，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老龄化速度远超经济发展速度。曾经依靠廉价劳动力崛起的制造业，如今面临用工荒、人力成本飙升的困境；社保养老金收支压力陡增，医疗、养老公共服务不堪重负，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被大幅削弱。更讽刺的是，当年拼命严控人口增长，如今全面放开二孩、三孩，配套的生育支持却严重缺位，民众早已被过去的生育管控形成心理阴影，加上育儿成本居高不下，生育意愿持续低迷，人口颓势已然难以逆转，这正是短视政策最直接的反噬。

除此之外，计划生育还带来了诸多隐性的社会恶果。独生子女在过度呵护与孤独中成长，部分群体形成自私、脆弱、抗压能力不足的性格特质，影响社会整体人文风貌；大量“黑户”超生人口，长期无法享受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资源，成为社会边缘群体，埋下阶层矛盾隐患；为管控生育设立的庞大行政体系，耗费巨额公共财政资源，挤占民生投入，加剧基层行政负担。

诚然，计划生育在共产党统治下特定历史阶段，确实短暂缓解了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资源压力，但短期收益完全无法抵消其长远代价。它以牺牲民众生育权、破坏人口结构、透支国家未来为代价，换取了一时的经济发展，本质上是急功近利的短视决策。如今，人口负增长、老龄化、低生育陷阱已成既定事实，这正是历史对不当人口政策的严厉警示。

反思计划生育的过往，本质上是要认清一个核心理念：人口从来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国家发展的根基。任何脱离人性、违背自然规律、忽视长远发展的行政管控，最终都会被时代反噬。唯有尊重个体权利、顺应人口规律，辅以完善的社会福利、生育支持体系，才能实现人口与社会的良性循环。而计划生育留下的深刻教训，应当成为国家制定公共政策时的永远警醒。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当讨薪者成为罪犯

——中国特色讨薪的制度性绝境

作者：周敏



2026年初，年关将至。山西，一名农民工因讨薪多次无果，选择了最极端的报复方式——将拖欠他工资的雇主全家杀害。同一时期，福建泉州，一名包工头讨要工程款不得，将自己的汽车开到工地，引火自焚；泉州惠安，另一批被拖欠工资的工人，则选择烧掉了欠薪企业的仓库。

这不约而同的疯狂，渐渐成为可以被预测、被统计的社会现象。据民间记录项目“昨天”统计，2026年春节前那段时间，平均每天收集到的集体讨薪事件超过两百起；仅2026年4月，该项目记录的全国抗争事件就有七十四起，其中劳动者维权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这一年的讨薪潮，被多家观察者形容为“比往年更惨烈”——建筑、制造、医疗、公交，几乎所有行业都卷入其中，天津、广东、陕西等十余个省市无一幸免。

灭门与自焚，只是这条绝望光谱上最极端的两个刻度。在它们之间，是更大规模、却已经被这个社会“正常化”了的日常图景：工人爬上塔吊、爬上楼顶，以跳楼相威胁；包工头堵住工厂大门；讨薪者挤满劳动局、信访局的接待大厅，场面混乱而无人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这一切，并非发生在某个法治真空、政府缺位的失序地带。而是一个拥有全套劳动法律、专项治理通知、年度考核机制、应急救助基金的国家，年复一年上演的固定剧目。

中国特色讨薪是被制度催熟的绝望。把视野拉长到过去几年，会发现这套剧本的同一套台词。2024年，四川宜宾一名工人因讨要800元工资多次无果，纵

火烧毁工厂，被网民称为“800哥”；当地官方的回应，是将其纵火行为定性为轻生厌世，而拖欠他的5370元工资，“正在走审批流程”。这句“正在走审批流程”俨然成了官方话术的标本。标本下的使用说明写着：在今日之中国，工人讨薪要作为紧急议题被一脸严肃地举起，然后再无限期地正常化、流程化、合法化。

更早之前，湖南耒阳一名农民工因雇主拖欠1560元工资，最终杀害对方一家三口；这桩2012年的旧案，在2024年又一次被网络重新传播——人们之所以反复提起它，并非出于猎奇，而是因为类似的故事，十几年来始终不曾真正停止。

这种以命相搏、以暴制暴的讨薪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被命名的现象：人们称之为中国特色讨薪——它有固定的季节性（年关爆发），固定的舞台（塔吊、楼顶、工厂大门），固定的诉求方式（喊口号、爬高处、堵大门），以及，几乎固定的结局：工资不一定能拿到手，讨薪者却可能先一步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寻衅滋事为名拘留。

国家在场，问题依旧。这是一场“治理”了二十年的顽疾。

2023年，国务院修订印发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将欠薪治理成效纳入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几乎每到冬季，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都会下发通知，开展治理欠薪冬季行动，要求摸排风险、公开举报渠道、应急处置。建筑行业还建立了农民工工资监管账户和“代发”制度，理论上由施工方直接发放工资，绕开层层转包中的克扣环节。

个案确实存在成功的例子——安徽滁州一名农民工和五十五名工友，在被拖欠四年、超过八十万元工资后，最终经协调拿到了钱。这些稀罕事会出现在官方媒体的年终总结里，作为治理成绩。

但制度的设计者自己也清楚，这些举措相当当地隔靴搔痒。2026年的一篇官方背景调研报道直言不讳：基层人社干部反映，《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虽然对压实各方责任有明文规定，但各部门在执行中存在偏差，行业主管部门之间配合参差不齐，“中梗阻”现象普遍存在。换句话说，他们自己都承认，问题不是缺少法



律条文，而根本是条文从没真正执行过。

耐人寻味的是建筑工人在网络上的自问自答：“如今2026年了，国家建立了监管账户，实行了代发制度……怎么还有农民工讨要工资呢？”答案是：班组每月上报的工资额度，往往远低于工人实际收入。剩下的部分，还得等老板自己收到工程款后补发。更恶劣的情况下，层层分包的小包头甚至会吧已经代发到工人卡里的工资，重新收回去——制度的漏洞，反而成了新一轮克扣的工具。

这套治理体系最值得审视的地方，在于它的功能错位：当局投入大量精力，要求对欠薪引发的“负面舆情”联动处置，对“恶意炒作、挑动社会对立情绪”的内容及时管控，防止发酵蔓延。很明显，一部分本该用于解决欠薪的治理资源，实际上被用于了管控舆论。讨薪问题之所以年复一年地“治理”却始终未能消失，根源正在于此——它压根没被当作一个需要被解决的劳资纠纷，而是被当作一个需要被管控的舆情风险。

那么，有人替工人说话吗？为什么一个拥有如此完整治理体系的国家，会让讨薪沦为一年复一年的血泪剧？大约有三重结构性的缺位。

第一重缺位，是没有真正属于工人的组织。中国的工会体系，名义上覆盖了绝大多数企业，但是，它的任命决定了它的立场——基层工会主席往往由企业方指定或默许，而非工人自主选出、对工人负责的代表。当冲突发生时，工人举目无亲，不得不单枪匹马与资方周旋，没有一个独立的、依法享有罢工权与集体谈判权的组织可以为他们撑腰。这与许多市场经济体，比如美国，形成了鲜明对照：在美国等地，工会虽然力量有起伏，但其受劳动法保护的集体谈判权，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的制衡力量。

第二重缺位，是地方政府的双重身份——既是裁判员，又是利益相关方。地方政府往往与本地企业捆绑着招商引资、税收、就业指标等共同利益，在处理劳资纠纷时，很难做到真正中立。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为了保住企业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地方政府在处理纠纷时，时常倾向于优先保企业、而非保工人——这也是为什么，浙江桐乡某光电公司千余名员工因欠薪罢工时，员工反映“市政府、镇政府都不出面，还阻拦我们，抓了十几个人”，而不是出面协调企业偿付欠薪。

第三重缺位，是司法救济本身的失灵。就算工人愿意走法律途径，胜诉也未必意味着能拿到钱——一旦欠薪企业已经破产、无力支付，法院的判决便只是一纸空

文，执行照样会卡死。诉讼成本高、周期长、执行难，许多工人根本不敢、也不愿走司法这条路，最终只能回到最原始危险的方式：用肉体去要挟——爬上塔吊，威胁跳楼。

三重缺位叠加之下，工人被推到了一个几乎没有合法、有效救济渠道的境地。极端事件，无论是以自己的生命相要挟的跳楼讨薪，还是转向施害者的灭门与纵火，是制度空转下，被反复证明正常渠道走不通之后，逻辑上几乎必然出现的产物。

而被牺牲的，往往是最沉默的那群。

经济下行的代价，最先扑向的，是产业链条最末端、议价能力最弱的那群人。当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制造业订单萎缩，这些宏观层面的风险，层层传导，雪花飘落般盖在了具体的某个农民工、某个外卖骑手、某个包工头身上——他们没有能力对冲风险，没有制度为他们兜底，只好用身体去赌一个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代价。

2026年的这一连串灭门、自焚、跳塔事件，是一套长期存在的制度性逻辑，在经济下行周期里被进一步放大后的必然显影。当一个社会的治理资源更多地投向“如何让讨薪者闭嘴”，而非如何让欠薪者付钱；当讨薪比欠薪还承担更高的法律风险；当工人除了以命相搏之外，找不到任何一条真正畅通的维权渠道——我们应该再对下一起灭门案、下一次跳楼跳桥感到意外吗？

编辑：李晶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透过“709 律师大抓捕”看中共人权现状

作者: Kun Chang

2015年7月9日，中国发生了一场震惊国内外的维权律师打压事件，史称“709律师大抓捕”。此事件中，超过300名律师、法律助理及维权人士先后被警方带走、拘留、监视，甚至被强迫失踪。事件不仅对中国法治界造成巨大冲击，也揭示了中共政权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严重缺失。

维权律师群体的兴起，原本是中国法治发展的一部分。这些律师依法代理宗教信仰、土地征收、户籍歧视等敏感案件，推动法律在社会公平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这类依法维权行为却被当局认定为“扰乱社会秩序”甚至“颠覆国家政权”，反映出中共对法治的根本误解与敌意。

“709事件”所暴露的问题，并非个别执法人员行为失当，而是国家机器对公民社会的系统性打压。包括王全璋、李和平、谢阳等在内的被捕律师，普遍遭遇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长时间秘密关押、酷刑逼供、强迫认罪等侵犯人身自由的行为。这些做法严重违反中国宪法及其所承诺履行的国际人权公约。

事件发生后，官方虽未明言打压理由，但相关律所陆续被整顿或关闭，律师执照被吊销，家属遭监控、出行受限。法律职业的独立性由此急剧萎缩，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也被进一步压缩。自此之后，中国维权律师几乎销声匿迹，法治发展陷入倒退。

“709事件”也对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中共政权所谓“依法治国”并非真正的法治，而是将法律作为压制异见的工具。尽管欧美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事件表示谴责，并呼吁释放被拘律师，但在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与日益扩张的国际影响力时，真正有效的国际压力仍显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遭遇打压，不少律师和家属依然坚持发声。他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努力维护社会基本正义，成为中国人权运动的重要象征。他们的坚守提醒人们：在一个高度控制的社会中，法治与人权的价值从未过时，也不应被遗忘。

“709事件”过去已逾十年，但其造成的影响仍在延续。这不仅是一场对律师群体的镇压，更是一场针对全社会基本权利的全面打击。只有正视这一事件、持续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才能避免更多类似的历史悲剧重演。

## *The 709 Crackdown and the State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709 Crackdown," a nationwide operation launched on July 9, 2015, in which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lawyers, legal assistants, and rights advocates were reportedly detained, questioned, placed under surveillance, or subjected to enforced disappearance. The author presents the incident as a defining mo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civil society, arguing that it exposed weaknesses in the protection of fundamental right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legal system.*

*Many affected lawyers had represented clients in cases involving religious freedom, land dispute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discrimination, and other politically sensitive matter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legal advocacy conducted through existing procedures was increasingly treated as a threat to state authority rather than as a legitimate component of the rule of law.*

*The essay contends that the crackdown reflected institutional repression rather than isolated misconduct. Several prominent lawyers reportedly experienced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at a Designated Location, prolonged incommunicado detention, coerced confessions, and allegations of tortur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uch measures were inconsistent with protections contained in China's Constitution and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The article also describes broader consequences for China's legal community. Law firms were investigated or closed, lawyers lost their licenses, and family members experienced surveillance and travel restriction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ese developments reduce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narrowed the space available for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interest advocacy.*

*The conclusion argues that the legacy of the 709 Crackdown continues to influence discussions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civil liberties, due process, and human righ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lthough international concern was expressed,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its practical impact remained limited.*

编辑: 李晶 校对: 王滨 翻译: 戈冰 美编: 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有大海处就有晓波

作者：胡平



在电影《昂山素姬》里，昂山素姬讲过一句话：“圣人，就是不断努力的罪人。”我认为这话讲得很好。在我认识的异议人士中，有不少人品行高洁、意志坚定。在其中，刘晓波本来未必是最优秀的。但一来是其他人先后都离开了中国流亡海外。在自由社会中，他们最美好的品质得不到充分的彰显。二来是刘晓波虽然有不少弱点，但他具有严格的反省精神。刘晓波的反省绝不是只停留在纸面上，而且还付诸实践。古今中外倡导精神修养的各种流派，大都强调践行，即按照你的理念去生活，把你的理念变成你的生活方式。只要你遵照理念的要求去坚持过一种不同的生活，那么，不管你开头有多少妄想杂念，只要你坚持下去，久而久之，那些东西自然就淡化了，心灵自然就纯净了。二十多年来，晓波坚守国内，通过更坚定的抗争，更从容的面对苦难，使得自己的精神境界日益进入到更高的层次。圣人，就是不断努力的罪人。刘晓波一直坚持，坚持到底，他就是圣人了，不是也是了——这样都不是，怎样才能是呢？圣人就是这样炼成的。没有人天生完美，完美就体现在对完美的不断追求。那些终生追求完美的人就是完美的。

刘晓波写道：历史没有必然，一个殉难者的出现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质。甘地是偶然，哈维尔是偶然，二千年前那个生於马槽的农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人完成的。天安门大屠杀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缺少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刘晓波就是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刘晓波就是一个殉难者。我们的义务就是让刘晓波以及其他一些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让这些殉难者，提升人的精神品质，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也许，有人会争辩说，刘晓波还够不上道义巨人。但

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刘晓波是否够得上道义巨人——我当然认为他够得上，而且我们还有不少这样的道义巨人。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堕落的时代，有多少人还愿意追随道义巨人的脚步？殉难者还能不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在今天，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对道义良知的信心。他们认为，良知是无力的，理性是无力的；对付共产党这个流氓要靠流氓才行。我当然知道，在为正义而战的队伍里并非都是道德君子，而那些不是道德君子的人也会发挥积极作用。但是我坚信，正义的事业必须要有浩然正气，必须要有道义巨人的榜样，必须要有殉难者精神的激励。因此，正是在今天这样堕落的时代，我们纪念刘晓波格外必要，也格外有意义。

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刘晓波用散文诗的语言，讲述了他的梦想、他的期待：“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绝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刘晓波写道：“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把争取言论自由当作战胜极权统治的第一步，继续为言论自由而抗争。这就是刘晓波留给我们的政治遗言。

编辑：张致君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 *Wherever There Is an Ocean, There Is Xiaobo*

*This essay commemorates Liu Xiaobo as a moral exemplar whose lifelong commitment to reflection, nonviolent resistance,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transformed personal conviction into public action. Citing his courtroom statement and writing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his legacy lies in defending human dignity, free speech, and moral courage, inspiring future generations peacefull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死谏 or 殉道？

作者：漠北孤侠

高善文作为“生产资料”终于在2026年7月7日被中共消耗殆尽，但他的死并不是剧终。网上高潮迭起，是什么力量在推波助澜？

公开报道称，高善文是死于癌症。生命科学已经证明，癌症是有触发条件的。我更强烈的感觉是，似乎冥冥之中，高善文是以死相谏，或者说以身殉道。对，高善文最出圈的就是“敢说真话”。中共自2017年起，理论界，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学界，就已经秋风萧杀、万马齐喑了。

2024年那场深圳闭门会和华府论坛上高善文“关于GDP和失业率，捅破数据窗户纸”的原话：

“我自己的猜测是过去两到三年实际增长率平均可能在2%左右，尽管官方数字接近5%。”

“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我认为可能更合理的预测是，未来三到五年的增长率在3%至4%之间。不过我们知道官方数字将始终在5%左右。”

背景：2024年12月国投证券内部策略会，首次提出。说完这段话录音流出，直接触怒高层，后面就被禁言了。

为什么狠：等于公开说“真实增长砍一半”，还点明“官方永远报5%”。后面华府论坛他又说了一遍。之后，他基本处于“社死”状态。“社死”就是不死已死。

更要命的：关于房地产危机，直接血淋淋撕咬点名“主犯是政府”。

原话：“中国经济萧条的主犯，政府造成了房地产危机；民营地产颈动脉大出血”

2024年一场被删的演讲。标题就叫这个。

直接把房地产流动性危机的锅甩给“党的领导方式”，还说民企是“颈动脉大出血”。这都2024年了，将该言论界定为顶格批评都算客气的了。作为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经济的悲鸣以及对政府的过度压逼，分明属于是以死相谏、舍身殉道了！

如果苍天有眼，或高居庙堂者有知，听进老高谏

言，中国经济也不至于每况愈下，整个社会一路朝北狂奔了。昨天新华社雄论“北朝鲜发展成就辉煌……”，雄辩明证，中国再度加速朝北裸奔，北朝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金正恩治党治国最优选……但现实世界中没有“如果”，老高只剩殉道华山独一径！其实更早在2018年老高就预言了：

“年轻人洗洗睡吧！”

——2018年非公开演讲。当时他就批评“一刀切”去杠杆，预言会引发民企流动性危机。6年后看，基本应验了。俨然如千多年前的“刘伯温”。

此际，另一个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故事涌上我的心头，我在现场但配角都不在，主讲者或多或少吸收了高善文的理论成果：2019年大概9月份（忘了准确月份）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顶流经济学家金岩石也抛出了日后在市场上广为流传的经典论断：

一、2019年是此前10年中经济最差的一年；但是未来10年经济最好的一年。

二、（最高层定调）迄今为止，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它的好日子一去再也不复返了。

金岩石演讲完后，我回到我身边的企业家中也苦口婆心地宣讲。“如果”又来了：如果当初有心的企业家听懂了，该有多好？在今年6月份新华社长论《“三大改造”伟大进程》面前瑟瑟发抖的企业家，包括但不限于近日跳楼的居然之家老板林朋广等5人，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但没有“如果”，正如高善文也没有“如果”……

2024年底中证协发文，要求首席经济学家对外发声要“事前报备”。因不当言行多次引发声誉风险的要“从严处理直至解聘”。2025年11月24日，高善文从国投证券离职，中证协官网已查不到他。

高善文就是典型的没有“如果”的结果。

是高善文成就了死谏，还是死谏成就了高善文？

高善文管不了身后的洪水滔天。但现实却不经意间

给了他超乎寻常的荣誉:网上雄文滔滔,致敬和怀念汹涌澎湃!

当然也有人拿高善文和李克强相比,隐晦指出老高不配如此高规格礼遇。我不以为然。李克强不单是中共狼窝的一员,而且身居庙堂最高。如果他虽够恶但恶得不够邪、够邪但不得要领,他断然到不了如此高位,而且只是讲了一句“中国收入1000元左右的不下6亿人”。更兼在中共二十大上,当以胡锦涛和他本人为首的整个中共组织在十四亿国民被羞辱、被凌辱、被强J时选择默然,毫无疑问此时的沉默就是帮凶。如果他能摔杯而起或许今天的中国已经脱胎换骨,而且更可能同时也拯救了死于非命的自己。而高善文凭此不是诗的诗句就足以不朽:

掌握生产力的人,  
适合出海;  
掌握生产关系的人,  
适合留在国内。

至于我,  
我是生产资料。

作为经济学家、良知学者,最后作为生产资料,终于于2026年7月7日被中共耗尽,因病离世。

仅以此文,向高先生和全天下所有被耗尽和待耗尽的“生产资料”致敬,并祭奠已死亡的中国经济。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知名经济学家高善文去世, 年仅 55 岁 - 图片来源于网络

### Deathbed Remonstrance or Martyrdom? Reflections on Gao Shanwen

This essay reflects on the death of Chinese economist Gao Shanwen on July 7, 2026, and presents the author's interpretation of his public legacy. While noting reports that Gao died of cancer, the author argues that his final years symbolized a form of moral remonstrance because of his willingness to express views on China's economic conditions despite increasing political constraints. The article portrays his death as the culmination of years of professional isolation and political pressure rather than merely the conclusion of an individual's career.

The discussion centers on Gao's widely circulated remarks in 2024 concerning economic growth, unemployment, and the property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Gao questioned the reliability of official economic statistics, suggested that actual growt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published figures, and argued that government policy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creating the real estate crisis. The essay maintains that these public statements resulted in official criticism, restrictions on his public appearances, and eventually his departure from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It also recalls his earlier warnings concerning financial risks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rguing that subsequent developments reinforc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ose assessments.

The article places Gao's experience within a broader narrative of tightening controls over academic, financial, and professional expression. It references industry requirements that economists obtain approval before making public comments and compares Gao with economist Jin Yanshi, presenting both as specialists whose assessments challenged prevailing official narratives and therefore attracted political pressure.

Beyond economic policy, the essay develops a broader argument concerning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moral courage, and public truth telling. It contrasts Gao with former Premier Li Keqiang, arguing that scholars and public figures bear a responsibility to speak openly when they believe major public interests are at stake.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Gao's widely circulated statement describing himself as "production material," interpreting it as a symbolic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individual dignity. In the author's view, Gao's death has become more than a personal tragedy. It serves as a tribute to those who continue to bear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costs for expressing independent judgment, while reminding readers of the enduring tension between intellectual integrity, political conformity,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public intellectuals in contemporary China.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中国民主党的政协提案决不是投降

——写以九八组党、台湾民进党的民主实践为例

作者：郑存柱



“背叛”“投降”，这样的帽子扣下来，声音很响，分量很轻。指责中国民主党的政协提案就是投降的人，其实从没把自己的逻辑想清楚。照他们的说法，凡是踏进对方设定的场子、用对方的规矩说话，就等于承认对方、就等于缴械。可这套逻辑一旦当真，第一个被它判成“叛徒”的，恰恰是中国民主党自己——而且要从它出生的那一天算起。

1998年，中国民主党在浙江公开成立。那年6月25日，王有才、王东海、林辉几个人做了一件当时惊天动地的事：他们没有转入地下，没有搞秘密串联，而是堂堂正正地拿着材料，走进浙江省民政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申请注册成立一个反对党。朱虞夫，就是那批人组党人士之一。请问，照“投降论”的算法，这算什么？向民政厅递交注册申请，不就等于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承认了它那套登记制度吗？那么中国民主党从娘胎里就是“投降派”，这话说得出口吗？

荒唐。谁都看得明白，1998年那一纸注册申请，不是磕头，是逼宫。它把一个尖锐的问题顶到共产党鼻子底下：你的宪法白纸黑字写着结社自由，你的法律写着社团可以登记，那你到底认不认自己的法？允许，就等于承认反对党合法；不允许，就等于当众撕毁自己的宪法和法律。正因为这一招打在要害上，当局才那样惊慌，才把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一个个重判入狱，一判就是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用现有的合法渠道去斗争，从来不是软弱，恰恰是最叫专制难堪的锋利。为这条路坐过牢的人，后来者没有谁有资格对他们骂一句“投降”。

把眼光投向海峡对岸，同一个道理更是活生生地摆在那里。民进党的党纲白纸黑字写着“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这就是台独。“中华民国”这个国号、这部宪法，本就是台独要否定、要取代的东西。可民进党是怎么做的？它派人去参加中华民国从村里长到

总统的各级选举。陈水扁、蔡英文、赖清德，一个个举起右手，宣誓效忠《中华民国宪法》，然后坐进他们纲领上明明要废掉的那个国家的总统府。有谁跳出来骂民进党“背叛台独”“向国民党投降”？没有。因为凡是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懂：参选，是借现成的合法平台去争民心、扩地盘、一寸一寸地改造这个体制，而不是在选票上盖个章、承认现状万岁。民进党正是靠这条“体制内”的路，从戒严令下被追捕的地下党，一路走到执政。当年它若因为“参选中华民国就是承认中华民国”而拒绝参选，到今天也不过还是街头一群喊口号的人，永远进不了那个能拍板的房间。

从1998年走进民政厅，到今天的政协提案，中国民主党走的是同一条路，认的是同一个理：走上对方的舞台，绝不等于认同对方的剧本。要求进入政协，不是承认现在这个政协合格——恰恰相反，这份提案通篇都在骂它“名存实亡”“橡皮图章”，要求把席位交给真正的反对派，要求委员言论免责，要求会议开门见光。这不是下跪，是把民运所追求的目标直接拍在对方桌上。

说到底，投降是放弃目标，不是更换手段。真投降，是承认对方对、把自己的诉求咽回肚子里。可这份提案从头到尾死咬宪政民主、死咬多元监督，一个字都没让。它“退”的，只是“斗争非得在体制外、非得摆出对抗的架势才算数”这一种执念。把手段的灵活骂成立场的背叛，是把民运的成败押在姿态够不够悲壮上，而不是押在到底能不能撬动这块铁板上。曼德拉既坐过牢，也走上过谈判桌；东欧的反对派既印过地下刊物，也坐上过圆桌。哪一次从专制到民主的转身，是单靠体制外死磕就一步到位的？关键时刻，总得有人肯坐到桌前，把口号变成能落地的条款。

当然，走进体制是有风险的——会被利用，会被收编，会被拿去当“民主”的花瓶。这些警惕都对，都必要。但“提防风险”和“张口就骂投降”，是两码事。中国民主党的政协提案是不是背叛，标尺只有一根：它让你离目标更近，还是更远？它替不同的声音撬开了一道缝，还是替专制补上了裂痕？

1998年那一纸注册申请，没有换来一个合法政党，却把共产党“违宪违法”四个字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今天提出共产党不可能接受的政协提案，又一次把这个政权逼到“认不认自己的法”的墙角。这从来不是缴枪，而是换一个战场，接着打同一场仗。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我为什么反对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作者：张维清



2026年6月6日，一座名为《捍卫自由·乌克兰》的大型主题雕塑在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那一刻，我有幸站在现场，见证了这一神圣而震撼的历史瞬间。该雕塑旨在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全体军民致敬，纪念他们四年多来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英勇顽强地抵抗俄罗斯侵略，坚守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自由民主制度的壮举。

站在雕塑前，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2022年2月。当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时，文明世界无不义愤填膺，一致予以强烈谴责。然而，中共官方却背道而驰，高调宣称“中俄互信不封顶，战略合作不设禁区，世代友好没有止境”，在国际社会上公然表达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纵容与支持。中共为俄罗斯提供军用物资、购买俄罗斯石油、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对这令人窒息的黑白颠倒，我在微信上公开、坚决地表达反对，我呼吁和平，坚定地乌克兰站在一起，声援因为在街头举牌支持乌克兰被中国警察抓捕的异见人士。因为我知道，俄罗斯的侵略以及中共对其的支持，不仅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残酷践踏，更是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公然挑衅。尤其是当看到无数无辜的平民与儿童在无差别袭击中失去生命、流离失所，我作为一个尚存良知的人，无法对这种暴行保持沉默。

我反对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共长期以来站在世界文明对立面的历史。自成立与执政以来，中共在国际外交中始终扮演着独裁政权最大“输血者”与“保护伞”的角色。

回顾历史，在亚洲，它曾全方位扶植柬埔寨红色高

棉政权，直接导致该国多达两百万人死于非命；它长期为朝鲜世袭独裁输血，让半岛民众饱受奴役，核危机延续至今。在拉美与非洲，它用数十亿美元为经济崩溃、操纵选举的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续命；它常年援助美洲唯一的共产独裁国古巴；甚至在曾犯下种族灭绝罪的苏丹独裁者、毁灭国家经济的津巴布韦威权统治背后，都充斥着中共免除债务、输送武器的黑影。更有甚者，它与伊朗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对抗国际制裁。

尤为讽刺且让我气愤的是，在2021年7月28日阿富汗塔利班尚未完全夺权、美军还没完全撤出阿富汗，中共时任外长王毅便在中国天津市高调接见了塔利班代表团，公开称赞塔利班政权。这种主动勾结、扶植世界公认恐怖组织并为其“站台”的行径，毫不掩饰地暴露了其与现代文明世界为敌的本质。那一刻，我对这个政权再一次感到彻底的失望与愤怒。

《捍卫自由·乌克兰》雕塑，向人们传递了一个核心信息：“支持乌克兰，不仅是在支持一个国家，也是在捍卫全人类共同的自由价值”。

我和乌克兰站在一起，乌克兰必胜，荣誉属于乌克兰。愿自由长存，愿和平永驻。

校对：孔祥庆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2026年6月6日，中国民主党创党元老朱虞夫出席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园《捍卫自由乌克兰》雕塑揭幕仪式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斗争，是一种生活姿态

——由杭州前辈们想到的

作者：田永德

杭州民运前辈徐光出狱了，瘦成了一道闪电，只有八十多斤，要知道曾经的他有一百五十多斤。

我与杭州前辈们的交集缘于2006年上海开六国峰会。当时，我在上海宝山打工，上海开六国峰会，而我被上海有关方面认定为不稳定因素。在与我沟通无果后，转而向我老板施压，为了不连累给我工作机会的老板，最终我妥协——在上海开六国峰会期间，我离开上海一个月。于是，我开始了“在祖国的大地上流浪”的生存模式（这句话是现在不活跃的一位朋友说的）。期间，我去了安徽，北京。密切关注我行程的警察知道我在北京后，惊慌失措，强烈要求我离开北京。一番讨价还价后，我到了杭州。

当朱虞夫大哥第一次刑期的七年结束后，我赶上了杭州前辈们为他接风。那一年，王荣清前辈向杭州朋友们介绍我是内蒙古民主党人，基于对民主党了解的浅薄，我谨慎表示我目前还不是民主党人，但我对杭州的前辈们表示最大的敬意。

2007年五月，我去杭州旅游，杭州有关部门像疯了一样，非要赶走我和胡俊雄这两个外地人，这件事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出狱不久的朱虞夫大哥被判刑两年，而我则是在杭州朋友的帮助下，顺利躲了一夜，然后离开杭州，去了成都。

2007年年底，吕耿松大哥被抓，我又从杭州跑到北京，想要为吕耿松大哥做点什么，希望能赶在开庭前让他出狱。为此，在熟人的指点下，我给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先生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过问此事，因为熟人告诉我，李锐与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关系密切。事实证明，没有任何作用。而我只能在北京杭州两地来回跑，也只找了点小钱，以求慰藉我心。

2008年，我在北京由高洪明先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接受了他的指派，回内蒙古领导并发展党员。（只是后来我每次回去都被当地国保暗示我应该离开，队长甚至说，我被内蒙古公安厅盯着，所以也就继续“在中国的大地上流浪”着。）。只是，每每看到杭州前辈们前仆后继飞蛾扑火般坐牢，让我难以承受。最难过的时候是，王荣清和王东海两位前辈去世后，当时在上海的我没办法去参加葬礼，因为我楼下有两个不明身份的人，监控了我整整两个月。为了不被上海再次赶

走，我只好装孙子，这也成为我感觉愧对杭州前辈们的一件很重要的事。

徐光大哥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不管啥事都不放在心上。但他的底色就是那样的，就像朱虞夫大哥坐牢期间，他把朱虞夫的儿子招聘到自己的环保检测公司上班，丝毫不在意国保的施压。可是，就是这个大大咧咧的人，居然绝食了那么久，他甚至是想要用生命告诉中共，我，是你们永远打不倒的人！要知道，他有着优渥的生活，完全可以不这样。虚与委蛇？不是他的底色！于是，看着这个甚至有点粗糙的汉子，我知道了我的渺小。但，我对前辈们的敬意，更甚。

我感觉，杭州前辈们把同中共的斗争当作了自己的生活姿态，并不在意自己活得如何。就像吕耿松大哥，中共在他刑满释放后，给他送达剥夺政治权力通知，他一把撕了，全然不在乎。而他的妻子汪雪娥大姐，则是在吕耿松坐牢期间，卑鄙的国保忽悠她，让她和老吕离婚时，霸气十足地说了一句话：我们家老吕是全天下最好的男人！打压？仅此而已！我从汪雪娥大姐的身上，看到了杭州民主党人的风骨，因为她的丈夫就是顶天立地的男人，她的丈夫的兄弟也是如此。斗争而已，有什么大不了！

最近，徐光出狱了，我的两位兄长咎爱宗，邹巍还在坐牢。而我，特别担心的并不是这两位，而是徐光大哥。一百五十多斤的汉子，瘦成八十多斤，我特别担心他的脏器会出现不可逆损伤甚至病变。我已经失去了好几位让我敬重的杭州朋友，我不想看到徐光再有什么让我担忧的结果，因此写下这些文字，以抒胸臆。

民运同中共的斗争之残酷与艰辛远超所有人想象，但我从来没有看到杭州的前辈们有谁退缩过。海外的有些现象让我只能更加沉默，但幸好有杭州前辈们的珠玉在前，督促着我不能真正停下脚步。毕竟，斗争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姿态，我又有什么资格停滞不前呢？

编辑：胡丽莉 赵杰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从我的经历到小洛熙事件

——普通人在医疗体系里的无力感

作者：朱晓娜

看到宁波小洛熙的事情，我一直缓不过来。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就这样离开了。作为一个母亲，我看到这样的新闻，第一反应不是“事件本身有多复杂”，而是那种很直接的难受——如果换成是我的孩子，我该怎么办？

后来我一直在想，这类事情为什么总是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也许并不仅仅是某一个医院的问题，而是很多普通人在面对医疗体系时，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我自己也经历过。2021年，我怀孕37周，因为宫颈环扎需要拆线，到医院就诊。那段怀孕经历并不轻松，之前经历过两次流产，所以这个孩子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好不容易才保住的。

本来以为只是一次常规拆线，但到了医院后，医生告诉我需要立即进行剖腹产手术。说实话，当时我没有太多判断能力，也不懂医学。我唯一的感受就是紧张，还有对孩子安全的担心。医生说要这样处理，我就只能接受。第二天，37周加1天，我做了剖腹产手术。

事情过去很多年了，但我偶尔还是会想：当时有没有其他选择？我是否真正理解了所有情况？如果我当时提出疑问，会不会得到更充分的解释？

这些问题，其实一直没有答案。因为在那样的场景下，患者和医生之间的信息差是很大的。医生掌握专业知识，也掌握判断依据，而患者往往只能依赖医生的解释。很多时候，不是不想问，而是不知道该怎么问，也不敢问。

我身边也有不少朋友有类似经历：签字很快、解释很简短、选择看起来也不多。大家更多是“相信医生”，而不是“做出选择”。这种信任当然是必要的，但当信息不对等变成常态时，很多人心里其实是没有底的。

所以看到小洛熙事件的时候，我才会特别有感触。一个家庭在失去孩子之后，最基本的诉求其实很简单——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现实中，很多时候事情并不会那么直接。信息、流程、鉴定、沟通，每一步都可能变得很复杂。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些程序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压力。我并不想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为某个医生或者某一家医院，因为我相信大多数医护人员也是在自己的体系里工作。但我

确实觉得，一个让普通人感到无力的系统，本身是值得被讨论的。

医疗本来应该是最需要信任的领域之一。但这种信任，应该建立在清晰的信息和充分的沟通上，而不是“只能相信”。一个社会是否尊重普通人，不只是看它能提供多先进的医疗条件，也要看一个普通人在遇到问题时，能不能被认真对待。

我写这些，不是想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只是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放在这里。因为很多时候，真正让人不安的，不只是结果本身，而是过程里那些说不清、问不明、等不到的部分。如果信息足够透明，沟通足够充分，很多误解和恐惧其实是可以被提前化解的。可一旦普通人的疑问被轻轻带过，感受被匆匆忽略，再大的专业也很难真正安抚人心。

也许，医疗最珍贵的地方，不只是治病救人，更是在每一个脆弱的时刻，让人知道自己被看见、被解释、被认真对待。只有当信息透明、沟通充分成为常态，普通人才能真正拥有面对未知的底气！

编辑：黄吉洲 校对：程筱筱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清算中共百年暴政，迎回属于人民的尊严与自由

作者：刘乐园

在所谓“七一建党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不应随中共的宣传机器一起歌功颂德，而应翻开一张跨越百年的历史账单，严肃清算这个极权政党给中华民族、给中国人民、给无数家庭带来的深重灾难。

中共的历史，从来不是一部所谓“解放人民”的历史，而是一部以谎言夺权、以暴力治国、以恐惧奴役人民的血泪史。从土地改革中的暴力斗争，到反右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整肃；从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到文化大革命中对人性、家庭、文化和信仰的摧毁；从“六四”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碾压，到对法轮功、家庭教会、维权律师、异议人士和普通上访民众的持续迫害，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充满了无数被掩盖的冤魂与苦难。

更令人唏嘘的是，当年那些起义、投诚或被整编的原国民党官兵，也未能善终。不少原国民党官兵在整编后被编入部队，在当时的政治和军事体制下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参加朝鲜战争，并在战场上付出了生命代价；一些幸存者在战争结束后又经历了后续政治运动和清查，而朝鲜战场上部分投降后选择返回中国大陆的国军官兵，也被中共视为叛徒对待。历史证明，所谓的“既往不咎”不过是一句空话，留下的只有一次又一次对人的利用与政治清算。

这个政权最可怕之处，不只是它制造灾难，更是它不允许人民记住灾难；不只是它伤害人民，更是它逼迫人民感谢伤害者。它用教科书篡改历史，用媒体封锁真相，用监控和警察压制声音，用恐惧让人沉默。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被它强行关进一党专政的精神牢笼之中。

改革开放一度让许多人误以为中国会逐步走向开放与法治，但近年来，言论管控不断加强，社会控制持续收紧，个人自由进一步受到限制，极权体制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以新的形式不断强化。

今天的中国，表面的繁荣正在迅速破灭。青年失业，中年负债，老人养老无依；房地产烂尾，民营企业凋零，普通家庭一生积蓄被掏空。地方财政枯竭后，各种罚款、收费、盘剥层出不穷。所谓“为人民服务”，早已变成权贵阶层对人民最后一点血汗的榨取。

更令人愤怒的是，当人民遭受不公时，体制并不保护受害者，反而保护作恶者。农民失地无人管，工人讨

薪被打压，上访者被截访，信仰者被监控，敢说真话的人被威胁、拘押甚至判刑。在中共统治下，法律不是保护人民的盾牌，而是打压人民的工具。

我之所以站出来发声，是因为我深知，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信仰自由、没有司法独立的国家，普通人随时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今天被迫害的是别人，明天就可能轮到自己。沉默不能换来安全，退让也不能换来自由。只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揭露真相，极权的高墙才会出现裂缝。

我们在海外发声，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公义；不是为了制造对立，而是为了让历史真相不再被掩埋。我们要告诉世界：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更不代表中国人民。真正的中国，是那些在苦难中仍然坚守良知的人，是那些不愿向谎言低头的人，是那些渴望自由、尊严和信仰权利的普通百姓。

百年暴政，必须清算；百年谎言，必须揭穿；百年血债，必须被历史审判。中共靠谎言起家，靠暴力维持，靠恐惧统治，但没有任何独裁政权能够永远站在人民的头上。高墙再厚，也挡不住人心觉醒；黑夜再长，也终将迎来黎明。

我们相信，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那一天终会到来。那一天，人民不再因说真话而恐惧，不再因信仰而被迫害，不再因追求公义而被威胁。那一天，中国将摆脱一党专制的阴影，重新迎回属于人民的尊严、自由与光明。

编辑：黄吉洲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论达赖喇嘛转世问题

作者：胡平

去年7月6日，达赖喇嘛九十华诞，达赖喇嘛发表讲话，对自己的继任问题作出明确阐述。其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达赖喇嘛制度将会延续。「甘丹颇章信托基金会」（GadenPhodrangTrust）及其董事会，将负责寻访并认证转世灵童；该基金会将遵循藏传佛教传统，并与各大教派领袖及其他宗教领袖协商。继任者将诞生于自由世界，即中国之外。

不出意料，中共当局对达赖喇嘛的这番阐述表示强烈否定。中共搬出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其核心内容亦可归纳为三点：必须在中国国内寻访；必须以「金瓶掣签」方式确定；必须经「中央政府批准」。然而，中共的这三项主张皆站不住脚。

## 一、关于「国内寻访」

在藏传佛教历史上，早已有于中国以外寻访转世活佛的先例。例如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1589–1616）诞生于蒙古，是蒙古族人。当时中国为明朝（1368–1644），而明朝版图并不包括蒙古。其理甚明：藏传佛教的弘传本就超越西藏地域与中国国界。活佛转世的寻访范围主要依据藏传佛教的信仰传播与信众分布，自然不受地理疆界限制。自古以来，藏传佛教的信仰圈已涵盖北至蒙古、南及印度诸地，因此在蒙古与印度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早有先例。

当代以来，自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59年流亡印度后，藏传佛教已走向世界，在中国之外的信众达五六百万之多，遍布蒙古、印度及欧美各地；事实上，中国境外已有多位转世活佛，其中不少并非藏族。因此，在中国以外的自由世界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既合理，又完全正当。

## 二、关于「金瓶掣签」

清代曾有若干皇帝以「金瓶掣签」方式介入达赖喇嘛转世的认定，但实际上，真正依此程序认定的达赖喇嘛仅一两位，多数历代达赖喇嘛——包括现任第十四世——均未经过金瓶掣签程序而确定。

退一步说，清朝皇帝之所以如此，尚有其宗教理由：彼等信奉佛教，并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满清皇帝介入转世事宜，是基于与西藏间「施主与上师」的特殊关系。

然而中共当局既不信仰佛教，又不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何以有资格干涉达赖喇嘛转世？

达赖喇嘛早已明言：「现今的中共是批评宗教的无神论者，尤其视佛教为愚昧落后的象征，且不遗余力地指责我是魔鬼。若他们说不允许魔鬼转世，倒也说得过去；但如今却是中共坚持要自己寻找魔鬼的转世。若中共政府要插手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必须先成为宗教信徒，承认轮回，再去找出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转世，然后再来干涉我的转世，那才合理。总之，这是我的转世，除了我之外，谁都没有理由插手。」

他并补充道：「任何政治权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若出于政治需要选出所谓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则无人需要承认或信奉那个孩童。」

## 三、关于「中央政府批准」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曾称：「达赖喇嘛的称号是中央政府册封的，否则不具合法性。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是经当时的民国政府批准认定的。」

此说并不符合事实。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非经民国政府批准认定。事实上，民国政府曾有意干预，但西藏政府并未理会。从寻访、确认到坐床，均由西藏摄政王及僧团自行完成。坐床典礼时，民国政府仅派蒙藏委员会代表吴忠信前往观礼。

阿沛·阿旺晋美于1989年即明确指出：「没有吴忠信主持坐床仪式这回事，他只是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观礼’而已。」

为何民国政府当年希望参与？因当时西藏政教合一，达赖喇嘛既为宗教领袖，又为政治领袖，即西藏地方政府首脑。对国民政府而言，作为宗教领袖的产生他们无权干涉，但作为地方政府首脑的产生，则与中央有关。为体现「中央—地方」关系，他们主张至少须经中央认可。然而，多数藏人并不承认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也不接受中央的从属定位。结果，国民政府欲干预而未果，只能派员观礼。中央方面报称是「主持」，但藏方仅视之为「贵宾观礼」。

从民国角度看，他们的干预尚有一点道理——因当时政教合一。但此理于今日已不复存在。流亡藏人自2011年实现政教分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退出政治职务，仅保留宗教领袖身份；而中国境内自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后，法律上也规定达赖、班禅不再是地方政府领导人。既如此，现今中共当局又有何理由干预

其转世？

此外，中共当局还声称「藏传佛教没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此说同样错误。2013年6月，《亚洲周刊》（第27卷第22期）刊载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靳薇教授访谈，文中指出：「历史上也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传统。」这句话极为关键，因为它属于史实而非观点。凡了解藏传佛教史者皆知确有其事。

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已有六百余年历史，其间并非一成不变，今后亦可调整。而决定是否变革、如何变革的权力，自然在达赖喇嘛本人与藏传佛教机构及信众之手，与中国政府毫无关联。此处，不妨参照西方罗马教皇的继承制度，以助理解。

在十一世纪以前，罗马教皇由世俗君主或意大利贵族遴选或认可。教皇尼古拉二世于1059年规定，教皇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但仍需法兰克王亨利一世及其继任者批准。至1179年第三次拉特朗会议与1274年第二次里昂会议确认后，才正式规定教皇可由枢机主教单独选出，惟法、西、奥三国君主仍保有否决权。至二十世纪初，教皇庇护十世废除此种世俗否决权。1914年，本笃十五世遂成为首位无需世俗介入而由教会单独选出的教皇。由此可见，早期世俗权力对教皇继承影响极大；随历史发展，其影响力逐渐削弱，终至归零。

昔时君主干预教皇继承，是因政教合一，君主皆信仰基督教，奉教皇为精神领袖。彼时教权与王权互为依存：新教皇须得到君主认可，君主登基亦需教皇加冕，以示「君权神授」。随后政教分离制度确立，教皇继承制度的改革由教会自行决定，非世俗权力所能干预。今日欧洲已完全政教分离，教皇由宗教机构单独产生，世俗君主登基亦无需教皇加冕。这即是政教分离——国家机器不干涉宗教，宗教亦不干涉国家。

达赖喇嘛已多次阐述转世观念、制度起源与寻访方法，强调：达赖喇嘛转世属宗教事务，任何政治权威皆无权干涉。其立场——无论从藏传佛教传统、政教分离原则，或藏传佛教全球化的现实——皆完全合理、正确。简言之：达赖喇嘛转世，是达赖喇嘛的事，是藏传佛教的事，与中共这个无神论政权毫无关系。中共当局无权干预达赖喇嘛转世。中共当局炮制的那一套「寻找与确认达赖喇嘛转世」办法，错误而荒谬。未来若真推出所谓「官方达赖喇嘛」，必不会得到绝大多数藏传佛教信众的承认。这场政治操弄注定成为历史笑柄，最终被彻底废弃。

编辑：黄吉洲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 On the Question of the Dalai Lama's Reincarn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ebate surrounding the future reincarnation of the Dalai Lama following his public statement issued on his ninetieth birthday.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e Dalai Lama affirmed that the institution would continue, that the Gaden Phodrang Trust would oversee the recognition process in consultation with senior Tibetan Buddhist leaders, and that any future reincarnation would be found in the free world rather than within China.*

*The article contrasts these positions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tated requirements that the reincarnation must be identified within China, selected through the Golden Urn procedure, and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se requirements are inconsistent with Tibetan Buddhist history, religious tradi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religious autonomy.*

*To support this position, the article cites the Fourth Dalai Lama, who was born in Mongolia outside the terri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It argues that Tibetan Buddhism has long extended beyond Tibet and China, with followers throughout Mongolia, India, and many other regions. Because Tibetan Buddhism has become a global religion,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identifying a future Dalai Lama outside China is historically consistent and religiously legitimate.*

*Regarding the Golden Urn system, the article maintains that only a small number of Dalai Lamas were recognized through that procedure, while most, including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were identified without it. The author further argues that Qing emperors participated because they were Buddhist patrons, whereas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ly embraces atheism and therefore lacks comparable religious authority. The essay also cites statements attributed to the Dalai Lama asserting that only Tibetan Buddhist institutions possess legitimate authority over his reincarnation and that political authorities should not determine religious succession.*

*The article disputes official claims concerning the recognition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arguing tha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ttended his enthronement as an observer rather than determining the selection. It further argues that the separation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within the Tibetan exile community has removed any remaining political basis for state involvement. Finally, by compar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Dalai Lama succession with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apal elections, the essay concludes that religious succession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religious institutions rather than political authoriti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ny state sponsored reincarnation lacking religious recognition would be unlikely to gain broad acceptance among Tibetan Buddhist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七月诗一怀念

作者：蔡楚

怀念一棵老树  
根，扎进大地  
叶，撑开乌云  
即使被雷霆劈断  
仍然挺立

怀念一个人  
用骨灰书写爱情  
在海上把忧伤  
化作阴间的地址

怀念一个灵魂  
没有远去  
海浪一样向你扑来  
礁石一样站成宪章

怀念，年年抽出新绿  
直到怀念长成树前  
我不会忘记  
把种子留给人间



# 自由，从来不是一句口号

作者：李彬妹

直到今天，仍然有人问我，为什么总是谈论自由。

有人觉得，自由只是政治学里的概念；有人认为，自由离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还有人觉得，只要经济能够发展，普通人的生活能够维持，谈论自由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这些年的经历让我越来越明白，自由从来都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它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真正失去过选择的人，才会明白选择有多么珍贵；真正经历过沉默的人，才知道说话为什么重要；真正面对过权力的人，才会理解法律为什么必须约束权力。

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自由理解为一种可以做任何事情的权利。事实上，现代社会所说的自由，并不是毫无边界的放任，而是在法律保护之下，每一个人都拥有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权利。

这种权利，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意味着，你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用因为不同意见受到惩罚；它意味着，你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用担心因为身份普通就失去公平；它意味着，当公共权力影响你的生活时，你能够通过法律、媒体、社会监督等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只能默默承受。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从未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我和很多普通人一样，把更多精力放在家庭、工作和生活，总觉得制度离自己很远，只要安安稳稳过日子，一切都会顺其自然。

后来我才发现，制度并不是一件抽象的事情，它会影响一个人的工作、家庭、教育、医疗、言论，甚至影响人生中每一个重要决定。

也正因为如此，我开始重新认识法治。

真正的法治，不只是制定法律，更重要的是所有人，包括掌握公共权力的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约束。法律不能只是要求普通人守法，更应该首先要求掌权者依法行政。

如果法律只约束普通人，而不能约束权力，那么法律便很难真正体现公平。

现代民主制度之所以强调司法独立，并不是为了让司法高于政府，而是为了确保任何权力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当普通人与公共机关发生争议时，法院能够依据法律作出独立判断，而不是受到行政力量影响，这样普通人才会相信，公平不仅存在于法律条文里，也能够落实到现实生活中。

除了司法，我也越来越关注新闻自由的重要意义。

很多人认为，新闻只是报道每天发生的事情。但实际上，新闻监督更重要的作用，是让公共权力始终处于社会的关注之下。当媒体能够调查事实、公开讨论公共政策，当不同观点能够在社会上充分交流，人们才能获得更多信息，也才能形成更加理性的判断。

一个社会如果只有一种声音，人们往往很难全面了

解事情的真相；而当不同观点都能够公开表达，社会反而更容易接近事实。

我开始关注台湾的发展，也是因为在那里，我看到了这种制度安排带来的变化：不同政党之间可以公开竞争，媒体可以持续监督政府，社会团体能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普通民众也能够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台湾没有问题。民主社会同样存在争议、冲突和分歧。但真正让我感受到希望的，是那里解决问题的方式。

当政策引发争议，人们可以公开讨论；当政府受到质疑，媒体能够持续追踪；当行政行为涉嫌违法，法院可以依法审查；当人民对执政者不满意，还能够通过选举和平更替政府。

我逐渐明白，民主制度真正值得珍惜的地方，并不是它能够避免所有错误，而是它能够不断纠正错误。

一个社会是否真正进步，并不取决于是否从来不会犯错，而在于犯错之后，是否拥有承认错误、纠正错误和防止再次犯错的制度能力。

这些年，我越来越相信，一个国家真正的稳定，并不是建立在人们保持沉默之上，而是建立在人民愿意信任制度之上。

而这种信任，并不是依靠宣传形成的，而是依靠公平、公正、公开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当每一个普通人相信法律能够保护自己，当每一种不同声音都能够被社会听见，当每一项公共权力都必须接受监督，人们自然会对未来充满信心。

自由并不会削弱一个国家，相反，它能够让社会拥有更多创造力，也能够让人民更加愿意承担责任。因为只有受到尊重的人，才更愿意尊重他人；只有拥有权利的人，才更懂得珍惜权利；只有生活在法治之中的公民，才更愿意共同维护社会秩序。

今天，我依然相信，自由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应当成为每一个普通人的基本权利；民主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一种不断完善社会的制度实践；法治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所有公共权力都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则。

我向往的，并不是一个没有分歧的社会，而是一个允许分歧存在、允许不同声音表达、允许人民监督政府、允许制度不断自我完善的社会。

因为我始终相信，一个真正文明的国家，最大的力量并不来自权力本身，而来自人民发自内心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只能建立在自由、法治与民主共同构成的制度基础之上。这也是我始终珍视这些价值，并愿意不断讲述、不断思考、不断表达的原因。

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熊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纪念刘晓波先生离世九周年

作者：金米

下午把手头最后一点事情做完，我提前下了班，一个人开车去了海边。

我一年总会这样几次，没有约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像是心里忽然生出一点潮汐，把人推向海边。

沙滩还是那片沙滩，海还是那片海。海鸥在头顶盘旋，风把头发吹得有些凌乱。远处的浪一层一层翻卷，因为隔得太远，几乎听不见声音，只看见它们无休无止地起，又无休无止地落。

海总是这样，不急，也不解释，而我每一次看见海，都会想起刘晓波。

别人看海，看的是日出、晚霞、远方和归航的船。我却总忍不住想，一个人的一生，最后化作了海里的一部分。于是后来，每一片海，都像认识他。

我常常觉得，一个人若最后连墓碑都没有，本该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没有可以献花的地方，没有可以停下来轻轻叫一声名字的地方。可偏偏，大海又太辽阔了。辽阔得像一种命运，把所有寻找都化成了眺望。

海不会替谁保存记忆。

今天的浪，不会记得昨天的浪；今天吹过来的风，也不会知道它曾吹过谁最后停留的地方。

可人会。

所以每次来到海边，我都会安静一会儿。不是寻找什么，只是觉得，这样望着海的时候，人与历史之间，会忽然变得很近。

有些人的一生，最后浓缩成一本书、一座铜像、一间纪念馆。

而有些人，只剩下一片海。

海面那么宽，那么静，静得什么都装得下，也什么都不说。正因为它什么都不说，后来的人，才总想替它说一点什么。

有人说，人一生会死去三次：第一次是生命结束；第二次是葬礼结束；第三次，是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也忘记了他的名字。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对。但我知道，只要我还会来看海，我就还会想起他。

七月只是一个提醒。真正让我想起他的，从来不是日历，而是潮汐，是海风，是那些一遍又一遍涌上岸来的浪。

今天，我在沙滩坐了很久。

耳畔是海鸥零零落落的叫声，风一直吹，远方的海浪安静地翻滚。阳光慢慢偏西，沙子还留着白天的温度。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看着海，像看着一本已经读过很多遍，却始终没有读完的书。

后来，我低下头，写下了这些字。

忽然觉得，纪念一个人，也许并不需要鲜花，不需要仪式，不需要很多人。只要还有人在七月的某一个下午，提前下班，一个人来到海边，在风里轻轻念起他的名字。

那么，他就没有真正离开。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当母亲成为制度的一部分

作者：李彬妹

很多年以前，我从未认真思考过什么是自由，也从未思考过制度与普通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对于那时的我来说，生活无非就是照顾家庭，抚养孩子，努力把日子过好。我相信，只要勤劳、本分，人生总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有时候并不仅仅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于每一个女人来说，生育本应是一项属于自己的权利。是否生育、何时生育、如何安排家庭生活，本应由夫妻共同决定，而不是由外界替自己作出选择。然而，当个人意愿与制度发生冲突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一个普通人在庞大的制度面前是多么渺小。

那段经历改变的不仅仅是我的身体，更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开始不断追问，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人生决定，自己却没有真正的选择权？为什么一个家庭关于孩子的决定，可以因为一项政策而发生彻底改变？为什么一个普通人的声音如此微弱，甚至连解释和申诉的机会都十分有限？

这些问题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了很多年。

起初，我只是觉得自己遭遇了不幸。后来我才逐渐明白，真正值得思考的并不是个人的不幸，而是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有相似的经历。当一个人的遭遇不断发生在不同家庭、不同地区、不同年代时，它便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而成为一种值得反思的社会现象。

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阅读更多关于现代社会治理、法治以及民主制度的资料。我发现，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并不会因为拥有强大的行政能力而受到尊重，而是因为它懂得如何限制权力、保护个人权利。

任何制度都会制定公共政策，但现代文明始终强调，公共利益不能以无限牺牲个人权利作为代价。法律存在的意义，不只是赋予政府管理社会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划定权力边界，防止任何权力无限扩张。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考，我开始重新理解自由。

过去，我一直认为自由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与普通人的生活距离很远。后来我才发现，自由其实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自由意味着一个家庭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意味着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规划未来；意味着面对重大人生选择时，不需要担心自己的意志被他人轻易取代。

自由并不是毫无约束，而是在法律框架下，每一个人都拥有应当受到尊重的基本权利。

后来，我开始关注不同地区的发展。我尤其关注台

湾社会的发展历程，并不是因为那里没有问题，而是因为我看到了另一种制度运行方式。台湾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改革，逐渐建立起选举制度、新闻监督、司法救济以及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不同意见可以公开讨论，政策可以接受社会检验，政府也需要面对公众监督。

这种制度安排给我最大的启发，不是谁执政，而是人民拥有表达意见、监督政府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渠道。

我逐渐明白，一个社会真正值得信赖，不是因为它不会犯错，而是因为当错误发生以后，它拥有纠正错误的能力。

有人说，民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完全赞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做到完美无缺。但是，一个能够允许人民批评、允许媒体监督、允许司法依法独立运行的社会，总比一个缺乏公开讨论和监督机制的社会更有机会不断修正自己的不足。

我向往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不断完善自身的制度。

这些年的经历让我越来越相信，国家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数字，更体现在普通人是否能够拥有尊严的生活。当每一个人都能够依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当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自主规划自己的未来，当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受到法律平等保护，一个社会才真正拥有长久发展的基础。

今天，当我再次回顾自己的经历，心中依然会有遗憾。但相比遗憾，我更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成为一种提醒。任何制度都应该把人放在首位，而不是让人去适应制度。权力应当受到法律约束，政策应当尊重人的尊严，社会的发展也应当建立在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尊重之上。

我相信，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不会因为人民拥有自由而变得混乱，而会因为人民拥有自由、权利受到保障、制度接受监督而变得更加稳定。

也正因为如此，我更加珍惜民主、法治与自由的价值。它们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每一个普通人能够安心生活、拥有尊严、守护家庭的基础。

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熊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洛杉矶举办中国民主转型论坛

—— 公民抵抗协会“民主前辈笔下的民主中国之路”活动圆满落幕

作者：张致君

【在野党杂志社张致君洛杉矶讯】由公民抵抗协会主办的“民主前辈笔下的民主中国之路：转型正义、宪政重建与民主未来”活动，于 2026 年 6 月 20 日下午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顺利举行。本次活动邀集多位长期关注中国民主化、人权运动与宪政转型的民主前辈、公共知识分子与海外华人社群代表，共同探讨中国未来民主转型的制度方向与历史责任。

本次活动分为主题演讲、民主前辈论坛与民主思辨辩论赛三个主要环节。活动首先由六四学运领袖封从德进行主题演讲，从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脉络出发，回顾海外民运、宪政重建与转型正义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中国未来如果要真正走向自由民主，不能只停留在反对极权的层次，更必须提前思考制度重建、国家定位与公民社会的承接能力。

随后进行的“民主前辈论坛”，邀请朱虞夫、苏晓康、王应国、李亚辉、林劲鹏等嘉宾，分别从国外民运人士处境、流亡经验、南方民运历程、民主转型后的政治安排，以及海外民主运动的未来方向等角度发言。与会者普遍认为，中国民主化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个需要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与制度准备的长期工程。海外华人社群虽然身在自由世界，但仍有责任保存历史记忆、传承民主经验，并为中国未来的制度转型提出具体方案。

“民主思辨辩论赛”则以“中国大陆民主化后应恢复 1946 年《中华民国宪法》，还是重新制定新宪法？”为辩题展开讨论。正反双方分别就法统延续、宪政正当性、民主授权、转型成本、国家重建与现实可行性等问题进行攻防。现场讨论气氛理性而热烈，与会者也透过提问参与讨论，使这场辩论不只是立场交锋，更成为一次关于中国民主转型路线的公共思辨。

公民抵抗协会理事长王苡儒表示，本次活动的意义不在于立即得出唯一答案，而在于让不同世代、不同经验与不同政治主张的民主人士，能够在同一个公共空间中理性讨论中国未来。无论是恢复 1946 年《中华民国宪法》，还是重新制定新宪法，真正重要的是中国未来必须回到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与人权的轨道上，并且让人民重新成为国家的主人。

未来公民抵抗协会将持续在海外华人社群推动公民教育、民主思辨、历史记忆保存与中国民主化相关公共讨论，让自由的火种在不同城市、不同世代之间继续传递。虽然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仍然漫长，但每一次讨论、每一次集会、每一次公开辩论，都是在为未来积累思想与力量。唯有持续对话、持续组织、持续培养公民精神，民主中国的道路才会一步一步被走出来。

活动资讯

活动名称：【2026 自由民主论坛】第一场

特别议题：“四六宪法”与华人民主转型的宪政想象

时间：2026 年 6 月 20 日（星期六）13:00—16:00

地点：洛杉矶六四纪念馆

(3024 Peck Rd, El Monte, CA 91732)

主办单位：公民抵抗协会、自由雕塑公园、中国议会、夜航人 YouTube 频道新闻联络人：公民抵抗协会理事长王苡儒

编辑：张致君 校对：王滨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民主前辈笔下的民主中国之路”于六四纪念馆合影。



民主思辨辩论赛现场，与会者围绕“恢复 1946 年《中华民国宪法》，还是重新制定新宪法”展开讨论。



苏晓康分享中国民主运动经验、转型正义与宪政重建的思考。



# 湾区“中共百年罪恶图片展”揭示中共百年统治灾难

摄影记者：关永杰

【旧金山湾区讯】2026年6月21日下午，由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与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中共百年罪恶图片展”在圣利安卓（San Leandro）Marina Park举行。活动于下午2时开始，吸引众多民众驻足观看和交流。有多位中国民主党党员更是携家属到场参与，共同呼吁铭记历史、追求真相与自由。

本次展览以中英文图文形式呈现，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争议议题，内容涵盖历次政治运动、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1989年“六四”事件，以及近年来西藏、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香港新闻自由和公民权利状况、宗教信仰群体遭遇打压等议题。展览通过历史照片、文献资料和文字说明，展示中共统治时期发生的人权灾难、政治迫害和社会创伤，并向公众介绍相关历史背景与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主席方政向记者表示，举办此次展览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真实历史资料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所造成的种种灾难与伤害。他指出，中共建党至今已超过一个世纪，今年是105年，建政亦已70余年，百年以来，这极权组织对中华大地、乃至对世界造成的伤害罄竹难书，其间发生的大量政治迫害、反人类罪行和社会灾难，不应被遗忘。此次展览采用历史叙事和图文展示方式，希望提醒人们牢记历史，同时让更多美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认识中共极权体制的危害。

方政表示，近年来，中共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对香港公民社会和新闻自由的持续打压，以及对异议人士和维权群体的压制，都显示出其专制统治并未改变。他认为，记录历史不仅是为了纪念过去，更是为了警示未来，防止类似悲剧重演。他透露，主办方将持续更新相关资料，并计划将部分内容整理后发布于中国民主党网站，供公众在线查阅。

活动主持人、中国民主党Fremont支部主任刘静涛先行介绍了活动主题，并表示，一个民族不能遗忘历史，展出的每一张图片、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真实发生在中国的苦难。

随后，多位中国民主党党员先后发言，分享自己对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看法。

中国民主党党员、本次活动组织者郭志军表示，中共最害怕的并非外部压力，而是人民对真相的记忆。他指出，从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到“六四”事件，无数受害者及其家属至今仍未获得公正评价。郭志军呼吁民众拒绝遗忘历史，勇敢面对真相，共同推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与法治。

中国民主党党员、三藩市支部主任郭鉴鑫表示，人们今天站在这里，是为了铭记历史、呼唤未来。他强调，过去几十年中，许多中国民众因政治迫害、言论审查和人权侵害失去自由与尊严。活动并非为了制造仇恨，而是为了追求真相、正义与良知，维护每个人自由表达、独立思考和有尊严生活的权利。

中国民主党党员李树青在发言中批评中共长期通过政治斗争和社会控制维护统治，并认为改革开放时期对外开放所获得的资源，最终被用于强化政权控制和扩张影响力。他呼吁海内外华人团结起来，反对专制统治，争取自由民主和法治社会。

活动期间，不少参与者围绕中国曾长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展开讨论。多位党员表示，自己或家人都曾亲历这一时期。一些人回忆，超生家庭曾面临高额罚款、失去工作、无法落户等处罚；部分地区甚至存在强制结扎、强制引产和频繁检查等做法。与会者认为，这些政策给无数家庭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也成为许多人心中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现场不少人分享了亲身经历或亲友遭遇，引发广泛共鸣。

活动至傍晚6时才告结束。主办方表示，活动获得良好反响，未来计划将图片展继续带到圣荷西市政厅广场以及萨克拉门托加州议会大厦广场等地点巡回展出，让更多民众有机会了解相关历史与议题。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展示的图片配有中英文说明，吸引众多的民众驻足观看。拍摄：关永杰



前来参与活动的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成员及湾区民主人士合照。拍摄：薛明珠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主席方政向其党员讲述中共的反人类罪行。拍摄：关永杰



## 郑丽文访美座谈（洛杉矶）见闻录

作者：张致君

距离郑丽文“美中台和平繁荣访问”已经过去半月有余。网络上余波未尽，观察了这些日子的社会反应，我着手写下这篇见闻录。

郑丽文此次访美，本来想展现的是“和平对话”“美中台繁荣”的路线包装。但在纽约和洛杉矶，两场来自中国大陆人士的当面呛声，让这趟访问暴露出另一个尖锐的问题：最不相信中共承诺的，恰恰是那些真正从中国大陆走出来、亲身经历过中共统治的人。

2026年6月8日晚，郑丽文在纽约亚洲协会与中国问题专家夏伟、罗素对谈。她谈到所谓“郑习会”，并称在会面中得到习近平承诺，只要“两岸同属一中，一切好商量”。但就在观众自由提问环节，一名自称来自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站起来发言。他脱下外套，露出写有“拥抱共产党，台湾变香港”的衬衫，质问郑丽文为何主张削弱台湾国防能力，并提醒在场者：一个民主台湾，注定是独裁中国的眼中钉。郑丽文在这场问答交流中，并未做出任何反应，神色慌张。抗议者话未说完，就被安保人员带离会场。

这个场面刺眼，不只是因为有人在郑丽文面前喊出了“不要相信共产党”的声音，更因为这个声音不是来自台湾政党斗争的惯用标签，而是来自中国大陆异议者的政治经验。对很多台湾政客而言，“和平”“对话”“交流”是可以包装的政治语言；但对从大陆出来的异议人士而言，中共不是抽象概念，是一套真实运作的恐惧机器。它监控、威胁、打压异见、在海外延伸影响，他们往往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这位抗议者的逻辑很直接：如果台湾可以证明华人社会能够拥有选票、自由媒体、政党轮替和公民权利，那么中共长期灌输的“民主不适合中国人”就会被现实击穿。台湾的存在本身就会让中国大陆人民看到“华人社会也可以民主”的可能性，因此中共政权不会容忍一个自由民主的台湾长期存在。

这也是郑丽文在纽约被呛的核心意义。

她谈“只要同属一中，一切好商量”；大陆异议者则提醒她，在中共逻辑里，“一中”不是平等谈判的起点，而是吞并和控制的前提。

她强调“对话”；大陆异议者强调“对方是谁”。

她把问题包装成两岸沟通障碍；抗议者则把问题还原成自由制度与独裁制度的冲突。

郑丽文在法拉盛出席侨界活动时，场外出现投影抗议。抗议者把讽刺图像投射到建筑外墙上，图像描绘郑丽文手持卷轴，将台湾地图交向一只大手。参与者称，这种表达是为了批评郑丽文近期政治主张，认为她像是在向北京递“投名状”。这场投影抗议被描述为低冲突、非接触的公共艺术行动引起台湾社会关注。

如果说纽约亚洲协会的呛声是正面质问，法拉盛的投影是象征性的政治审判。

投影没有冲撞，没有肢体对抗，把一个强烈意象打在墙上：台湾是否正在被政治人物当作筹码、礼物，甚至投名状交给北京？如果说，郑丽文对待这两场抗议者的直面抗议表现和平。那么6月14日，郑丽文在洛杉矶发表“美中台和平繁荣之旅”专题演讲时的表现却是真正撕下了她伪善的嘴脸。

作为《北京之春》记者，我全程在现场采访，亲历了郑丽文洛杉矶座谈会，谨将所见所闻记录如下：

在得知郑丽文即将于洛杉矶举办座谈会后，记者提前数日通过主办方公开的报名渠道申请入场。然而，报名系统早已显示“名额已满”。随后，记者分别联系了活动举办方的两位负责人，并以不同媒体身份提出采访申请。有趣的是，其中一位负责人当场表示欢迎采访，另一位则称需待内部会议讨论后再作回复。最终，两家媒体均获准进入会场采访，其中包括《北京之春》《在野党》。



橙色手环为主办方发放的官方准入凭证，同时配发媒体采访证。

6月14日上午，记者在活动开始前凭官方发放的橙色手环及采访证进入会场，媒体人员均需登记身份后方可入场。

上午10时，会议进入预定开始时间。然而，记者观察到，会场仍有约三分之一的座位空置，而主持人却宣称本次活动“座无虚席”，这一说法与现场实际情况明显不符。



图为会议开始时，现场上座情况

会场大屏幕随后显示了会议须知，其中一条规定尤为引人注目：“禁止在会场内展示任何横幅。”由于郑丽文迟到，整场座谈会延后约30分钟才正式开始。

在郑丽文抵达前，主办方首先宣布，本场活动不设现场自由提问，所有问题均须提前写在纸条上，由主办方筛选后再交由郑丽文回答。然而，当郑丽文正式入场后，她本人却公开表示：“今天任何问题都可以自由提问，我都会一一回答。”但最终实际执行的仍然是事先筛选问题的方式，并未开放自由提问。现场被选中的问题，大多围绕如何协助大陆台商发展等议题，与外界普遍关注的政治敏感问题形成鲜明对比。

就在记者试图寻找提问机会时，现场一位抗议人士因不满主办方限制提问、引导议题方向，突然起身发言：“中国国民党是中国的政党，为什么国民党不帮助中国人民实现民主？”话音未落，即遭到现场工作人员及主办方人员强行驱离。

令人遗憾的是，在整个过程中，郑丽文始终继续进行演讲，并未就现场发生的冲突或强制驱离行为作出任何制止或回应。作为中国国民党的重要政治人物，其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的处理方式，以及对不同声音的态度，难免令人对其政治素养与公共危机处理能力产生质疑。

更具争议的是，现场冲突进一步升级。记者目击，两名抗议人士在混乱中受到不同程度的人身攻击。其中，抗议者董明被参会人员推倒在地后，头部又遭到脚

踢；另一名抗议者乐在霖则遭强行捂嘴并控制，随后被警方带离现场。警方调取现场监控及视频资料后，确认相关情况，当场释放了抗议人士。

与此同时，会场外亦聚集了大量示威民众，他们高举“相信共产党，没有好下场”“台湾变香港，走进火葬场”等标语，高喊口号，表达对郑丽文相关立场及此次活动的不满，使整场座谈会始终笼罩在激烈的争议氛围之中。

记者在会后特意搜索报道显示，其中世界日报等提到会议设有自由问答环节是极其不准确的，而报道中说“洛杉矶现场主办方称相关人士多次打断活动，因此被劝离，双方随后发生拉扯。”也是不准确的。

洛杉矶这一幕，使郑丽文访美争议从“政治立场”进一步变成“言论空间”的问题。一个主张和平对话的政治人物，在海外面对不同意见时，现场却出现抗议者被拖走、拉扯、殴打、受伤指控等场面。即使各方在不同媒体中的报道对细节说法不同，但这个画面本身已经足够讽刺：如果连美国土地上的公开质疑都难以被完整听完，那么所谓“与中共和平对话”的空间，究竟是建立在真实包容上，还是建立在选择性听取声音上？

美国行这次出现的大陆人反对声音正是来自于自己的政治创伤与历史经验。

这也正是郑丽文阵营最难回避的地方。

过去，亲近北京路线的政治人物把反对者扣上“台独”“绿营”“反中”的帽子，好像只要把批评者归类为台湾内部政治敌人，就能避开问题本身。

但这一次，站出来呛声的大陆人打破了这个叙事。他们不是“不懂中国”的人，恰恰相反，他们太懂中国共产党。他们不是因为台湾选举利益而反对中共，而是因为自己或身边人亲身经历过中共统治的代价。

这些大陆抗议者的出现，也让海外华人社会的政治裂痕浮出水面。一边是部分由被统战的侨界人士欢迎郑丽文，支持她强调两岸交流；另一边是中国民运人士、异议者、台湾本土派和反共人士，他们坚决认为这种交流会被中共利用，成为统战延伸的舞台。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回应郑丽文访美争议时也表示，中共势力已渗入美国侨界，并将此视为重要警示现象。其中还提到郑丽文访美期间出席侨宴，被传有中共统战官员出席，引发关注。

当然，任何政治人物都有表达路线的自由。



郑丽文可以主张对话，可以批评军事对抗，也可以认为两岸需要恢复交流。但问题在于，当一个政治人物公开要求台湾人相信中共承诺时，她就必须回答那些从中共体制下逃出来的人提出的问题：你凭什么相信？你凭什么认为“同属一中”之后还会有对等空间？你凭什么把一个独裁政权的口头承诺，放在台湾人民的安全与自由之前？

纽约的演讲者、法拉盛的投影者、洛杉矶场内外的抗议者，他们真正呛的不是郑丽文个人，而是一整套对中共过度天真的政治话术。

他们呛的是“和平”二字被滥用，呛的是“对话”被包装成单方面退让，呛的是“交流”变成统战的合法外衣。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提醒台湾社会：面对中共，最危险的不是战争意识，而是失去警觉；最昂贵的不是防卫成本，而是误信承诺之后要付出的自由代价。

美国行，郑丽文被大陆人呛声，真正形成了一种反差：她想告诉美国和侨界，她能与北京沟通；大陆异议者却告诉台湾人，北京从来不是一个可以用善意幻想来约束的政权。

她强调“不要战争”；抗议者强调“不要被骗”。她说“和平繁荣”；抗议者说“相信共产党没有好下场”。

这场访美风波最后留下的，不只是几段现场冲突视频，也不只是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口水战。它留下的是一个台湾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那些真正从中国大陆走出来的人，一再用自己的经验警告台湾不要误信共产党时，台湾政治人物还有没有资格把这种警告轻描淡写地说成“杂音”？

一个来自大陆的异议者，在美国公开场合都必须用被拖离现场的方式才能让一句话被听见，那么这句话本身就值得被记住。

因为它不是表演，而是幸存者的提醒；不是单纯呛声，而是从专制现实里带出来的警报。

郑丽文访美期间被呛，表面上是活动插曲，实际上是华人社会对中共认知的一次公开碰撞。

纽约和洛杉矶的声音共同说明：真正懂中共的人，绝对不会站在“相信中共”的那一边。



### Observations from Zheng Liwen's Los Angeles Forum

This article records the author's observations at Zheng Liwen's Los Angeles forum during her United States visit. It argues that the event highlighted tensions between advocates of engagement with Beijing and mainland Chinese dissidents who distru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ecause of personal experience.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audience questions were screened despite assurances of open discussion. During the forum, a protester questioned the Kuomintang's position toward democracy in China and was removed by organizers. Further confrontations reportedly involved physical restraint and police intervention. The essay also references protests in New York and Flushing, presenting them as evidence that many mainland Chinese activists reject political accommodation with Beijing.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controversy reflected broader divisions withi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over relations with Beijing and Taiwan, arguing that the protesters sought to warn audiences against placing confidence in official promises when democratic freedoms, political rights, and Taiwan's future security remain central concerns.

编辑：黄吉洲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从震惊到思考

—— 萨克拉门托 “中共百年暴行图片展” 引发民众关注

摄影记者：关永杰



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州议会大厦前的中共百年暴行图片展。拍摄：关永杰

2026年6月28日下午，由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中国民主党萨克拉门托支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联合举办的“铭记历史 拒绝遗忘——揭露中共百年暴行图片展”在美国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州议会大厦前（California State Capitol）举行。

图片展通过大量历史图片和中英双语文字资料，向美国社会介绍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近年来持续发生的人权问题，包括土地改革、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1989年六四事件，以及对宗教信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公民社会、新疆、香港等问题的持续打压，希望让更多美国民众了解中国真实的人权状况。

当天，不少经过州议会广场的美国民众和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驻足观看展板，并与现场义工进行了交流。

**在美留学生：很多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共曾经做过什**

么

活动期间，记者遇到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来到美国继续深造的留学生。他表示，自己过去已经了解过六四事件以及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对当天的图片展十分支持。

他说：“很多美国人其实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曾经做过什么，这样的图片展非常有意义，它能够告诉美国社会，在中共统治下，中国土地上曾经发生过多么可怕的事情。”他认为，历史如果长期被掩盖，就容易被遗忘，因此让更多美国民众了解这些历史，是十分重要的公共教育。

**一对大陆年轻夫妻：独立思考，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记者随后采访了一对来自中国大陆、目前定居加州的年轻夫妻（文中化名Thomas）。两人表示，他们整个学生时代都在中国大陆接受教育，但随着成长，他们逐渐开始主动寻找不同的信息来源，并学习独立思考。

Thomas告诉记者：“别人告诉我的事情，我不会马上相信，也不会马上否定。我会根据别人提供的线索，自己去查证、核实，再决定是否接受。”他说，在中国大陆，官方媒体虽然数量很多，但信息来源却高度单一。

“即使有一百家电视台都说同样的话，那也还是同一个声音。如果没有不同维度的信息，就很难真正判断真假。”

他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多元信息来源，人们便很难形成真正独立的判断能力。

**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谈到1989年民主运动时，Thomas表示，自己后来查阅了不少当年的历史资料，包括外国记者在北京街头采访学生的纪录片。

他说，六四之前，中国大学校园曾经拥有相当活跃的思想讨论空间，而1989年之后，这种公开讨论几乎消失。

记者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由于成长于广东沿海，1989年时能够直接收看香港电视，因此亲眼看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大量现场直播画面。

记者表示：“六四事件的发生使中共政权感到无比恐惧，一场学生运动曾令中共高层感受到严重的执政危机。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不断加强新闻封锁和思想控制，从媒体到学校教育，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再想出现1989年那样全国性的学生民主运动，几乎不可能了。”

Thomas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1989年或许是中

国距离民主政治最近的一次历史机会。

他还提到，若追溯更早，中国近代另一位最有机会推动民主宪政的人物，是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家宋教仁。

“如果宋教仁没有那么早遇刺，中国历史也许会完全不同。”

### 从洗脑中重新认识历史

谈到成长经历，这对夫妻坦言，他们和许多中国年轻人一样，也曾接受长期官方宣传。

Thomas说：“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这些历史，我们也是一步一步，从被灌输，到不断修正自己的认识。”

他说，真正促使他们改变的，并不是某一本书，而是不断接触不同的信息，再结合自己的观察，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判断。

他认为，一个人真正应该学习的，并不是简单接受另一套观点，而是培养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无论面对哪一种观点，都应该保留思考，而不是直接接受。”

记者表示，这一点与许多香港民主人士分享过的经验十分相似。一个人离开灌输式的答案教育之后，首先需要摆脱过去形成的思维惯性，而不是简单从一种意识形态走向另一种意识形态；真正重要的是建立独立思考能力和具有批判性思维。

### 精神上的自我封锁比防火墙更加可怕

交流过程中，Thomas特别谈到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强的信息管控。

他说，现在不仅翻墙越来越困难，许多跨境通讯和资讯获取渠道也不断受到限制。

他认为，比物理层面的“防火墙”更可怕的是思想上的封闭。

记者对此深有同感。记者表示，许多长期生活海外的华人，虽然身处民主国家，网络是互联互通的，却依然长期依赖中国大陆的信息平台获取资讯，在无形之中仍然受到单一信息环境影响。

Thomas也指出，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过滤往往不会明确通知用户，而是通过降低传播范围，让很多人误以为信息已经成功发布。

“很多时候，并不是你不能发，而是别人根本看不到。”

### 香港人的坚持令人敬佩

记者表示，经过多年接触香港民主活动，最大的感受就是香港社会长期形成的法治、公民教育和自由价值观，使很多香港人在面对压力时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从2014年雨伞运动到2019年反送中运动，香港社会展现出来的公民意识令他十分敬佩。

Thomas认为，这种精神值得所有关心中国未来的人学习。

### 希望更多年轻人加入

采访最后，现场工作人员向Thomas介绍了中国民

主党以及海外民主团体长期举办的各项活动，希望未来有更多年轻人参与公共事务。

Thomas表示，如果未来有机会，他会持续关注相关活动，并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把自己了解到的真实历史介绍给更多人。他说：“我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越来越好。真正的爱国，不是回避问题，而是希望国家能够面对问题、不断进步。”

当天的图片展持续近四个小时，不少路过的美国民众、中国大陆新移民以及来自不同族裔的游客驻足观看，并与现场工作人员交流讨论。活动取得的效果也回应了主办方的初衷：历史不应被遗忘，真相不能被掩盖。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历史，防止悲剧的再次发生。

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中国民主党党员及前来参与活动的民主人士合照。拍摄：关永杰

## From Shock to Reflection: Sacramento Exhibition Draws Public Attention

*This article reports on a public photo exhibition held outside the California State Capitol in Sacramento on June 28, 2026. Organized by overseas democracy organizations, the exhibition presented historical photographs and bilingual materials concerning major political campaigns,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restrictions on civil liberties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visitors included American residents, Chinese immigrants,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any of whom stopped to discuss historical memory,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access to divers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Interviews with participant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examining history critically rather than relying upon a single official narrative. The article also highlights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lasting impact of the 1989 Tiananmen movement, information controls, and the value of free inquiry. It concludes that the exhibition encouraged meaningful public dialogue while reflecting the organizers' goal of preserving historical awareness, promoting informed discussion, and preventing historical tragedies from being forgotten or repeated.*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与西藏等多族裔团体中领馆前集会

—— 拒绝百年奴役反对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作者：吕小静



2026年7月1日，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成员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举行集会

【旧金山讯】2026年7月1日上午，旧金山中国驻总领事馆前聚集了来自不同族裔和背景的数十位人士。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以及北加州西藏协会、旧金山地区西藏青年会、湾区西藏之友、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台湾）、中国国民党旧金山分部等多个团体共同举行和平集会，反对当天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保护、宗教自由及人权状况。

当天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的日子。集会现场悬挂着“拒绝百年奴役”“反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Free Tibet”“Free Hong Kong”等中英文横幅和标语，不同团体代表轮流发言。现场中英文口号此起彼伏，不少途经民众驻足聆听、了解活动内容，也有车辆鸣笛表示支持，使整个集会气氛庄重而坚定。

主办方表示，选择于7月1日举行此次集会，既是因为当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日，希望借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呼吁社会关注民族语言、文化、宗教自由及人权等议题，并持续关注相关群体所面临的处境。

随后，多位来自民主团体和不同族裔社区的代表依次发言，从历史、人权、民族文化及海外公民社会责任等多个角度表达看法。

当天的发言中，华语青年挺藏会会长Ginger围绕民族文化和语言保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她表示，真正的民族团结，不应建立在文化趋同或身份弱化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彼此尊重、平等交流和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

她在发言中提到，近期青海一所藏语职业高中被关闭，再次引起外界对民族语言教育的关注。她认为，语

言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身份认同，如果母语教育逐渐消失，民族文化也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

Ginger还介绍了青年倡议者张雅笛（Tara）的案例。她表示，张雅笛长期推动汉藏青年交流，并关注藏人使用母语接受教育的议题，希望通过对话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理解。在她看来，不同民族能够超越彼此成见、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本身就是民族团结的重要体现。

她说，真正稳定、长久的民族关系，应建立在尊重彼此文化、语言和历史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彼此对立之上。她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民族语言教育、文化传承及相关人权议题，也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跨越偏见，通过交流建立理解，让不同民族能够在平等与尊重中共同发展。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活动部部长、“一人一推关注良心犯”发起人之一郭志军表示，105年前的7月1日，邪恶的中共宣告成立，中国从此陷入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浩劫；29年前的7月1日，中共将魔爪伸向香港，东方之珠逐渐失去光明。今年7月1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生效，这不仅是對國內民眾的加重压制，更是將专制黑手伸向全球的无耻行径。

郭志军强调：“7月1日不仅是一个标致性的日子，更是我们对中共百年罪恶的审判之日！”他压制中共从反右到文革、三年大饥荒、天安门大屠杀等罪行，指出中共虽然拥有坦克、高墙与无孔不入的监控，卻最害怕真相、最害怕人民不再恐惧。

随后，民主人士郭鉴鑫围绕历史记忆、人权和法治发表讲话。他表示，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许多普通民众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政治运动、社会动荡和人权侵害，无论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无辜受害者，还是因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及维护基本权利而遭受打压的人，他们的经历都不应随着时间流逝而被遗忘。

郭鉴鑫认为，一个社会只有勇于面对历史、尊重历史，才能真正避免悲剧重演。他表示，任何公共权力都应受到法律和社会监督，人民依法享有的言论、信仰和基本人权应得到尊重与保障。面对历史带来的伤痛，不应以沉默代替反思，也不应让遗忘取代记忆。

他呼吁社会持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希望未来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尊重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尊严地生活、自由表达和平等参与社会发展。

中国民主党党员李小林指出，今天是中共建党105



周年、香港沦陷29周年，同时还是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的日子。中共在105年前建党的时候开始就是一个骗子，欺骗中国广大的无产阶级，推翻政府，建立民主中国。结果1949年中共建国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今天，不但中国人民始终一直都没有人权，没有自由，没有民主，而且破坏世界秩序，欺骗全世界。他表示今天在这自由的国度，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他们推出的非法之法，声援国内所有的政治犯，良心犯！最后他高喊：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所有的政治犯，良心犯！还我自由，还我民主！共产党下台！独裁必亡！

中国民主党党部Fremont党部主任刘静涛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形容中共是一个典型的邪教组织，就像太平天国失败于清，中共成立于民国，他们的成功使数以亿计的人的生命付出了代价，我们要提醒全世界要警惕共产党这个邪恶的组织，这个组织会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甚至是灾难。我们有责任传播真相，让全世界的人都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Fremont支部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吕小静表示，来到美国后，她更加深刻体会到自由表达的珍贵，也更加珍惜能够公开发表观点、参与公共讨论的机会。她认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引发了许多人对民族语言、文化、宗教和传统习俗未来发展的担忧。语言不仅承载着历史，更维系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任何文化都应获得应有的尊重与传承。

她呼吁海外华人善用X、YouTube、TikTok等网络平台，分享真实历史和不同声音，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历史、认识自由的价值。她表示，希望越来越多人能够勇敢发声，让历史不被遗忘，让真相持续传播，让更多人知道中共的独裁统治！

集会最后，与会者共同高喊“反对中共恶法”“反对独裁暴政”“我们要民主自由”“支持西藏”“光复香港”等口号。响亮的呼声回荡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前，也为当天活动画下句点。与会人士表示，只要仍有人坚持记录历史、传播真相、守护自由，追求民主与人权的努力便不会停止。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and Tibetan Groups Rally in San Francisco

This article reports a peaceful demonstration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San Francisco opposing China's Ethnic Unity Promotion Law and advocating human rights, religious freedom,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democratic valu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华语青年联谊会会长段荆棘 (Ginger 左一)



多个民主及多族裔团体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前集会现场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活动部部长郭志军



民主人士郭德鑫



中国民主党党员李小林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 Fremont 支部副部长吕小静



中国民主党 Fremont 党部主任刘静涛





# 郑丽文洛杉矶座谈会爆发争议

——《在野党》记者提问遭审查引发现场冲突

记者：林小龙 贾嘉  
摄影：韩震 张致君



图为在野党记者张致君向郑丽文展示《在野党》杂志

《在野党》杂志社洛杉矶讯

2026年6月14日上午，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美国洛杉矶蒙特利公园万豪酒店举行“美中台和平繁荣之旅”专题座谈会，向南加州侨界、学界及关心两岸关系人士发表演讲并接受现场提问。然而，原本被宣传为“任何问题都可以提问”的交流环节，却因提问环节受到严格筛选与审查，引发现场争议，并最终演变为肢体冲突事件。

据现场记者观察，座谈会开始前，会议工作人员要求所有提问者将问题事先提交，由主办方统一汇总、审核及筛选后，再由主持人代为提问。此举与郑丽文在演讲过程中多次强调的“欢迎大家自由提问，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形成明显反差，引发部分与会人士质疑。

《在野党》杂志社记者团当天以正式登记媒体身份进入会场采访。记者原计划就台湾民主制度、新闻自由、两岸关系、中国共产党人权纪录以及台湾国民党未来政策方向等问题向郑丽文进行公开提问，但相关问题未获进入提问环节。

记者团成员表示，他们希望就郑丽文提出的“放下屠刀”“不能让同胞杀同胞”等论述进行追问，并讨论1989年六四事件、香港反修例运动（反送中运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长期人权纪录等议题。然而，由于现场提问机制受到限制，上述问题均未获得公开讨论机会。

随着活动进入尾声，部分与会民主人士对提问筛选制度表达不满，并当场提出抗议。现场视频显示，抗议者与会场工作人员发生言语冲突，随后有人高喊“闭嘴吧你”“出去吧你”等言辞。其后，多名工作人员与现场人员将抗议者推离座位区域，现场一度出现推搡情况，相关过程被多家媒体及现场民众拍摄记录。

有参与抗议的人士表示，他们并非未经许可闯入会场，而是经过正常报名登记程序进入活动现场，因此认为自己有权依据主办方事先宣称的规则进行公开提问和

表达意见。

记者团指出，本次采访原本希望围绕“和平、公开、透明、平等对话”的原则展开交流，并向郑丽文当面了解其对于台湾未来发展、两岸关系以及民主价值的具体主张。然而，最终呈现出来的提问机制与现场处理方式，令部分与会者感到失望。

此外，记者团还向现场人士展示了《在野党》杂志第19期及第22期刊物，并准备就赵纪森《平等对话，还是错误研判》、孙诚《民国法统论》、关永杰《声援民主台湾，谴责国民党主席亲共卖台之旅》以及张致君《台湾：在大国阴影下的清醒时刻》等文章内容与郑丽文进行交流讨论，但未能获得相关机会。

活动结束后，现场争议仍持续在社交媒体发酵。支持者认为主办方有权维持会场秩序和控制活动流程；批评者则认为，既然活动以公开交流和民主讨论为名，就应当允许不同意见获得平等表达与提问机会，而非通过预先审查机制筛选问题。

截至发稿时，主办方尚未就提问审查制度以及现场冲突事件发表进一步说明。

《在野党》杂志社 洛杉矶报道  
2026年6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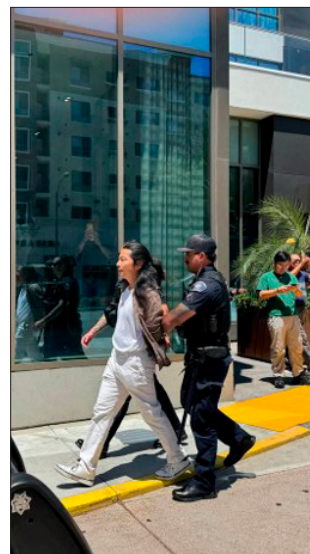
编辑：钟然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图为现场抗议人员被阻挠



图为在野党记者林小龙现场填写问题卡



图为现场人员被警察带走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封从德自由雕塑公园开讲

—— 畅谈“三民主义”，聚焦法统路径与宪政思辨

记者：张致君



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中）在现场发言

2026年7月5日，一场聚焦中国未来政治转型的学术座谈会在美国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举行。本次活动以《三民主义能否救中国》为题，邀请八九学运亲历者、文献学者、网络“孙文学校”创办人封从德博士担任主讲。多位海外异议学者、民运人士及年轻一代华人到场，围绕“三民主义”政治思想的当代启示、中国未来制度承接框架以及政治转型的潜在风险展开了深度研讨。

座谈会所在地自由雕塑公园，地处加州内陆荒漠，因长期展示“六四”、香港抗议及中国人权议题的大型地标性雕塑，已成为海外许多华人追求自由的精神坐标。

与以往聚焦于历史伤痛纪念的集会不同，本次座谈会在漫天黄沙与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装置间，呈现出一种冷峻的学术思辨氛围。

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表示，自由雕塑公园未来除了持续用雕塑这种艺术展现形式反抗暴政，也会逐渐搭建民主政治学术研讨会，讨论主题也不仅从历史清算与政治抗议等“解构性叙事”出发，同样会增加对宪法文本、过渡期合法性来源等“建构性制度设计”的理性探讨。

会议先对7月2日在联合国门前为抗议中共对藏人压迫而自焚的Pawo Lobga Rangzen悼念。

在主旨发言中，封从德首先表示该次研讨会的“救国”应当再“重建民国”之后，提出用“三民主义，四六宪法，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的政治行动第一步，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置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脉络中进行诠释。他认为，三民主义并非历史陈迹，而是应对现代政治危机的“现成制度框架”。对中国历史的充分认识，不被中共统战下的思想与谎言历史所污染至关重要，这会影影响未来中国政治反对派道路的判断力。

他在会中详细分析了中共在海外民主运动中的统战思想与语言叙事，解释了中共对反对运动中的词汇污染，例如他解释“和理非”中的“非暴力”是严重被曲解

的，“非暴力”并不代表放弃“武力革命”，但中共将“武力”与“暴力”的含义混淆，暴力是非法的，而武力是合法的，中共的统战叙事就是将反对派合法的叙事方式变成非法叙事方式，进一步引起反对派内部分裂。再例如他指出，反对派不要落入“统独叙事”，这也是中共分裂反对派的统战战略之一。

封从德尖锐地指出，后极权时代中国面临的重大危机，并非“如何打破旧体制”，而是“旧体制崩溃后的权力真空与社会失序”。他借用“普京化”一词，警告转型初期因制度设计缺陷导致强人政治复辟、民主形式化的危险。他在会中提到了中共的“沉船计划”，指出中共在全球所部署的经济、科技等战略部署不仅仅是在扩张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是在为其政权崩溃后的政权部署，中共将现有大量资金与技术资源外移后，得以保留中共的政治势力，再分裂中国，制造混乱，中共自己占据中国现在疆域板块中资源最富饶的沿海等枢纽区域。

“三民主义的精髓在于其整体性。民权保障自由，民生约束资本，民族确立认同。这套互为表里的架构，能有效对冲转型期极易出现的流氓无产阶级民粹主义或威权政客的窃国倒退。”封从德表示。

作为“民国宪政法统”的坚定捍卫者，封从德在会上多次提到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四六宪法”）。他主张，该宪法由当年全中国各党派共同制定，具备无可辩驳的历史正统性。在未来转型期，直接宣布“回归四六宪法”并将其作为临时宪法，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制宪成本，避免社会因“重新发明轮子”而陷入分裂。

然而，这一具有鲜明立场的“回归法统论”，在现场参与者内部随即引发了激烈的路线交锋。

支持法统派的人士在发言中主张“继承资产”，认为历史法统是成本最低、最能凝聚共识的平稳过渡工具。

新宪派与联邦派则对该路径的可操作性提出质疑。



与会者悼念藏人 Lobga Rangzen





封从德主讲并回答与会者提问

他们指出，“四六宪法”在政治现实、地缘政治及国际承认层面存在巨大的历史断层，面对当下错综复杂的两岸关系与地方治理，其过渡机制设计显得过于理想化，缺乏现实对接的抓手。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座谈会并未流于枯燥的历史复述，而是展现了强烈的时代感。在互动环节中，与会者就两岸体制差异、以及“三民主义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再解释”等前沿议题展开了思想激荡。

针对年轻人提出“如何将三民主义推广和三民主义在现代国际关系与中台局势中是否还有受众”这一隐忧，封从德给予了积极回应。他赞同并鼓励年轻一代打破意识形态框架，从历史文献中汲取关于“三民主义”运用的智慧，用现代政治经济学语言向年轻世代重新阐释。

座谈会持续了近三个小时，在落日余晖洒满大漠时落下帷幕。

正如与会研究者所言，这场在沙漠中展开的政治辩论，其意义或许不在于立即拿出一套完美的建国方案，而在于它在威权政治的阴影之外，保留了一处探讨中国未来可能性的“理论绿洲”。尽管“三民主义救中国”的法统路径在现实政治层面仍面临诸多难以逾越的鸿沟，但此类社群内部共识的建构与思想火花的碰撞，正为未来的宪政转型做着知识上的防震准备。

主办方透露，未来自由雕塑公园将继续推出围绕“中国政治”的系列深度研讨活动，将这一思考持续引向深入。

编辑：李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摄影：刘敬



## Congde Feng Discusses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t Liberty Sculpture Park

This article reports on a symposium held on July 5, 2026, at Liberty Sculpture Park in California, where scholar and former 1989 student movement participant Congde Feng delivered a lecture entitled "Can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Save China?" The event brought together overseas scholars, democracy advocates, and younger Chinese participants to discuss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possibl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for China's future.

The article notes that Liberty Sculpture Park has become a symbolic site for commemorating the 1989 Tiananmen movement, Hong Kong's democracy movement, and broader human rights concerns. Organizers stated that the park will expand from historical remembrance into academic discussions on constitutionalism,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Participants also observed a moment of silence for Tibetan activist Lobga Rangzen, who died following a self-immolation protest.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Feng argued that rebuilding a constitutional republic should begin with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nd the 1946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maintained that the principles of nationalism, democrac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remain relevant because they provide an existing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rather than requiring an entirely new political model. Feng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history independently and avoiding narratives shaped by political propaganda.

A major theme concerned the risks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Feng warned that the greatest danger 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would be institutional disorder,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or renewed authoritarian rule. He therefore advocated using the 1946 Constitution as a transitional legal foundation.

The proposal generated lively discussion. Some participants supported constitutional continuity as the most practical approach, while others questioned whether historical 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could adequately address present political realitie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although no consensus emerged, the symposium demonstrated the continuing importance of constitutional reflection, institutional planning, and open debate concerning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It showed that disagreement over constitutional legitimacy can coexist with respectful debate about democratic transition. Rather than offering a final blueprint, the meeting encouraged continued research, historical inquiry, civic dialogue, and institutional imagination among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seeking peaceful co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years ahead through cooperat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旧金山中领馆前举行悼念洛嘎让赞集会

—— 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

记者：吕小静



【旧金山讯】流亡藏人洛嘎让赞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附近自焚身亡后，引发海外社会持续关注。7月5日下午，数十位民主人士、藏人及关心西藏议题的民众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举行和平集会，悼念洛嘎让赞，并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抗议。

7月2号，流亡藏人洛嘎让赞（Logarangzen）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附近以自焚方式表达诉求，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据其生前公开发表的遗言及支持者介绍，他希望借此唤起国际社会关注西藏人民的处境，并以最惨烈的方式向恶法发出无声的抗议。

流亡藏人媒体《西藏之声》表示，逝者事发前架设手机，通过社交平台直播整个过程，目前已确认其伤重身亡。逝者留下的信息显示，自焚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抗议中共7月1日正式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坚持其支持西藏独立的政治立场。媒体分析指出，逝者名字中的“Rangzen”在藏语中意为“独立”，所以大概也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态度。

洛嘎让赞在行动前通过社交媒体留下遗言，呼吁海外藏人继续守护民族文化、语言和信仰，希望世界不要忽视西藏人民所面临的现实处境。他选择联合国总部前作为行动地点，希望借助这一国际平台，让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关注西藏问题。



现场视频显示，他高举西藏旗帜后点燃自己，直至倒下。这一事件迅速引发海外藏人社区及多个民主、人权团体的关注。

统计显示，2009年至2022年间共有超过150名藏人自焚，其中10起发生于流亡海外的藏人社群。国际人权团体及流亡藏人长期以来批评中共在西藏地区实施高压统治。

洛嘎让赞离世后，纽约、旧金山以及洛杉矶等多个大城市中共领馆前，相继举行悼念活动。7月5日下午，由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党员陈森峰等人发起的“悼念洛嘎让赞暨抗议《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平集会”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举行。来自民主团体、藏人社区及关心西藏议题的民众参加集会，通过默哀、发言等方式表达哀思，并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西藏的人权、宗教自由、民族文化及语言传承等诉求。

全体人员低头默哀，悼念洛嘎让赞，现场气氛庄严肃穆

下午两点左右，集会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开始。现场悬挂着“悼念洛嘎让赞”“反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横幅，参加者手持西藏雪山狮子旗及洛嘎让赞遗像，全体人员首先低头默哀，悼念洛嘎让赞及所有因追求自由而逝去的人士。现场气氛沉重，不少参加者表示，希望通过和平集会，让更多人了解西藏人民所面临的现实处境。



作为此次活动策划发起人之一，陈森峰表示，当看到洛嘎让赞在联合国总部前自焚的视频后深受震动，因此发起此次悼念活动。他表示，举办集会并非鼓励任何形式的自我牺牲，而是希望借此让世界听见藏人的声音，关注西藏人民在人权、宗教、文化及民族语言传承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并持续抗议《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





中国民主党党员李凯表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引发外界对西藏语言、文化、宗教及民族认同等议题的持续关注。他指出，多年来一百多位藏人先后以自焚表达诉求，这些事件背后所反映的人权问题值得国际社会认真关注，并呼吁各国政府及人权机构持续关注西藏现状，共同维护人的基本尊严与自由。

中国民主党党员高应芬与丈夫胡帅表示，今天站在这里，不仅是悼念我们的藏族同胞，更是对中共独裁的抗议！洛嘎让赞前辈，他用他生命在抗议！我们不提倡牺牲，因为活着才有更多机会为我们的民主自由努力奋斗，但他勇敢坚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继续努力，早日实现民主自由！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活动部部长郭志军表示，洛嘎让赞选择以最惨烈的方式向世界发声，反映藏人在长期高压统治下的绝望处境。他说，当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文化与基本自由被一步步剥夺，当所有和平表达意见的管道都遭封锁，有些人最终只能用生命唤醒世界。

中国民主党党员王永胜提议，默哀三秒以纪念西藏自焚烈士。民族团结促进法的实质是大一统，大一统的危害是加强集权，压制自由思想和创造力，民间社会失去活力公民没有人权。我们每一位发声者都应该是刺向暴政的一把利剑，戳破中共的谎言，像荆轲刺秦一样，推翻暴政，反对恶法。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Fremont支部副部长、文宣部副部长吕小静表示，当看到洛嘎让赞在烈火中仍高举西藏旗帜直至倒下的视频时，内心久久无法平静。她说，没有人会轻易选择以生命表达自己的诉求，这样的悲剧本身就是对世界的一次沉重提醒。悼念洛嘎让赞，不是为了歌颂死亡，而是希望更多人关注人权、自由、文化遗产和宗教信仰，让每一个民族都能够在和平、尊严与自由中延续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信仰，让未来不再有人需要以生命作为最后的呼喊。

活动中，周云龙、范国林、李树青、郭鉴鑫、蒋书清、罗艳丽等人士也先后发言，共同表达对洛嘎让赞的悼念，并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西藏人民的人权处境。

主办方表示，许多流亡海外几十年的藏人，头发已

经花白，但他们对故土的思念、对自由的追求、对信仰的坚守，从未改变。并不赞同以自焚结束生命的抗争方式，但尊重每一个为自己的民族、信仰和尊严发出声音的人。愿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西藏的人权与自由。愿逝者安息，愿西藏早日迎来自由与和平。

集会结束前，现场参与者高呼多项口号，包括“自由万岁”“反对同化”“反对民族促进法”等，来表达他们的立场和诉求。参与者希望联合海外的华人和各个群体的力量，团结起来，传播真相，为他们发声，共同守护人的尊严、自由与和平。

参加本次活动的民运人士名单：方政、刘静涛、李树青、陈森峰、高应芬、吕小静、李凯、罗艳丽、关永杰、范国林、郭鉴鑫、周云龙、郭志军、刘忱忱、蒋书清、胡帅、李小林、张善诚、吴志创、熊朝凤（排名不分先后）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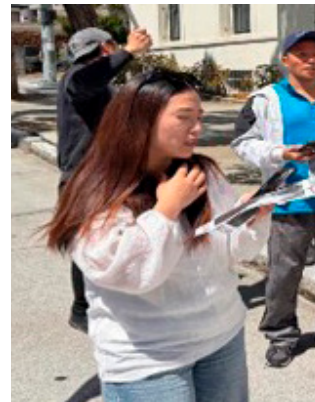
中国民主党党员高应芬与丈夫胡帅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活动部部长郭志军



中国民主党党员王永胜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 Fremont 支部副部长吕小静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太平洋的风，吹不散对刘晓波的思念

作者：沈美花



2026年7月12日下午，我来到美国加州圣莫尼卡海滩，参加刘晓波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活动。

当天圣莫尼卡海滩没有阳光。天空低沉，云层笼罩着太平洋，海风带着凉意一阵阵吹来。远处的海浪不断涌向岸边，又缓缓退去。这样的天气，仿佛也在诉说着一种无法散去的哀伤。

这里原本是一个充满欢笑和游客的地方，而我们却怀着沉重而肃穆的心情聚集在海边，共同纪念一位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与人权付出一生，并最终失去自由和生命的人——刘晓波先生。

活动现场摆放着刘晓波先生的大幅照片，鲜花静静地放在他的遗像前。参加活动的人们身穿深色衣服，手持写有“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和“Always in Our Hearts, Never Forgotten”的纪念横幅。站在人群中，看着刘晓波先生的照片，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活动中，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朱虞夫老先生发表讲话。他在追忆刘晓波先生的同时，也讲述了自己过去与刘晓波先生的妻子刘霞见面的一些往事。通过朱虞夫先生的亲身回忆，我们仿佛从另一个角度走近了刘晓波和刘霞，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在漫长岁月中所经历的苦难与坚持。接着，多位民主人士和活动参与者陆续发言，从不同角度追忆刘晓波先生，表达对他的怀念与敬意，也表达了对中国自由、民主和人权事业的关注。对我而言，这些来自亲历者的讲述，让刘晓波不再只是历史中的一个名字，而成为一个更加真实、有血有肉的人。

随后，活动进入诗歌朗诵环节。由主持人张致君和郑伟朗诵，现场参加者共同以诗歌寄托对刘晓波先生的

哀思。海浪不断拍打着岸边，朗诵声伴随着太平洋的海风回荡在圣莫尼卡海滩。

在当天的诗歌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诗人蔡楚先生的《七月诗——怀念》：

七月诗——怀念  
蔡楚

怀念一棵老树根  
扎进大地叶  
撑开乌云  
即使被雷霆劈断  
仍然挺立  
怀念一个人  
用骨灰书写爱情  
在海上把忧伤  
化作阴间的地址  
怀念一个灵魂  
没有远去  
海浪一样向你扑来  
礁石一样站成宪章  
怀念，年年抽出新绿  
直到怀念长成树前  
我不会忘记  
把种子留给人间

当这首诗在海边响起时，我的内心深受触动。尤其是“礁石一样站成宪章”和“把种子留给人间”，让我想到刘晓波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但他对自由、民主与人权的追求，并没有随着生命的结束而消失。他留下的思想和



精神，就像一颗种子，被后来的人记住，也被一代又一代追求自由的人继续传递。

诗歌朗诵结束后，现场响起了那首朴树的《送别》。大家怀着对刘晓波先生的深切怀念，一同唱起这首熟悉的歌曲。没有华丽的表达，也没有喧闹的声音，只有简单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在太平洋的海风与海浪声中缓缓回荡。那一刻，《送别》的歌声仿佛不仅是在送别一位已经离开九年的故人，也是在表达我们对刘晓波先生无尽的思念与敬意。歌声中有不舍，有悲伤，也有一种跨越岁月的怀念。

随后，大家怀着肃穆的心情依次向刘晓波先生的遗像献花。鲜花摆放在海滩上，身后是辽阔的太平洋。那一刻，我更加理解了这场纪念活动的意义：我们纪念刘晓波，不仅是为了怀念一个已经离去的人，更是为了记住他曾经坚持的理想，以及他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来到美国以后，我参加了越来越多与中国民主、人权有关的活动。也开始了解许多过去在中国无法公开了解的历史和人物。刘晓波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因为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追求和平的政治改革而失去自由，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

我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因为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而被关进监狱；一个国家也不应该依靠封锁、审查和镇压来维持统治。真正健康的社会，应当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应当尊重每个人表达思想和追求自由的基本权利。

刘晓波先生曾经离自由那么远，而今天，我们却可以站在自由的土地上公开纪念他。这更让我明白，自由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正因为有人曾经为自由付出代价，后来的人才更应该珍惜自由、捍卫自由。

九年过去了，刘晓波先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但他的名字并没有被遗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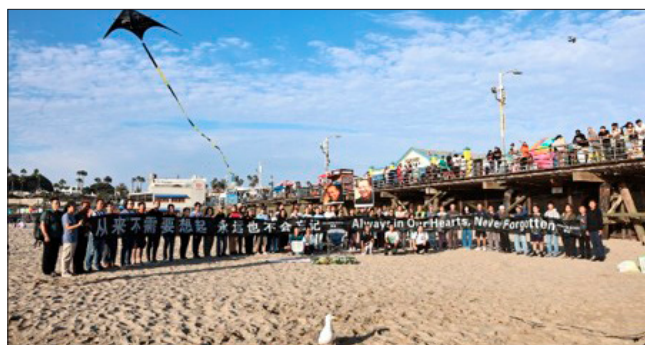
从来不需要想起，因为永远也不会忘记。

太平洋的风依然吹着，海浪依然拍打着岸边。活动结束后，人们渐渐散去，但我相信，只要还有人愿意记住刘晓波，愿意讲述他的故事，愿意继续追求自由、民主与人权，他所坚持的精神就不会消失。

刘晓波先生，愿您安息。  
我们不会忘记您

编辑：钟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刘晓波九周年：时间长河中擦亮自由灯塔

作者：卢超

在人类追求自由民主的漫长光谱中，2010年奥斯卡那把空着的蓝色椅子，成为了一个定格的历史符号。它不仅凝聚了刘晓波个人的苦难与荣耀，更像是一面巨大的棱镜，将中国本土的民主抗争折射到了全球的聚光灯下。转眼间，历史的指针已走到了刘晓波先生逝世九周年。年复一年，海内外在不同角落点燃的烛光，不仅是在追思一位先行者的献身，更是在拉长的时间线里，重新审视并擦亮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尤其是他如何将中国的命运，真正编织进全球自由与人权的共同体之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本土的维权抗争常被孤立地视为一国内部的“异见”表达。然而，刘晓波的实践与最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彻底打破了这种地域性的局限。他用自己的文字和肉身向世界证明：中国普通公民对基本人权的争取，绝非西方价值的简单移植，而是人类普世价值在东亚大陆上最自然、最顽强的生长。这一遗产确立了一个清晰的逻辑——中国的人权状况，从来都不是“内政”，而是关乎全球自由指数与和平秩序的晴雨表。

在这样的脉络下，海外民运及各界力量每年坚持不懈地举办纪念活动，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仪式性怀念。

首先，这种年复一年的坚守，是在对抗极权体制最擅长的“历史遗忘症”。垄断权力的统治者总是试图通过封锁信息与抹除记忆，让一代代人陷入历史的虚无。海外的持续纪念，就像是在坚硬的高墙上凿开的一道道透光孔。它通过文字、集会 and 跨世代的对话，将刘晓波的思想、他的《零八宪章》、以及他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的坚守，转化为一种活着的、可传递的共同记忆。这种记忆的留存，为海内外所有拒绝犬儒、心存自由的人，提供了一个精神的锚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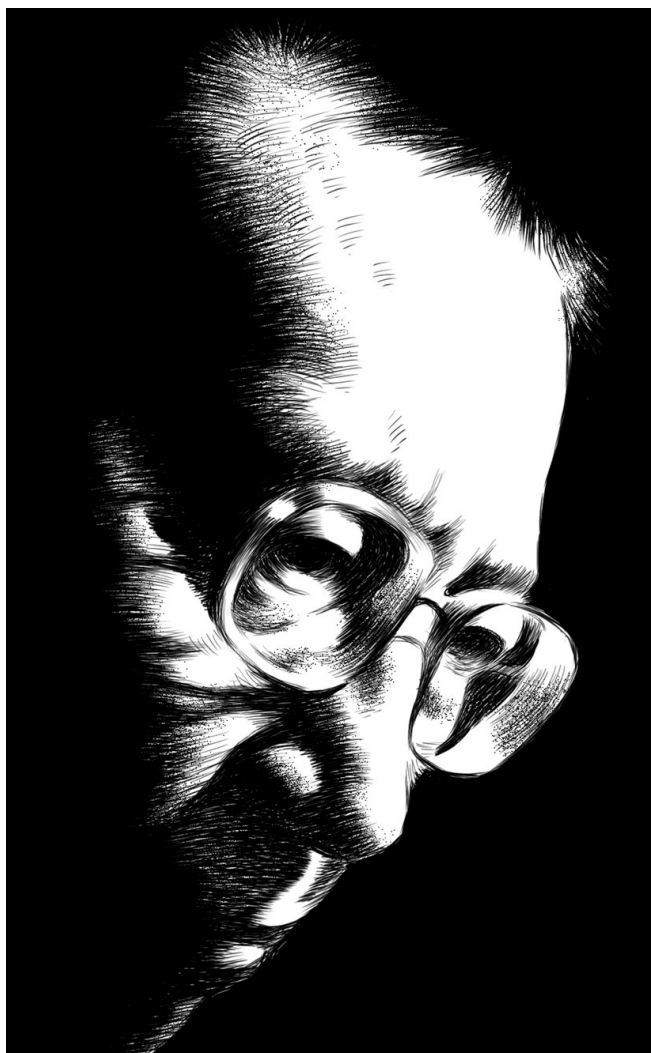
其次，每年的纪念活动是海外民主力量凝聚共识、连接全球自由阵营的重要枢纽。在今天世界正经历民主退潮与数字极权崛起的双重挑战下，海外民运的纪念不再是孤立的抱团取暖，而是演变成了一个与全球公民社会、各国政要及人权组织深度对接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中国的民主抗争得以融入当下全球抵抗威权主义蔓延的巨浪中，向世界清晰地传递一个信号：中国的民主化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等待外部救援的“特例”，而是全球自由阵营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从刘晓波的遗产出发，这种内外共振的全球视野，也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人权外交”的内涵。过去，国际社会对华的人权关切，往往依附于经贸谈判或地缘政治的博弈。而刘晓波留给世界的启示在于，人权必须是外交

的核心原则本身。每年的纪念，正是向国际社会公开重申这一原则的契机。我们要促使国际社会明白，在一个互联互通的时代，对一个庞大帝国人权退步的绥靖，终将反噬全球的民主根基。

刘晓波在《我没有敌人》中展现的那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悲悯与宽容，在今天依然有其现实的操作性。他让高墙内的抗争者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也让高墙外的世界无法闭目塞听。在九周年的今天，世界格局在变，抗争的手段在变，但刘晓波当年用生命撑起的那个国际维度依然坚固。那把空椅子不应该只是历史的遗憾，它更是一个持久的召唤，提醒着后来者：自由的浪潮，终需四海交汇，方能奔流不息。

编辑：周志刚 校对：程筱筱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图片引自 - 维基百科

# 北加州多团体抗议中共“民族团结法”

— 数个藏人与人权组织赴旧金山中领馆集会，指新法扩大跨国镇压

摄影记者：关永杰



2026年7月1日，中国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当天，北加州藏人协会（TANC）、旧金山湾区西藏青年会（SFRTYC）、湾区西藏之友（BAFoT）以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湾区支部（SFT Bay Area）联合发起抗议活动，华语青年挺藏会、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法轮功学员等多个团体参与，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前举行集会。

该活动的主旨是为了抗议中国于7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法律，多个参与团体表示，该法律将威胁少数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宗教自由、家庭联系，并在海外华人及藏人社群中造成“跨国镇压”和恐吓风险。

该法的法律条文规定要“构建共有精神家园”，在全国范围内深化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外界普遍担忧该条款将进一步加速西藏、新疆及内蒙古地区的强迫汉化政策，特别是通过国家寄宿学校体制，限制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导致本民族语言事实上在公共和教学领域消亡。

该法第六十三条明文指出，将依法追究“境外组织和个人”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该条款具备明显的域外管辖权（长臂管辖）特征。主办方认为，这就意味着即使不是中国公民，或者身处中国境外（如在美国、台湾、欧洲），只要公开发表批判中国民族政策、支持西藏独立/自治、或挺台/挺港言论，在法理上都会被中共认定为“触犯该法”。

主办方指出，该法是威权主义利用法律工具对主权国家境内的公民进行“跨国镇压”和跨境噤声的手段，自此，海外流亡社群、外国学者及港台人士将面临最大的法理威胁。该法的实施，各国政府都应该高度重视。

集会期间，来自藏人、香港人、中国民主运动团体及其他人权组织的代表先后以藏语、英语、汉语等发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西藏、新疆、香港等地的人权状况。现场民众不断高呼口号，表达对新法实施的反对。当天集会持续两个多小时，现场除了演讲外，还有藏语诵读、集体呼喊口号及抗议横幅展示，不时有途经车辆鸣笛回应。

7月1日，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香港“回归”中国29周年，据主办方介绍，在这天，全球各地（包括旧金山、纽约、悉尼、伦敦等地）的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香港人、海外反共反独裁团体及其他人权组织也相继在当地的使领馆前发起大规模抗议。

编辑：钟然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 缅怀刘晓波，捍卫自由

——旧金山民主人士纪念刘晓波逝世九周年

作者：吕小静



【旧金山讯】海风轻拂，潮起潮落。2026年7月12日下午，旧金山湾区San Leandro Marina Park海边，没有喧闹的锣鼓，没有激昂的音乐，只有一束束洁白的鲜花，以及一群静静伫立的人们。来自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中国民主党Fremont支部及湾区各界民主人士相聚于此，以默哀、献花、诗歌朗诵和主题发言等方式，深切缅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著名作家、人权活动家刘晓波先生逝世九周年。

九年前，中共不仅让刘晓波在囚禁与严密监控中走完生命最后一程，更将他的骨灰撒向大海。没有墓碑，没有墓园，没有可以凭吊的坐标。这一决定，至今仍被许多人视为试图抹去历史记忆的象征。

然而，九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来到海边。因为，他们相信，记忆不会因海浪而消散，良知不会因岁月而沉默。



活动开始，全体人员肃立，为刘晓波默哀一分钟。随后，与会者依次向象征刘晓波先生的“空椅子”敬献鲜花，现场朗诵了吴祚来、李英强、邹幸彤等人

为刘晓波创作的纪念诗，以及刘晓波狱中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节选。

“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

一句句文字，在海风中缓缓响起，也让现场陷入长久的沉默。

主持人刘静涛和高应芬在开场中表示，在中国大陆，公开纪念刘晓波长期受到打压，不少公民仅因海祭、献花或发表悼念文字，就遭到拘留、判刑、约谈或长期监控。从广东江门海祭案，到近年来多起因悼念刘晓波而遭打压的事件，都提醒世人：在中国，记住一位追求自由的人，有时本身就需要勇气。然



而，也正因为有人拒绝遗忘，坚持见证，刘晓波追求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的精神，才能不断传承、生生不息。

作为活动主讲嘉宾，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主席、六四幸存者方政首先发言。他深情回忆，刘晓波不仅是自己的老师，更是无数民主人士共同的精神导师。从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到《零八宪章》，再到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始终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即使身陷囹圄，也从未放弃对自由与良知的追求。



方政特别回顾了1989年6月4日凌晨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他表示，当时刘晓波与侯德健为避免更多学生流血牺牲，主动与戒严部队展开谈判，最终促成大批学生和撤离天安门广场。然而，这位尽最大努力保护生命的人，却因此付出了漫长牢狱的代价，最终未能活着走出监狱。

针对外界长期存在的有关“刘晓波没有看到六四屠杀”的争议，方政也作出回应。他表示，刘晓波当时所说的是自己在撤离天安门广场过程中，没有亲眼看到学生遭到屠杀，这是基于当时所处位置的真实经历，并不意味着六四没有发生血腥镇压，更不应被中共断章取义，用来否定历史事实。

方政回忆，自己离开广场不到两个小时，便在西长安街亲眼目睹坦克碾压学生和市民，并因此失去双腿。他认为，每一位历史亲历者看到的都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刘晓波后来也曾对此进行反思。令他最为感动的是，当刘晓波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说出的第一句话是：“这个奖献给所有六四亡灵。”在方政看来，这不仅体现了刘晓波对历史的铭记，更彰显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真相、良知和逝者的敬意。

方政表示，中共不仅让刘晓波失去了生命，更试图抹去人们对他的记忆。他指出，当局将刘晓波的骨灰撒入大海，并非只是处理遗体，而是试图消灭一个可以让后人凭吊的坐标——没有墓碑，就没有祭奠；没有墓园，就没有聚集；没有实体，就难以形成持续的公共记忆。然而，他坚定地说：“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刘晓波。”一句朴实的话，道出了无数民主人士共同的心声，也成为当天纪念活动中最令人动容的一句话。

民主党党员李树青在发言中几度哽咽失声，现场气氛凝重

相比激昂的口号，更令人难忘的是现场流露出的真情。在发言环节，民



主党党员李树青谈到刘晓波为了自由、人权和民主，被中共关押十一年，最终未能活着走出监狱时，声音突然哽咽，几度停顿，久久无法继续发言。站在身旁的主持人刘静涛轻轻拍着他的肩膀安慰，现场顿时陷入一片寂静，不少与会者默默低下头，眼眶湿润。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刻意渲染，这一刻，人们用沉默表达着对一位良知者最深切的怀念。

随后，多位民主人士围绕刘晓波留下的精神遗产，从不同角度分享了自己的思考。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河南工委主任蔡晓丽表示，九年前的今天，刘晓波最终在囚禁与监控中病逝，成为中国民主与人权事业无法抹去的伤痛。她指出，暴政或许能够夺走一个人的生命，却无法扼杀刘晓波亲手播下的自由种子，更无法熄灭人们对民主、自由与人权的追求。她同时呼吁社会持续关注仍遭打压的维权人士和青年学生，认为在独裁统治之下，许多年轻人的理想、正义与未来正不断遭受摧残，而纪念刘晓波，就是为了让生者更加勇敢，让追求自由的信念薪火相传。



民主党党员李小林则表示，纪念刘晓波不仅是缅怀一位知识分子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他留给中国社会的精神财富。他认为，刘晓波长期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倡导自由、人权、法治与宪政，这些理念至今仍不断启发后来者。面对现实，人们或许会思考和平道路还有多大的实践空间，但无论答案如何，坚持独立思考，不放弃对公正社会的追求，本身就是纪念刘晓波最好的方式。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活动部部长郭志军表示，刘晓波留下的不仅是一座诺贝尔和平奖，更是一种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精神力量。他指出，刘晓波提出“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不是软弱，而是在长期迫害中依然坚守人性与宽容的勇气。随后，郭志军现场朗诵了《我没有敌人》节选，再次唤起人们对言论自由、公民责任和法治精神的思考。



民主党党员郭鉴鑫表示，刘晓波是一位始终坚持和平、倡导人权、法治和政治改革的民主人士，却因此遭受长期关押，最终未能活着走出监狱。他认为，刘晓波的离世不仅是一位民主先行者的悲剧，更折射出中国人权与法治面临的严峻现实。他呼吁更多人继续为民主、自由与法治努力，并要求中共释放所有仍

被关押的良心犯和政治犯。



强大的国家，不仅体现在经济繁荣和科技发展，更在于是否尊重人权、保障法治、允许人民自由表达不同意见。沉默无法掩盖真相，遗忘无法改写历史，恐惧终将无法战胜良知。

来自北加州雷丁（Redding）的中国民主党党员袁霞，为了参加当天的纪念活动，独自驱车三个半小时来到旧金山。她说，一路上心情十分沉重，因为今天来到这里，不只是缅怀一位逝去九年的民主先行者，更是在守护一种永不熄灭的精神。她认为，刘晓波一生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是建立在经济和科技之上，而是建立在尊重人的尊严、公民权利和平等法治的基础之上。她表示，今天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守护，希望刘晓波追求自由、人权与法治的精神能够继续传承。



活动最后，全体与会者再次来到海边，献上鲜花，凝望着浩瀚的太平洋。有人默默低头祈祷，也有人久久望着远方，不愿离去。

九年前，中共把刘晓波的骨灰撒向大海，希望从此没有墓碑，没有坐标，没有一个能够让人聚集悼念的地方。然而，九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来到海边，因为他们纪念的不仅是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更是一位始终坚持自由、人权、法治和良知的思想者。

海浪可以冲散花瓣，却冲不散记忆；风可以吹远骨灰，却吹不灭一个民族对自由与尊严的向往。

正如方政先生所说：“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刘晓波。”

刘晓波虽然离开了，但他的名字仍回响在海风之中，他留下的思想、勇气与信念，也将继续激励后来者，在追求自由、人权、法治与民主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与会人士依次向象征刘晓波先生的“空椅子”前献花致敬

参加本次活动的民运人士名单：方政，刘静涛，李树青，高应芬，吕小静，李凯，关永杰，郭鉴鑫，周云龙，郭志军，刘忱忱，蒋书清，胡帅，胡丽莉，李小林，张善诚，吴志创，熊朝凤，袁强，张鹏展，康嘉铭，黄晓敏，卢占强，蔡晓丽，袁霞，陈所明，王凡，李晓艳，姚荣涛，周晓俊，钟然（排名不分先后）



# 从英雄到公民

——公民抵抗协会与中国民主运动的新探索

作者：《在野党》杂志社副主编 陆乾坤



三十七年前，北京的枪声划开了一个时代。

那一年，许多中国人第一次公开谈论民主、自由、法治与宪政，也有无数青年、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为自己相信的未来走上街头。

当枪声响起之后，中国民主运动进入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从天安门广场到民主墙，从地下维权到海外民运，从互联网公共空间到白纸运动，一代又一代人为争取自由付出了沉重代价。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会记住许多名字：王炳章、刘晓波、高智晟、秦永敏、郭飞雄……他们用青春、自由乃至生命证明了一件事：中国人从未停止追求民主。

这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英雄时代。

英雄之所以令人敬佩，在于他们敢于在黑暗中站出来。然而，一个现代民主社会不能永远依靠英雄。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是少数人的壮举，而是无数普通公民共同承担公共责任。英雄可以唤醒时代，却不能代替制度；英雄能够点燃火焰，却不能独自守护火焰。

当一代代民主人士相继入狱、流亡或离世之后，中国民主运动也开始面对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除了反抗，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建设民主？

这是今天越来越多民主运动参与者共同思考的问题。

过去几十年，海外民主运动取得了许多令人尊敬的



成就，也留下了值得反思的经验。许多组织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不少团体因为理念分歧、组织松散、制度不健全而难以持续发展。民主当然需要激情，但激情终究会消退；真正能够支撑一项公共事业长久发展的，是规则、信任、合作与责任。

近年来，一批年轻一代民主人士开始把目光从“如何反抗专制”逐渐转向“如何建设民主”。他们关注的不仅是政治目标，也关注组织治理、公民教育、民主程序、公共伦理以及非暴力抵抗等长期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公民抵抗协会（Citizen Resistance）的成立，代表着一种值得关注的新尝试。

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组织相比，公民抵抗协会更加重视公民能力的培养。协会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公共生活方式。它强调非暴力、公民参与、制度建设、组织治理以及民主文化，希望通过持续的学习、讨论与实践，培养具有公共精神和责任意识的现代公民。这种理念，与世界许多民主国家长期发展的经验有着相通之处。

纵观近代民主化历程，无论是印度的独立运动、美国的民权运动，还是东欧国家摆脱极权统治，都说明一个共同的事实：一个社会能够实现民主转型，固然需要勇敢的人站出来，更需要成熟的公民社会作为支撑。民主不是一夜之间诞生的，它往往是在无数次公开讨论、彼此合作、尊重程序和承担责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也正因为如此，公民抵抗协会把组织建设放在重要



位置。协会尝试建立相对完善的治理机制，通过公开讨论、民主决策、监督与分工，让民主原则首先体现在组织内部。这样的努力，也许并不轰轰烈烈，却触及了中国民主运动长期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如果一个组织不能在内部实践民主，又如何让外界相信民主制度本身值得信赖？

这也是近年来海外民运越来越重视的一项课题。

长期以来，人们谈论民主，更多是在讨论未来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而今天，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民主首先是一种能力，一种习惯，一种公共文化。如果缺乏规则意识、合作精神和程序观念，即使有一天拥有了选举，也未必能够建立一个稳定、健康的民主社会。

换句话说，民主并不是推翻专制以后才开始学习，而是应该从今天开始练习。

正因为如此，公民抵抗协会除了关注中国现实，也持续举办关于公民教育、非暴力抵抗、议事规则、组织治理等议题的公开活动，希望通过知识传播和经验交流，为未来积累更多社会资本。这些工作或许不像街头抗议那样引人注目，却关系着民主运动能否真正走向成熟。

近年来，从白纸运动到越来越多青年人关注公共事务，人们已经看到，中国社会并不缺乏追求自由的愿望。真正缺少的，往往是彼此之间的信任，是长期合作的经验，是面对分歧时依然能够坐下来讨论的能力。这些能力，不会在一夜之间形成，而需要不断学习、实践和积累。

任何新的组织，都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公民抵抗协会未来能够走多远，仍有待观察。但它提出的问题，却值得整个中国民主运动认真思考：民主是否只是一个

政治口号，还是一种能够落实到组织治理、公共生活和人与人关系中的实践？

三十多年前，中国民主运动最大的资源是勇气；今天，中国民主运动更需要信任。没有信任，就无法形成合作；没有合作，就难以建立组织；没有组织，就无法形成持续的公民力量。真正改变一个国家的，从来不是某一个英雄，而是千千万万愿意共同承担责任、共同遵守规则、共同建设制度的普通公民。

回望过去，我们应当铭记那些在黑暗中挺身而出的先行者；展望未来，我们同样需要培养能够建设民主社会的新一代公民。前者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敢于反抗专制，后者则决定中国人在未来是否能够建设一个自由、法治而有尊严的国家。

历史已经证明，推倒一堵高墙并不容易；而在废墟之上建立一座能够长久屹立的房子，则更加艰难。

公民抵抗协会仍然年轻，但它所尝试回答的问题，已经超越了一个组织本身。它提醒我们，中国民主运动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强调个人英雄的时代，逐渐迈向强调公民参与、制度建设和公共责任的时代。

英雄照亮了道路，而真正能够把道路走下去的，终究是无数普通公民。

也许，这正是中国民主运动下一段征程最值得期待的方向。

请联系关注

<https://citizenresistance.org/>

X: @gmdkxh

YOUTUBE: @CivilResistanceAssociation

美编：胡海宁





# 《政治与民主》

## 第四章专制政体的特征（第五期）

作者：祝正明

### 一、专制政体的形成

翻开人类的整个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人类之间的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史。每个人都有想为所欲为、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欲望，在人类社会进化的各个阶段，就像在自然界的其它动物群体一样，一直存在着弱肉强食现象，其惨烈不亚于任何物种间的生存竞争。

原始部落内个体体力的较量，产生了部落首领。部落之间的实力竞争，产生了地方领主。领主之间的武装冲突，产生了国王。国王之间征战的结果，产生了皇帝。最终，一个控制地域广泛的国体成立。皇帝统领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将国家划割成若干区域，再分别册封给信得过的大臣和皇室贵族们去镇守；这些大臣皇族再将自己的辖区划分成更小的领地，册封给更小的自己的臣属去统领；官僚依次衍生，权力依次分散，直至将统治势力延伸到村镇、家户；最终形成了封建专制社会典型的权力金字塔结构，在这个金字塔的最下面，是千千万万的平民百姓，最上面，则是君主皇帝一人。

在封建专制社会，政府获得统治权力的手段是暴力，政府维持统治的根本手段仍然是暴力。

封建专制社会是在人类原始部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发展演变而成的一种社会制度。当地区间差异较大，原始部落较多，发展不平衡时，对文化的传播、商贸的繁荣、边远落后地区的进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封建专制统治模式是一种维持性的统治模式，长于保守，短于创新。当人们以一种一成不变的方式生活时，统治者尚有充分的经验和精力去应付各类社会问题。当社会进入革新年代，涌现大量前所未闻的新生事物时，由君王一人决定一切的统治模式立即就会表现出其拙劣性，即便君王非常精明能干，廉洁奉公，也会出现既无经验、也无精力时间去应付的状况，由武断决策造成的失误便会屡见不鲜，由怠慢延误造成的损失也会不计其数，呆板的体制将明显制约、阻碍社会的发展。

科学技术大发现和产业革命的出现，将人类社会带进了一个崭新的工业科技时代，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驾驭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日趋复杂化，专制社会已无能力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我们有必要仔细分析一下这种社会结构的特征和弊病，以使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它、摆脱它。

### 二、专制政体的弊端

专制制度在组织结构上有自我稳定的机制，能够起到基本的维持社会治安的作用，因此，它能够长期存在。

专制政体从社会形态上看有以下五种主要弊端：

#### 1. 独断专行

最高统治者个人大权独揽，在国家事务中决定一切、支配一切。社会没有法制，统治者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如果颁布一些法律条文，也完全是以约束百姓，服务于统治者为目的。各级官吏能够自己随意解释法律、执行法律，一个国家有多少个官吏，就有多少种法律。百姓的利益在受到官吏侵害时，束手无策，无处求助，唯一的办法是向上级官僚申诉，但他们只会被打发到一个并无任何实权的接待处，接待官员要么傲气十足，象对待精神病人一样毫不耐烦，要么视受害者为无理纠缠，将他们的材料转交给原来滥用职权制造冤案的官员，于是含冤者受到变本加厉的迫害。

国家没有民选性质的独立立法机关，如果有立法机关，也是依统治者的意志而建立，依附于统治者而存在，统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随意安排立法机构的组成人员。只有那些能通过组织部门的认真筛选和长期考察、政治上绝对可靠，能自觉地与他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人才有可能进入立法机关。立法机关无异于统治者的举手机器和橡皮图章，不能起到制约统治者的作用，统治者可以随意制订、修改法律。司法机关没有独立地位，同立法机关一样，人员组成由统治者指定，依照统治者的意志行事。

集权统治者掌握着社会的一切权力，掌握着百姓生命的生杀大权，在这样的社会，获取权位是人们获得特权和自由的唯一出路，官场是所有想施展个人能力者的唯一竞技场，想获得更多的权力、财产、自由和个人幸福，唯一的选择就是争取更高的权位，而能否如愿，只取决于是否能获得上司的个人好感，与百姓是否认同毫无关系。因此，这样的社会，是各种野心家、阴谋家和卑鄙小人的天堂，他们竭尽全力地去博取统治者的欢心，奉迎独裁者的嗜好、阿谀贵族们的愚蠢，并忍受其侮辱，他们清楚，以牺牲自己的尊严代价，是唯一有效而廉价地保住和晋升自己职位的手段。独裁者对那些心甘情愿或被迫做奴才的人则司空见惯，长期生活在赞美、笑脸之中，使得他刚愎自用，生活糜烂，他会发现自己的一切都被他人事先考虑到，尽管他管理着千万人的事情，其实他对这些事情并不了解，因而时常将自己的职权交

给下属去行使，使得低级官吏也能够狐假虎威地招摇过市，在平民百姓前面挽回他们的人格，赚取他们溜须拍马的最佳回报。

统治者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任何异议都会使他们感到非常刺耳，不管其内容是否合理，首先就会被认为是对自己的不尊重，是目无领导的表现。在这样的体制下，最大的忌讳，就是顶撞上级，哪怕只有一次，也有可能被永远打入冷宫。因此，那些真正有才干，坚持原则，直言不讳的人，只会遭到傲慢轻蔑的对待，是属于那些最没有资格被任用的人，这样的人要么让位给更会奉迎的政客，要么就是放弃自己的做人的原则。诚实正直，不是一种公认的优点，反而被认为是一种多余的、愚蠢的品性。

是否顺从，是权贵们衡量下属功过的主要标准，品德再差，再无能的人，只要能表示顺从，再有那么一点小聪明，知道能如何取得权贵们的欢心，就能得到提拔，即便是极不称职，照样能终身为官，因此，走运的往往是一些阴谋家或者是骗子。这些人在掌权之后，其无能和专横的本性很快就会暴露无遗，对上是奴隶，对下成了奴隶主，从上往下看，是向日葵似的朵朵笑脸，而从下往上看，却是官吏们丑陋的颈项。

统治者当然也明白下属种种努力的目的是什么，因此，他也时常冷落那些想谋求职位的人，以考验他们是否真的忠诚，有时故意使某些职位保持空缺，使他们长期处于希望和期待之中，以便自己能有效地控制和驯服他们。他知道，当他全部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不能再提供新的好处时，他们极有可能把他抛在一边，投靠新的主人。

独裁者对自己的下属没有信任感，他们不相信任何人，他们时常发现自己最信任的人也在对自己撒谎，从而认为一切都动机不良，心术不正，他们不理解自由一词的含义，一遇到异议就会惊慌失措，时刻提防有人对自己的权位构成威胁。他们畏惧任何形式的民间组织，草木皆兵，随时准备将其掐灭在萌芽之中。

他们残酷地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将这些人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对其进行肉体折磨、判罚劳教、流放甚至死刑。他们将百姓视为无知愚昧的暴民，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动用武装部队，镇压任何规模的集会行动。对被拘捕者，则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

对外，独裁者穷兵黩武，时常由于个人之间的争吵而开战，将国家拖入战争，驱使千千万万的百姓在战场上互相厮杀，将国家巨额资金用于研制杀人武器，而战争的起因，有时仅仅是统治者为了逞强争面子。他们知道，煽动排外情绪，甚至发动战争，是转移国民对国内政治腐败的视线，增强社会凝聚力，加强其个人权力的有效手段，并能方便地给自己戴上民族英雄的桂冠。

在这样的政体下，各级官吏被独裁者的权威所慑服，当独裁者作出错误的决策时，尽管会有许多人发现其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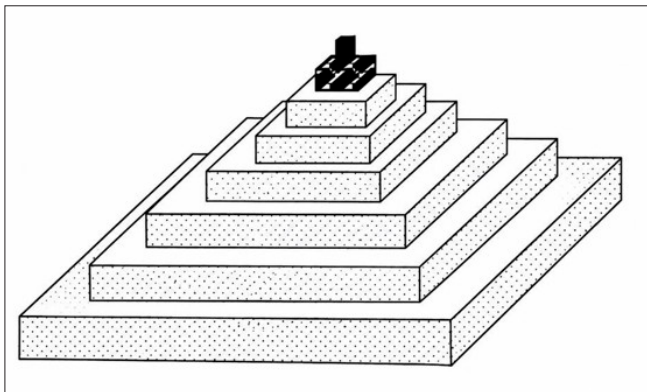
误，却无能力指出矫正，最为荒唐的是，独裁者在酒醉和精神失常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仍然会被当作圣旨得到贯彻执行。

但是，尽管独裁者对百姓充满戒备感，对百姓的疾苦无动于衷，对百姓的呼声毫不关心，他们还不会忘记需要向公众表现自己的温和，在他们心血来潮时，也会跑到穷乡僻壤，在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和朴素的村民坐在一起，矫揉造作地摆好架式，让大批随从记者拍摄合影，以显示自己贴近百姓。

## 2. 世袭等级

在这种制度下，人们被统治者按出身划分成各种等级，等级规定人们的生活地点和所能从事的职业，级别是终身的，非作出极大的努力或贡献，经上层统治者同意，任何人也不得改变，有时，甚至死后的埋葬地点也按身份划分了等级。等级具有世袭性，下等人出身就是下等人，他们的子孙仍然保持与他们同样的身份，下等人通常没有受过文化教育，或只接受过最基本的一点文化教育，上等人则天生就属于统治阶级，他们出生在统治阶级的家庭里，接受最完备的教育，他们自己也将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社会最上层的是皇庭贵族，他们终身任职，并把权位传给自己的后代。最下层则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平民百姓。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不同的等级。每一等级在接受上一等级统治支配的同时，有更多的下一等级的人可供其支配，这使得各级官僚都能感到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各有一定的满足感，各有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在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同时，无形中就自动促进了整个社会状态的稳定。

在这种体制中，许多人之所以拥有权力纯粹是由于他们与原先的统治者有血缘关系，实际上，他们并不比被他们统治的人更聪明，更能干。严格的等级制度无情地把每个人固定在一定的位置上，这样做虽容易管理，却是对人才的一种惊人浪费。在这种制度里，出身高贵的庸才往往能得到很好的职位和待遇，而出身低下的人寻求发展，却会受到种种阻碍和限制，他们为了解决温饱而不得不终日操劳，时常为了一些小得可怜的目的而耗尽毕生精力。即便是一个天才，他在事业上获得成功的机会，也比一个出身高贵的庸才要少得多。





### 3. 分赃制度

在国家出现初期，如果有一批没有地盘，靠拦路抢劫为生的强盗们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夺得一块地盘时，他们就会向当地百姓以收取保护费的形式来代替拦路抢劫，并给自己戴上保护者的面具，成为地方势力的一员。地方势力互相争夺地盘时，实际上就是争夺对百姓的控制权，这种控制并不依赖于当地百姓是否同意而存在，只取决于其是否有足够的武力。国家的出现减少了地方势力间频繁的武力冲突，但并没有改变这种统治的性质。

专制政府在经济上对百姓进行肆意掠夺，他们能随意制订税法，强迫百姓缴纳各种高额苛捐杂税，垄断经营高营利行业，动用国库资金营造各种豪华设施供自己享用。在出现财政赤字时，任意印发货币。没有人敢检查他们的财务，更没有人敢给他们的会计建立审查制度，国库就是他们自己的金库，老百姓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在他们的内部，各级官僚之间，则按比例进行分赃，合理享用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钱财。他们也决不会忘记分出一部分财政收入，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冠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实则悉心将其私有化，使其只忠于自己，随时用于扑灭来自百姓的反抗。

即便统治阶级中的个别人刚上台时对百姓还有同情心，但是经过这种官场的长期熏染，也会变得昏庸无道，对百姓的疾苦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因为百姓的拥护并不能提升他们的职位，百姓的唾弃也不会减少他们的报酬，他们与百姓的关系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他们没有必要在百姓身上花费过多的精力。决定其职位与前途的，完全是上司对他是否信任。

由于没有常备的监督约束机制，上司的放任自流，使得贪污在各级政府官僚中的普遍存在，官僚们并不会满足于“合理的”利益分配，他们往往巧立名目，向百姓收取各种额外费用，中饱私囊，或者在贿赂面前，为了个人微不足道的好处，损害广大百姓的利益。上司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下级利用权势捞取好处，以作为对下级进贡的回报。

### 4. 愚民政策

社会的文化教育和传播媒体由政府统一掌管，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没有政府的许可，任何出版物也无法出版发行，而愚民政策的实施结果，有时也会愚弄统治者自己。

对于统治集团内部的丑陋现象，统治者封锁消息，不让百姓知道，对于因官员的不负责任或腐败无能造成决策失误，导致百姓或社会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时，则捏造事实编造情节，制造假象愚弄百姓；他们内部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在公众面前则故意表现得相处融融、亲密无间；他们压制不同的思想观念，禁止对其统治模式的不合理之处进行批评；他们高傲自大、排斥外来文化，

不接纳其它民族文化的优点；他们脱离国际社会的主流，成为国际大家庭之外的孤家寡人；在国内，他们脱离大众，被政府权威的雾霭所保护，使百姓不了解政治内幕和政策来源。他们以学识渊博的训诫者自居，满口说教民众的大道理，将社会的任何发展均渲染为自己的伟大政绩，对少数愿意为其鼓噪的文人，则施以小恩小惠，以萝卜加大棒的原始方式统治着整个社会。

蒙蔽视听，把人的头脑搞糊涂是任何成功的统治者的一种武器。在没有任何其它信息来源的情况下，愚民政策能成功地向平民百姓列举社会现状的无数优越性和必然性。将社会的一切发展归功在统治者身上，使老百姓表现出带有钦佩心情的服从。对于他们的决策错误和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们也总能找到各种大大小小的借口，让他们控制的媒体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

就这样，他们用一张经过精心规划、编织的很密的网，罩住整个社会，形成一个独立的意识形态，人们只能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范围内，以政府许可的、一致的方式去思考问题，最有创造精神和最有坚定意志的人也不能冲破这张网，成为社会革新的带头人。

对于那些势单力薄的反对者，在他们的见解尚未见诸报端，个人的能力尚未崭露头角，统治者就会立即给他们当头一棒，将他们置于死地，在残酷的打击下，社会无法产生任何有价值的政见。

久而久之，百姓为各种假象所蒙骗，对各种社会现象产生误解，既不了解自己的社会，也不了解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使得整个社会的民众精神颓废，意志涣散。

一个社会千千万万的民众，被少数统治者用纯粹的恐怖手段所压服，是人类社会最令人厌恶、最让人失望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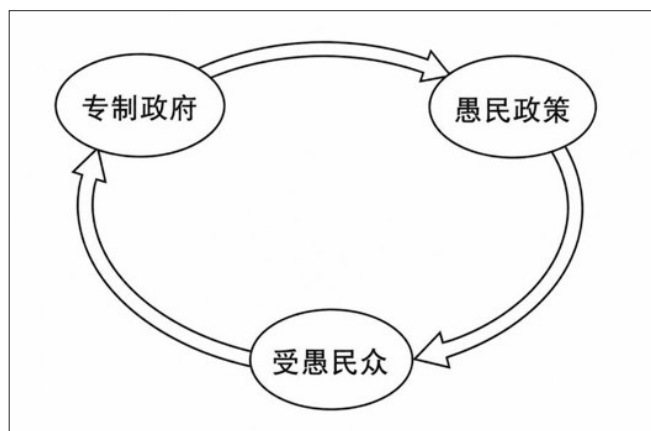
在这种封建专制统治下，普通百姓对政府官员的行为不可能有任何发言权，更不用说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意志去指导和改变政府的行为，他们只能听命于政府，甚至是眼睁睁地任由政府侵犯自己的权益。任何人，如果关心国家的政治问题，却不可能对其发挥任何影响，反而会有相当的的危险性，使自己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就会对政治问题、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对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视而不见，对社会道德的败坏无动于衷，甚至对本街道的规划、卫生、治安也毫无兴趣，认为那都是政府的事。最终，民众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将精力放在如何将自己居住的一个狭窄的空间布置的更好，如何在一个拥挤的社会为自己多争取一点微不足道的利益上。他们没有反抗精神，甚至连产生不满的能力都丧失殆尽，对所有的社会问题麻木不仁，没有社会责任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变成一群胆小而只会干活的驯服牛羊，任人宰割、奴役，而政府官员则成了他们的牧人。

在这样的社会中，老百姓往往都相信天命。认为自己的处境、遭遇、祸福都是命中注定的，能否做成某件事情，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运气，认为帝王将相、官僚贵

族们天生就是统治者，他们以极其朴素的感情对统治者所返还的并大肆渲染的微不足道的补助感激流涕。而统治者也不会忘记把自己的政权冠以人民的美名，以人民的名义掌权，使其极富欺骗性。

政府实施愚民政策的结果会形成一个统治怪圈：专制政府控制社会的传播媒介制造愚民政策，愚民政策造就了一大批听天由命的百姓，听天由命的百姓继而托持着一个控制一切的专制政府，如图 4.1 所示，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政治学上有句话，叫做“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句话有道理，理由很简单，因为政府应该是建立在人民的同意之上的。但是，在一个尚未开化的强权专制社会，这句话反过来也成立：“有什么样的政府，就会有怎样的人民。”

专制统治者一手拿着强权镇压的大棒，一手拿着愚民政策的麻醉剂，就能对付任何意志坚强的反抗。只要愚民政策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专制统治就能够长期维持下去。



## 5. 固步自封

官僚贵族们习惯于循规蹈矩地按照祖上遗留下来的方式进行统治，因为他们的祖先这样做就过得很好，他们对自己的地位很满足。只有当社会的发展要素或生产力发生变化时，官僚贵族才会显示出自己的无能，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及时调整自己的组织结构去适应新的形势。统治者都是由老统治者在自己熟悉的几个可靠的近亲中挑选产生，知识观念与老统治者雷同，离不开既得利益集团的范畴。这种领导人的选任方法无法保证继任者能拥有良好的领导素质、知识与才能，也无法保证其能获得政府中其它元老、高官的敬佩与支持，因此，除了第一代领导人之外，继任者都不得不让贵族老人们分享一部分权力。政府中很难会产生强有力的人物，有能力进行政府重组改革，使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当社会一成不变时，他们尚有一定的能力进行管理，但当社会形态发生变化时，政府便会显得无所适从，内部管理混乱，颁布的政策互相矛盾。内部政治权力斗争的结果，时常是年长的，在官场上富有经验的一批人占据上风，这些人因循守旧，最终使政府变成落后保守、

反对变动的反动大本营。

这种社会，当统治者的权力绝对稳固的时候，还比较温和大度，当他们的权力虚弱时，或掌权者变得老态龙钟后，就会变得顽固不化。当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变成一种习惯而固定下来时，他们对变革的偏见和反对就会变得根深蒂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做任何改变都会变得非常危险，甚至遭到歇斯底里的报复，这种社会对待变革的反应，就像一个看见医生就咆哮的精神病人，不能忍受任何人把手放在他的缺陷上，研究他的疾病，想办法把他的病治好。

在这种统治模式下，由于占统治地位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作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只能呈间歇式，是低效率的。每次变革，只能通过暴力和政变方式更换昏庸无道的政治领导人才能得到实施，从而引发社会动荡，伴随着流血甚至是连年的内部战争，造成整个社会巨大的人、财、物损失。要么，就是整个社会付出漫长的时间代价，等待最高统治者的自然死亡，寄期望于能有一个开明、理智的新领导人上台。然而，可悲的是，在最好的医疗保健条件下，统治者往往长寿，而新的统治者除了年龄之外，思维模式与老的统治者如出一辙。使得那些对社会制度与美好生活抱有幻想的人们，在等待中，不知不觉地度过了自己的青年、中年，迎来了自己的暮年。

专制制度也并非全都无能愚昧，有时专制政府也有文明开化的，当社会在一个开明睿智的领导人统治之下时，社会也会被管理得井然有序，它能创建一些伟大的人力工程，组织起强大的军队，抵御外来入侵，甚至征服周边国家，建起庞大的帝国，尽管这种强大往往并不会比一代人的寿命更持久。

专制统治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种最方便、最自然、最舒服的统治方式。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充分享受做人的乐趣。即便国家很穷，统治者仍然能享有富国的富人们才能享有的生活方式：享用到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最高级的交通工具、最名贵的食品 and 用具、最豪华的宫殿。如果说，想为所欲为是人的天性，那么，就人的天性而言，没有一个统治者不愿意以这种方式进行统治，因此，尽管专制政体是一种不公平，不人道、弊端明显的政治模式，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不少先例，民主政体在民众没有充分警觉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了专制政体。

编辑：黄吉洲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党的棋子

—— 中共输出革命秘史

作者：陀先润

## 第一篇：幕后那只手

1969 年的缅甸北部，一批中国年轻人正在哭着往山上跑。

他们背着弹药，没有枪。任务是把弹药送进山顶的坑道，给里面坚守的战友。从集结地到山脚下大约一公里，美军的炮火把这一公里变成了一条死亡走廊。一个亲历者后来回忆，他用高倍望远镜看着一百多人冲出去，炮火散去之后，进入坑道的只有三个人。第二天，又是一批人哭着往上冲。

这些人是中国的红卫兵，是文革武斗中的失败派系。有人悄悄告诉他们，去缅甸打仗，政治污点可以一笔勾销，打完仗回来算参加革命，一切既往不咎。于是他们跨过边境，加入了缅甸共产党的游击队。最多的时候，有一万多中国人在缅北的丛林里打仗。

没有人告诉他们，在缅共内部有一条秘密指令：这批中国人要被放在战斗第一线，逐渐消耗掉。

他们不是战士，他们是炮灰。而决定他们命运的那个人，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从来没有去过缅甸。

同一时期，在大半个地球之外的约旦，一批巴勒斯坦游击队员被约旦军队俘虏。约旦国王侯赛因下令，把其中一批人单独关押，不和其他俘虏关在一起。这批人不是巴勒斯坦人，也不是约旦人，他们是中国人，是混在巴勒斯坦法塔赫武装里的中国军事顾问。

他们在沙漠里教阿拉伯人打仗，教的是毛泽东思想，教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教的是如何建立基层组织。这件事后来被压了下来，约旦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不想把它弄大，于是这批人悄悄被遣返，这段历史从公开记录里消失了。

再往北，在纽约的法拉盛，华人社区里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中国派来的情报人员如果出了麻烦，只要跑进法拉盛，就能安全换身份或者离开美国。这个规矩不是最近才有的，它的根基从 1930 年代就开始建立，经过几十年的经营，法拉盛已经是一个任何外部力量都很难渗透进去的安全区。

在日本，一个叫重信房子的女人在 2000 年被捕时，护照上有二十多次进入中国的记录，在北京居住的时间加起来将近两年。她是日本赤军的领袖，一个在中东活动了几十年的恐怖组织的核心人物。日本警视厅认为，日本赤军在中国有一个秘密基地。中国政府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缅北丛林里哭着冲锋的中国知青，约旦监狱里被单独关押的中国顾问，纽约唐人街深处的秘密网络，在北

京有据可查的日本恐怖分子。这些故事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代，表面上毫无关联。但它们背后有同一只手在操控。

这只手，叫中联部。

中联部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1951 年正式成立。它的官方定义是负责与各国政党开展交流合作的机构，听起来像是个专门接待外宾、互赠礼品、发表联合声明的礼宾部门。2024 年，德国宪法保卫局向联邦议院正式发出警告，称中联部是一个情报组织，要求德国政界人士提高警惕。这个警告发出的时候，中联部已经存在了七十多年。德国人花了二十年才搞清楚对手是谁。

这不是德国人笨，是这个机构本来就不想让你知道它是什么。

中联部最核心的功能从来不是联络，而是渗透。它在东南亚孵化并控制了多个共产党，在中东扶持武装组织，在美国建立秘密基地网络，在日本培植极左势力。它用过的工具包括枪支弹药、秘密电台、假护照、政治顾问、帮派组织和选举干预。它做这一切，从来不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出现。

要理解中联部是什么，可以看一个具体的人。

孙海燕，中联部前副部长，曾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1990 年进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军训期间入党，政审干净。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1989 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国家安全系统和情报系统开始大规模从当年入学的名校学生中招募人员，挑选标准是背景干净、政治可靠。孙海燕是那几届被招募的人之一，很可能在大学期间就已经进入了情报系统。

1995 年本科毕业后，她公派赴日本攻读法学硕士。那个年代能够公派出国的人，要么家庭背景过硬，要么已经和某个系统建立了关系。她 1997 年回国，直接进入中联部，第一个岗位是政策研究室。研究室是中联部的情报分析核心，对外可以挂学者头衔，实际上生产的是供高层阅读的战略情报报告。她在这里一路做到副主任，然后转任中联部一局副局长、局长。

中联部一局负责的是南亚和东南亚的政党运动，也就是马来西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缅甸共产党这些组织的总负责部门。换句话说，孙海燕从情报分析起步，最终成为情报行动的具体负责人。后来她去新加坡当大使，是为了给自己的履历做一层包装——副部级以上的官员需要公开履历，如果简历上全是中联部的各局各处，太过扎眼，挂一段大使经历，对外就成了外交系统出身的人。

这种包装不是孙海燕一个人的做法，而是整个系统的惯例。

与孙海燕形成对比的是刘建超。他是正宗的外交部系统出身，后来被调入中联部担任部长。他高调访美、会见布林肯，以中联部部长的身份做外交部长该做的事，在中联部内部是严重越界。外交是台面上的事，中联部做的是台面下的事，两套系统的逻辑完全不同。刘建超搞不懂这个区别，或者说他根本不在乎，因为他的目标是接任王毅的外事办主任位置，中联部不过是一个跳板。这是他后来出事的根本原因。

一个从大学时代就被招募、在系统内部成长了三十年的情报官员，和一个空降进来走过场的外交系统官员，在同一个机构里，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对比，本身就说明了中联部是什么。

中联部在 1971 年成立了内部研究组，后来扩展为研究室，对外可以挂教授、学者的头衔，实际上是战略情报和政党情报的分析中心。到了九十年代，研究室的部分成果开始对外发行，就是现在还存在的《当代世界》杂志。这是冰山一角，水面以下的东西，从来不对外公开。

2003 年到 2004 年间，中联部经历了一次大规模重建。这次重建不是换人，而是换功能。工作重心从政党交流和情报分析，开始向情报收集乃至情报行动方向转移。配合当时启动的大外宣工程，中联部开始系统性地介入各国议会政党，扶持小党，安插人员，干预选举。德国人后来花了二十年才意识到的事情，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在中联部的内部逻辑里，它扶持的那些组织和人员都是棋子。棋子有用的时候，给钱给枪给顾问。棋子没用的时候，一个电话通知停止援助，然后假装从来不认识。缅北丛林里哭着冲锋的中国年轻人，马来西亚丛林里打了四十年的华人游击队，约旦监狱里的中国顾问，中东沙漠里流亡的日本赤军——他们都以为自己在为某种理想战斗。他们不知道，在北京的某间办公室里，有人随时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就像扔掉一颗用过的棋子一样简单。

这个系列，就是要把这只手背后的故事，一件一件讲清楚。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 Party Pawns: The Secret History of CCP Revolutionary Export

*This article examines allegation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overseas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through the history and oper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DCPC). It opens with accounts from northern Myanmar in 1969, where many young Chinese, including former Red Guards seeking political rehabilitation, crossed the border to join the Burmese Communist Party. According to the narrative, they were repeatedly assigned to the most dangerous front line missions and suffered devastating casualties while believing they were serving a revolutionary cause.*

*The article then turns to several episodes beyond Southeast Asia. It describes Chinese military advisers allegedly operating alongside Palestinian guerrilla organizations in Jordan before being quietly repatriated after capture. It also refers to influence networks in New York's Flushing community and to contacts between Japanese Red Army leader Fusako Shigenobu and China. Although these events occurr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decades, the author presents them as parts of a single strategic pattern directed from Beijing.*

*The central focus is the IDCPC. While officially responsible for maintaining relations with foreign political partie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its actual functions have extended beyond party diplomacy. It portrays the department as combining political influence,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covert coordination, and support for overseas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s. Germany's domestic intelligence service is cited as having warned public officials about the department's activities, reinforcing the article's broader argument concerning its international role.*

*A profile of former vice minister Sun Haiyan is presented a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department's personnel system. Her education, overseas study, policy research work, regional responsibilities, and later diplomatic appointment are interpreted as evidence of institutional methods that blur the boundary between intelligence and diplomacy. The article contrasts her career with that of Liu Jianchao, whose transfer from the Foreign Ministry is presented as highlighting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tional diplomacy and the department's internal operational culture.*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IDCPC has consistently treated foreign organizations, overseas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participants as expendable instruments serving broader political objectives. Revolutionary ideals and ideological solidarity, it argues, frequently concealed calculations driven by influence, control, and state interests. Through these historical examples, the author portrays the department as a largely hidden mechanism operating behind China's external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revolutionary outreach.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党的棋子

——中共输出革命秘史

作者：陀先润

## 第二篇：亲儿子的命运 —— 马共与泰共

1961年，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秘密来到北京。

他来的目的很明确：告诉中国同志，马共打不下去了。从二战结束时的一万多人，到现在躲在泰马边境丛林里的不足六百人，打了十几年，什么都没打出来。英国人走了，马来亚独立了，新政府对马共的清剿越来越有效，丛林里的人越来越少，补给越来越难。陈平准备宣布放弃武装斗争，带着剩下的人出来谈判，换一条活路。

接见他的是邓小平。

邓小平告诉他：东南亚的形势即将发生巨变，对共产主义越来越有利，不要改变政策，要继续打下去。

陈平回去了，继续打。

十八年后的1979年，陈平再次被叫去见邓小平。这一次邓小平告诉他：中国不会再支持马共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两次谈话，同一个人，完全相反的指令。两次谈话之间死了多少人，没有人统计过，也没有人在乎。

马共的历史，从诞生的第一天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1925年，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派了一个助手南下到南洋，在新加坡建立了南洋共产主义支部。这就是马共最早的前身，从第一天起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分支，不是在马来亚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是被种下去的。1930年，在胡志明的主持下，南洋共产党正式改组为马来亚共产党。党员几乎清一色是华侨，领导层全是华人，建党的钱是中国出的，政治纲领是中国定的。

这个先天条件，后来成了马共无法摆脱的致命伤。马来西亚政府把马共的武装斗争定性为华人对马来人的统治战争，让马共在当地始终无法真正发动群众。你打出去的旗号是共产主义革命，但当地的马来人看到的是一群华人拿着枪要来领导他们，这场仗从政治上就输掉了一半。

但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马共一度成为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武装力量。英国人给了他们武器，马共组建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控制了马来半岛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武装人员超过一万人。那是马共历史上唯一一段真正强大的时光，也是他们距离胜利最近的时候。

然后，一个叫莱特的人出现了。

莱特是越南籍华侨，说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他进入马共的时候，正是中共和马来亚之间的联络完全中

断的那段空档，没有任何人能核实他的身份。他就靠着这个身份，在马共里站稳了脚跟，一路做到总书记。

没有人知道他同时在为法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工

作。

1942年2月，马共决定在一个叫黑风洞的地方召开秘密会议，出席的是马共和抗日军的大部分高级将领。日本人提前得到了通知，包围了现场，把所有人杀了个干净。那是马共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清洗，几乎所有的核心骨干都死在那里。莱特原本应该出席，临时说车子坏了，没能到场。

战后他又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说服马共把辛苦积攒的武装力量解散了，说要走合法斗争的路线，不要和新的殖民政府正面对抗。马共信了他，把枪交出去了。然后他卷走了党的全部经费，消失了。

1947年，他在泰国曼谷被泰共党员认出来，追上去当街击毙。

莱特死后，马共才开始彻查，发现他当年做的每一件事背后都有出卖的影子。黑风洞的屠杀，武装力量的解散，每一次马共遭受重创，莱特都是最大的受益者。但到了这个时候，人死了，证据没了，一切都只能是推断。

马共用了整整十年，才从莱特造成的破坏里重新站起来。这十年里，一个外来的间谍把马共掏空了，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马共的根本问题：它没有真正扎进马来亚土地里的根基，离开北京的指挥和保护，它就是一盘散沙。

莱特走了之后，马共真正的终结者出现了。这个人不是英国军队，不是马来西亚政府，而是一个叫李光耀的年轻律师。

1950年代初，李光耀从英国剑桥留学回来，回到新加坡开始执业。他主动找上了马共的外围组织，找上了各个左翼工会和劳工团体，说要帮他们打官司，免费提供法律援助。他在这些组织里混得如鱼得水，很快成了新加坡左翼圈子里人脉最广的人。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成立一个合法的政党，叫人民行动党，用议会选举的方式来争取政权。他的理由很充分——马共是非法组织，进不了议会，只能在丛林里打游击，而打游击已经证明行不通了，不如走合法路线，把力量引入体制内。马共的人觉得这个思路有道理，开始全力支持他，帮他拉票，帮他组织工人和学生，把他的人气一点一点做起来。

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新加坡大选，李光耀成为新加坡自治邦首席部长。

权力到手之后，李光耀开始动手。

他动手的方式是一个一个来的，不是一刀切，而是精准打击。首先是马共背景的人，凡是有组织关系的，全部逮捕，关进监狱，不经审判，无限期关押。有人一关就是十几年，有人关到白发苍苍，有人关到死在狱中。内部安全法给了他这个权力，不需要证据，不需要法庭，一纸命令就够了。

然后是中共南方情报系统派来的人，也就是那批以学者、教师、报人身份出现的地下工作者。这批人他没有关，而是礼送出境，客客气气地把你送走，走之前甚至还给你道别。南洋大学是当时中共在马来亚最重要的教育和培训基地，李光耀直接把它关掉，说是要合并到新加坡大学，理由冠冕堂皇，没有人能当面反驳。

最后是那些曾经帮他竞选、帮他拉票、把他送进议会的左翼同僚。这些人里有他的战友，有他的朋友，有在最艰难的时候站出来支持他的人。他把他们一个一个送进监狱，用的罪名是勾结共产党，威胁国家安全。其中有人在狱中待了将近三十年，出来的时候已经是老人。

李光耀后来被很多人称为华人世界里难得的政治天才。这个评价大概是对的。但天才的代价，是由那些帮过他的人用一生来承担的。马共和左翼力量把他送进了议会，他用他们的尸体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然后建立了一个在华人世界里独一无二的高效威权体制。

新加坡的马共，就这样被彻底消灭了。

失去了新加坡的马共，退回到马来半岛的丛林里继续打。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困境：领导层是华人，在一个马来人占多数的国家搞武装革命，永远都会被定性为外来势力入侵。他们在丛林里坚持，坚持了一年又一年，人越来越少，补给越来越困难，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薄弱。

丛林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很少有人描述过。那些在里面待了几十年的人，大部分没有留下文字。偶尔有人回忆，讲的是常年潮湿的丛林、腐烂的树叶、永远不够吃的食物、时刻警惕的神经。他们结婚、生子、老去，在那片丛林里过完了自己最好的年华。他们的孩子在丛林里出生，有些孩子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

这一切，都是因为1961年邓小平那句“要继续打下去”。

1979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当面告诉他：你要和东盟国家搞好关系，就必须停止支持东南亚的共产党。邓小平答应了，然后找来陈平，告诉他中国不再支持马共。

中国在湖南益阳给马共建立的秘密基地关掉了，马

来西亚之声广播电台停播了，武器供应和经费全部切断。马共在中国培训的干部被遣返，那些在中国待了多年、学会了一口普通话的马共干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无处可去。

又撑了十年，1989年，马共终于走到了尽头。

在泰国政府的见证下，马共和马来西亚政府签署了和平协议。马共宣布解散，成员放下武器，向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宣誓效忠。作为交换，马来西亚政府承诺不追究法律责任，愿意回国的发一笔补偿金安置，留在泰国的划出几块土地让他们居住。

解散时大约还有一千多人，是当年一万多人的零头。

一部分人回了马来西亚，领了钱，找个地方过日子，从此不提过去的事。另一部分留在了泰南边境，住进了泰国政府划出来的几个村子。这几个村子后来被冠以一位泰国公主的名字，改造成了旅游景点，叫朱拉彭公主村，一共四个村。游客去那里喝咖啡、拍照，买当地人做的土产纪念品，脚下的土地曾经埋过什么，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不会问。

陈平想回马来西亚，被政府拒绝了。他在泰国等了很多年，2013年在曼谷去世，终究没能回家。他第一次去北京见邓小平的时候四十岁，死的时候八十八岁。这四十八年，他把自己最好的岁月全部交给了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打多久、打到什么程度，从来都不是他能决定的。

泰共的故事和马共高度相似，只是结局更加诡异。

泰共比马共还要纯正。1926年由中共南洋支部直接建立，1942年正式建党，第一任总书记李启新是中共党员，后来回国当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副社长。新华社香港分社在那个年代是什么，明白的人都明白——它是中共情报和统战系统在香港的核心机构，以新闻机构为掩护，实际上做的是情报工作。泰共的第一任总书记，本身就是情报系统的人。这样的党，和中共之间是什么关系，不言而喻。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全球共产党被迫表态站队，泰共是东南亚第一个公开支持中国的共产党。不需要讨论，不需要考虑，因为他们就是中共系统的一部分。1962年，中国在云南建立了泰国人民之声广播电台，开始对泰国进行革命宣传。1965年，泰共正式开始武装斗争，中国提供培训、武器和经费，全力支持。

泰共打了十年，稳扎稳打，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山区建立了相当稳固的根据地。1976年是他们历史上最高光的时刻。那一年泰国发生军事政变，曼谷的大学里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军队镇压，死了很多人。大批学生和知识分子逃进丛林，加入泰共。武装力量从几千人急速膨胀到八千人，控制区域波及泰国将近一半



的省份。泰国政府一度非常紧张，认为革命真的要来了。但 1979 年，一切在几个月之内就结束了。中国决定联合泰国共同对抗越南，不能再维持对泰共的支持。泰国人民之声电台停播，所有援助切断。老挝在越南的压力下，把境内的泰共武装全部驱逐出境，泰共失去了最重要的后方基地。没有了援助，没有了退路，泰共迅速瓦解。大部分成员接受政府招安，陆续走出丛林。到 1991 年，武装力量全部消失。

但有一件事始终是个谜。

泰共 1976 年之前的领导层几乎全是华人，是中共直接培养或派遣过去的干部。这批人在泰共解散之后，泰国政府没有通缉他们，没有审判他们，连一纸大赦令都没有发，就好像这些人从来不存在一样。他们去了哪里，没有任何公开记录。泰国政府不说，中国政府也不说，双方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这件事被压在水面以下，从此再没有浮起来。

在中共输出革命的历史里，消失是最好的结局。它意味着你回来之后仍然是自己人，仍然可以在体制内得到妥善安置。那些留下名字的，反而是真正被抛弃的人。陈平留下了名字，所以他死在泰国。泰共的华人领导层没有留下名字，所以他们安静地回来了，从历史记录里消失，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马共打了六十四年，从 1925 年建党到 1989 年解散。泰共打了二十五年，从 1965 年到 1991 年。这两个中共最忠诚的亲儿子，一生都在按照北京的指令行事。北京说打，他们打。北京说停，他们停。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独立过，从来没有根据自己的判断做过一个重要决定。

最后，马共的普通战士老死在异国他乡改造成旅游景点的村子里，泰共的华人领导层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记录里，那些在丛林里死去的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棋子就是棋子，用完了就该收起来。至于棋子自己怎么想，从来不在棋手的考虑之内。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 Party Pawns: The Secret History of CCP Revolution ary Export, Part II: The Fate of the CPM and CP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CPM)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ailand (CPT), arguing that both movements ultimately became instruments of Beijing's changing strategic priorities. It centers on two meetings between CPM leader Chin Peng and Deng Xiaoping. In 1961, despite the movement's declining military position, Deng reportedly urged the party to continue armed struggle. When Chin Peng met Deng again in 1979, however, he was informed that Chinese support would end, forcing the movement to survive alone.*

*The article traces the CPM's origins to communist networks established in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1920s and argues that its dependence on Chinese leadership limited its ability to gain broader local support. It also recounts the case of Lai Teck, a senior CPM leader later exposed as a double agent whose actions allegedly contributed to devastating losses, including the destruction of key party leadership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ttention then shifts to Singapore and Lee Kuan Yew.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Lee initially cooperated with left wing organizations and labor movements before using legal institutions and inter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to dismantle communist influence after gaining political power. Former allies, trade union activists, and underground organizers were imprisoned, deported, or politically marginalized, effectively eliminating the CPM's urban support network.*

*Following the withdrawal of Chinese assistance in 1979, the CPM's military position deteriorated rapidly. Radio broadcasts, training facilities,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weapons supplies were discontinued. The movement eventually signed a peace agreement with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in 1989, ending decades of armed conflict. Many former members settled in villages in southern Thailand, while Chin Peng died in exile without returning to Malaysia.*

*The article presents the CPT as following a remarkably similar trajectory. Strongly aligned with Beijing during the Sino Soviet split, it expanded rapidly during the 1970s before losing Chinese backing after Beijing normalized relations with Thailand. Deprived of external support and safe rear bases, the organization quickly collapsed.*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both parties illustrate a consistent pattern in which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faithfully followed Beijing's directives but were abandoned once geopolitical priorities changed. Their histories are presented as evidence that ideological allies ultimately functioned as expendable political instruments rather than equal revolutionary partner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探视访民，竟遭暴行

——李小生被困精神病房三年，探访者现场遇袭

作者：陆建荣



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殷坝村访民李小生被精神病非法拘禁三年。2022年9月13日，我得知李小生母亲过世，李小生被准许回家治丧。作为之前的好友，我也去黄桥镇小殷家桥西侧李小生妹妹家出席哀悼仪式，顺便了解一下李小生目前的情况。

刚开始跟李小生交流时，他说不认识我，后来我起身出门，让他到院子外面走走，他说外面有人，我说有人也不可能限制你自由走动的权利，你不去走走怎么知道。于是我们一起走到院子外面的路上说了几句话。不一会儿就有一个6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过来问我是什么人（后查明此人为原黄坝村书记黄兰珍），并一下子喊来四五个人说我是来带李小生走的，要看着我，不让我走，并打了电话给他们一个领头的人。

这三五个人开始对我进行语言上来挑衅和侮辱，因为对这些人根本没有任何道理可讲，我只说了一句“愚昧”，他们就说我骂他们。后来那个领头的人来了（后查明此人为黄坝村二十组六号村民黄正国），冲过来就打了我一个耳光。然后五六个人对我拳脚相加，有人揪我的头发，有人用拳头打，有人用脚踢，把我打倒在地。他们一边打还一边说“怎么不经打”。

我被打的时候引起了多人围观，然后他们就把我往人少的地方拖。李小生的大妹妹看到我被围殴没有出面阻止，反而把李小生拉进屋里去了。这也是被他们平时的邪恶吓破了胆。虽然这次围殴对我们身体上没有造成太大伤害，但对我人格的侮辱和精神的损伤是极大的。现场也有人黄正国一帮人的野蛮行为进行谴责，但无法制止他们嚣张的气焰。于是我打电话报警。他们见我报警说打电话正好，好像警察跟他们是一伙的似的。过了一会儿，110来了，他们简单了解了情况以后就有一

个警员拉着我的衣服，好像生怕我跑了似的，并让我上警车去派出所处理。我当时向出警人员提出异议：为什么只带我走，打人的人不带走？出警人员敷衍说他们自己开车去。我说他们为什么可以开车去，而我不可以开车去？后来就被出警人员强行推上了车，在车上他们想收走我的手机。我感觉黄桥派出所动机不纯，虽然手机里什么都没有，我还是把手机扳断了。

在派出所一直被派出所关在审讯室直到晚上12点才放我出来，至始至终也没有看到那帮非法监视及打人的人去派出所。

因为我没有手机也没有零钱，所以派出所的人就把我送回事发地去取车，我事先就估计在如此野蛮的地方，他们可能对我放在附近的车进行破坏。到达现场我查了一下，果然两个前轮车胎被他们放气了。在陪同民警帮助下，又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喊来了汽车修理车花了150块钱，充好了气才回家。

经过多次不间断的线上信访及公安局线下信访投诉，终于等来了黄桥派出所的回复，让我配合民警调查并提交相关证据。因为当时没有影像资料，所以取证环节相对困难，唯一的取证途径只有走访附近的居民。

走访中虽然附近的居民都听到或看到当时发生的群殴事件，但无一例外都不敢作证，也包括李小生的三个妹妹。走访时又听到附近居民反映，那天派出所把我带走后，他们让人把李小生再送到精神病院去。此时有附近居民开始反抗，有人拿起手机拍照，并高喊难道我们殷坝村都没有人了吗？然后其他村民纷纷响应，最后现任村支书也加入反对行列，最终把那些来带李小生的人赶走。被走访的村民纷纷感叹，如果当时李小生被带走的话，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

四年来，我持续向有关部门反映自己遭围殴一事，但案件始终没有得到立案处理，多次投诉也未获得令人信服的结果。

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当依法报警、依法投诉、依法反映问题都难以获得公正回应时，人们最担心的不仅是一件案件的处理结果，更是法律应有的公平与公信力能否真正得到维护。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向阳而生

作者：谢先生

我出生在七零年代中国农村，小时候生活异常艰苦，每天都跟着父母，在泥地里辛勤劳作。我的母亲非常乐观，她总是一边干活，一边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那欢快的歌声，总能将我的疲倦一扫而光，使我觉得，生活在中国，真是一件值得偷着乐的事情。直到2018年，我女儿因为接种疫苗患上血癌，才让我逐渐发现，中国共产党，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2018年夏天，当吉林长春长生假疫苗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的女儿，也因为接种上海生物的水痘疫苗而患上了血癌。三次鉴定，都认定我女儿的病是由接种疫苗造成的。根据《上海市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的第五条，上海政府和疫苗企业应承担包括“补偿、医疗康复、入学就业、残疾照顾和生活救助”等处置工作。但中共流氓政府拒绝履行义务。并在我尝试保护我女儿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多次对我进行绑架、殴打和非法拘禁。所有这些都没有任何法律程序。

中共流氓政府首先无视法条内容，提出一次性买断方案。也就是企业给予一笔补偿金，从此我们便不能以任何理由再去找政府和企业。可这笔补偿金连医疗费都没有，我断然拒绝。我要求上海卫健委履行“医疗康复”的义务。上海卫健委说这不是他们的义务。我拿出政府的信息公开，里面白纸黑字表明“医疗康复”就是他们的责任。上海市卫健委便开始胡说八道，他们说：“‘医疗康复’是指我在就医过程中遇到不懂的问题，他们可以提供指导”。我要求他们拿出政策解读依据，他们置之不理。我质问“医疗费”谁承担？他们置若罔闻。我指责他们行政不作为，他们理直气壮地说：“你要是不满意，可以去起诉！”我向法院诉上海卫健委行政不作为。法院拒绝立案，并拒绝出具《不予立案裁定书》。我说法院不出具《不予立案裁定书》我就不走，法官直接叫来法警，将我赶出了法院。

我再次要求政府履责，政府让我去起诉企业。我说这不是企业的责任，政府说有纠纷，找法！他们威胁说如果我继续胡搅蛮缠，将涉嫌寻衅滋事。共产党颠倒黑白的本事真是练得炉火纯青，他们自己拒不履责，反而指责别人寻衅滋事，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没有办法，枪炮都在他们手里，老百姓能有什么办法？迫于无奈，我以疫苗侵犯了我女儿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为由，将疫苗企业告上法庭。法院两审都驳回了我的起诉，法院说“疫苗接种异常反应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应该由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去解决”。我拿着裁决第三次找到政府，政府说法法院判错了，让我去申请再审……。政府和法院相互

踢皮球，谁也不管我们的死活。而疫苗企业更是靠着政府的庇护，说出了“我们有钱，我们也想帮你，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我们就违法了”这样恬不知耻的言论。

既然法律保护不了我的权益，那就让社会来评判。我申请游行示威，浦东公安拒绝了我的申请，我向中国公安部投诉，公安部将投诉又踢回给浦东公安。浦东公安气急败坏，警告我不要再申请和投诉，否则后果自负；他们甚至理直气壮地说：“中国人是没有游行示威权，《游行示威法》也只是拿来糊弄那些欧美人的”。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威胁、无耻的行径，我只能作罢。

既然官方道路走不通，那就走自媒体，我开始在微博上发文章。我的《拿什么来保护你，我的女儿》一文，三天阅读量破200万。可我还来不及高兴，我的文章就被删除了，紧接着对我限流，最后封号。中共在捂老百姓的眼睛和嘴巴上，早就轻车熟路了！

老百姓状告无门，摆在我脚下的就只有上访了。可正是因为上访，才让我真正见识到共产党的邪恶，体会到共产党的残忍。邪恶的事就是共产党设计了很多套路，目的就是走自己的路，让老百姓无路可走。比如信访，我将上海卫健委的不作为，投诉到国家信访局，国家信访局将我的信访件打回到上海卫健委。上海卫健委恬不知耻地在答复里将自己狠狠的夸了一番，对于我在信访件里提出的不公，只字不提。他们既不给政策解读的依据，也不回答医疗费来源。更荒谬的是，信访系统没有人关注这个答复是否合理？而其信访也一样，最后的结果是向公安投诉公安，向法院投诉法院。这种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制度，是万恶的共产党故意设计的制度陷阱。它不可能公平公正，人民也不会满意。这不上海信访答复满意率不足3成，但当我将人民对上海信访不满投诉到国家信访局，结果上海信访的满意率在第二天就变成了99%，真是天下奇观！这种集体造假和作秀，真是令人作呕！

信访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但让我成了需要被解决的人。从此，中共流氓政府对我家进行了长期的、有组织的迫害。他们全方位监视我们家庭，并跟踪他们的外出，连我女儿上学都不放过。他们肆意绑架、殴打、传唤和拘禁我，并在传唤的过程中多次虐待我，非常残忍。以下两件事足见一般。

2020年10月，我在北京乞讨，乞讨前我咨询了北京的12345和12348，他们都说在北京乞讨是合法的。可我乞讨不到20分钟，一队警察将我扑到在地，反铐双手带回了派出所，转身就交给了上海驻京办。上海驻

京办工作人员在中巴车上对我进行了围殴，他们一个人在从身后用胳膊勒住脖子，其它人对我拳打脚踢，打到我不能动弹为止。随后他们将我押回上海，关进了浦东看守所。期间我因肋骨剧痛，多次请求医疗帮助，但均被拒绝。

看守所环境非常恶劣。不到 30 平米的监室最多关押了 56 个人。没有地方睡觉，大家只能头脚相错，侧身而眠，想翻身几乎不可能。就算这样，每晚依然有人需要站着值班，因为实在睡不下。监室内疫病横行，我在第三天就感染了感冒，高烧让我头疼欲裂；咳嗽时肌肉牵扯着受伤的肋骨，发出钻心的疼痛。可看守所拒绝给我提供药物，他们说只有快死的人才配得到药物。但快死的人真的能得到药物吗？我们牢头告诉我，他在一年半内亲眼见过两个人死在看守所，其中一个仅仅是因为 20 多天无法排便。所以中共治下的看守所，总有人莫名其妙的死亡，中共说是突发疾病，你无法想象他们其实是被虐待致死。我每天都被迫进行长时无聊而痛苦的静坐，臀部长出了厚厚的茧。看守所剥夺了我们的放风机会，没有理由。我的羁押时间也被延长到三十天，然后被强制取保候审一年。在监控遍地的今天，一个乞丐要侦察一年？中共唯一的目的就是打击你，让你害怕。明白共产党不把人当人，我知道抗争没有意义。我逼着自己吃下那些发臭的食物，多喝水让自己尽快康复。因为我知道我的妻子，她既要面对血汗工厂“华为”的刁难，还要照顾病重的孩子，更要面对公安的骚扰和威胁。我必须尽快出去，我担心她撑不住。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正确，当我从看守所出来，我的妻子体重轻了六公斤，已经是形销骨立。我无法想象如果我再晚些出来，她会不会崩溃？我的妻子告诉我，在我被关起来后，孩子感冒病危，她恳求政府放我出来照顾孩子，但被无情地拒绝了。我们都知道，血液病患者的感冒是致命的。所以在共产党眼里，人命无关紧要。在取保候审期间，共产党又多次拒绝我带孩子外出求医的请求。再一次证明在共产党眼里，人民的生命真的一文不值！

2021 年 11 月，我解除取保候审，我带着女儿的病历本，去北京问诊。在火车上就不断遭到骚扰，但大庭广众之下他们还相对收敛。火车进入北京南站，他们便对我实施了暴力绑架。绑架的过程中还试图用“碰瓷”来诬陷我，就是有一个黑衣人抓住我的胳膊，试图抢夺我正在录像的手机，我顺手一甩，他就像被高速卡车撞了一样向后面飞去，边飞边喊“你怎么打人？你怎么打人？”我说：“你别碰瓷，这手机还录着呢！”他只好悻悻的站起来。警察见碰瓷失败，便一拥而上，抢走我的手机，把我拽向一辆中巴车。我一边挣扎，一边大呼“救命”，但周围麻木的人群，让我仿佛又看到了百年前鲁迅笔下的那群中国人。在快被拉入中巴车的时候，我用力撑在车框上，他们见拉不进去，便殴打我，拳头像雨点般落在我的头上、背上，我支撑不住，被他们拉入车内。

上车的第一时间，我把手表里的 SD 卡取了出来，

藏进了袜子里。因为我知道手机肯定会被抢，所以我的手机录像只是个幌子，真正录像的设备是手表。果不其然，警察抢走了我的手机，一个多月后才归还给我，归还前做了恢复出厂设置。我被押回上海，囚禁在一个“黑监狱”内。政府一次次撕毁释放我的口头承诺，让我害怕像上次一样被长期拘禁，于是我决定越狱。经过了努力，我终于在一个深夜破窗而逃。上海警方立刻对我行全城大追捕，他们闯入我家，发现我不在，便留下一队人马蹲守在我家门口，第二队人马沿街巡逻，第三队人马通过天眼系统，追查我逃亡路线，第四队人马找到我的工作单位，让单位逼我现身。而我在逃亡途中，将警察绑架我的视频发到微信群里，向群友求救。一时间公安部收到了很多投诉电话。公安部见群情激愤，便叫停了上海的抓捕行动，并承诺让北京的铁路稽察对这次事件进行调查。于是，在我越狱三周后，上海公安撤销了对我的追捕，而我回到家的第二天，公司和我结束了劳动合同。从此，我失去了我心爱的工作，也失去赖以生存的依靠。

公安部的调查结论，自然是公安合规合法。对于共产党的指鹿为马，我已经见怪不怪了，我没提其它要求，只要求他们公开民警的执法录像，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公安部拒绝公开。我将公安部起诉到法院，法院蛇鼠一窝，驳回起诉。他们说我去北京看病是信访有关，说我申请信息公开也是信访有关，说我去北京立案也是信访相关。我突然才发现这是共产党设计信访制度的第二个目的，剥夺人民的诉权。只要你曾经信访过，共党就可以指鹿为马，把你的一切都归结为信访，然后剥夺你的法律援助权。信访的另一个目的是充当情绪缓冲垫，一个信访人员怒气冲冲，信访办人员和颜悦色地聆听他的哭诉，故事讲完，气就消了一半。然后工作人员再装模作样说会向上级汇报，人民就从怒气冲冲转为满心期待了。至于解决百姓困难，那是不存在的。但他们有话术来蒙骗百姓，什么领导很忙来不及处理，什么自己权力太小无法决定领导的想法，实在不行就跟着受害人一起骂那些不做人事的领导。最后信访人在一次次希望和失望之中耗尽了精力，大部分就放弃维权了，这是他们的目的。

如今，我的女儿因疫苗患病已经八年多了，她从未收到过来自共产党的关心！我也因维权弄得遍体鳞伤。妈妈也还是喜欢唱她的“东方红，太阳升……”，但这首歌如今听来，是多么的讽刺！妈妈一辈子活在谎言里，我不忍心戳破；但我不希望我的女儿，一辈子也生活在谎言中，我希望她能感受爱的温暖，我希望她能在阳光下起舞。于是在 2025 年 8 月，我义无反顾的离开了中国，我把这次行动，叫向阳而生！

编辑：李晶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在野党》中国人权观察简报第 33 期

(2026 年 7 月 13 日)

作者：张维清

本期介绍被迫害人士：张鹏，艺名、笔名：张内咸，1986 年 10 月出生，北京人，长期定居于北京清华大学校内，独立电影导演、编剧、脱口秀演员、YouTuber。

## 最新近况：

2026 年 7 月 1 日晚 11 时左右，多名警察前往张鹏位于清华大学的家中将其戴上手铐带走。随后，其家属收到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出具的拘留通知书。通知书显示，张鹏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刑事拘留，目前被羁押在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在遭到拘捕的前后，其在国内拥有十余万粉丝的新浪微博账号和 B 站账号已被官方全面封禁并屏蔽。

## 一、个人简历

1. 2010 年～2025 年：张鹏（张内咸）2010 年后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长期活跃于中国独立电影和青年文化圈，他以独立导演、编剧和制片人身份，拍摄了多部反映中国当代青年迷茫与现实困境的独立电影。其代表作包括《待业青年》、《草莓百分百》、《那些五脊六兽的日子》等，在中文互联网和独立电影爱好者中具有一定知名度。

2. 2025 年 1 月起，他在境外视频平台 YouTube 开设了“张内咸脱口秀”频道，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发布了 360 余支视频，积累了近 5 万名订阅者，正式开始通过网络传播其政治讽刺和幽默作品。

## 二、政治立场

1. 讽刺时政：他利用标志性的北京口音和诙谐的段子，辛辣讽刺中国当下的社会乱象、政治体制、经济困境以及无处不在的言论审查制度。

2. 关注两岸与地缘政治：他在节目中直言不讳地讨论两岸关系、国际地缘政治等高度敏感话题，解构并嘲弄官方的宏大叙事。

3. 倡导言论自由：他主张艺术创作者和普通公民应享有表达权，反对极权主义对个人思想和生活空间的蚕食。

## 三、被捕与判刑经历

1. 2026 年 6 月底—7 月 1 日：其在境外发表的涉政和涉台言论遭到中国国内网民的举报。

2. 2026 年 7 月 1 日下午：微博和 B 站等国内社交平台以“发布涉政有害言论，恶意攻击党和国家”为由，

将其国内账号彻底封杀。

3. 2026 年 7 月 1 日当晚 11 时：北京市海淀区警方在其住所内将其抓捕。

4. 目前状态：案件正处于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尚未面临正式起诉或判刑，目前仍被羁押在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 四、社会评价、国际评价

1. 社会与民间评价：海内外观众认为他是一位极具勇气与才华的中国新生代知识分子，他选择“肉身在内，声音在墙外”，用北京人特有的幽默对抗极权恐惧。

2. 国际与人权界评价：国际舆论与跨国人权倡导组织对此案高度关注。有评论指出，张鹏的遭遇是中国政府将跨境政治打压、言论审查进一步延伸至文化艺术和喜剧讽刺领域的典型案例，标志着中国公民的自由创作与表达空间已全面萎缩。

## 五、《在野党》人权观察部呼吁

1. 立即无条件释放：强烈呼吁中国当局遵守其宪法中关于保护公民言论、创作与表达自由的承诺，立即撤销对张鹏“寻衅滋事”的荒谬政治指控，并将其无条件释放。

2. 保障合法诉讼权利：在羁押期间，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必须严格保障张鹏会见律师、家属的合法权利，确保其知情权、饮食与身体健康，严禁实施任何形式的酷刑或不人道对待。

3. 停止对独立创作者的迫害：呼吁国际社会、文化艺术界、脱口秀同仁以及跨国人权组织持续为张鹏发声，共同抵制和谴责中国当局针对政治讽刺演员及独立创作者的跨境政治清算。

编辑：赵杰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 Human Rights Brief No. 33: Zhang Peng

This brief profiles filmmaker and comedian Zhang Peng, outlining his detention, online censorship, artistic work, and advocacy of free expression. It reports that he remains in detention while the investigation continues and calls for due process, legal protections, his release, greater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treatment of independent creator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祭晓波九周年

作者：吴祚来

大地上留下过  
他的身影  
书山里刻写  
他不朽文字与传奇  
那年，那月，那日  
他融入大海里

今天  
我们一起  
在太平洋边  
倾听  
他涌动的呼吸  
他仍然在述说着  
关于自由  
关于爱  
关于生命的意义

当一群海鸥从海面上掠过  
我们看到  
他飞翔时的欢悦  
当一只白鹤孤影在礁石上驻立  
我们感受到  
他无边的孤寂

今天  
我们用烛光陪伴他  
用诗歌呼唤他  
愿他的天国里春暖花开  
愿我们的故国将有光明的未来  
我们在海边祭奠义人  
我们遥望彼岸的故园  
晓波会回去的  
自由之光将普照华夏永远

编辑：张致君 校对：毛一炜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咏刘晓波刘霞

伉俪情深离别多，  
一路相知尽蹉跎。  
蜡炬成灰终不悔，  
留待史家当墨磨！

—谢显宁 2017年6月30日

念晓波

患难晓波得道多，  
一生一世未蹉跎。  
愤燃火炬启明亮，  
华夏留名不可磨。

—六六外公 丁酉岁仲夏于蓉

步韵集古句怀晓波

故人零落已无多，  
阴晴圆缺任蹉跎。  
此地他年难再饮，  
亦复怀君旧琢磨。

—蔡楚

步谢诗韵咏刘晓波刘霞

相聚日少相思多，  
自由遥远久蹉跎。  
沉疴缠身人憔悴，  
泪书血字难消磨。

—白云乡人



## 挽联

作者：刘二安

黎明未至 神州待报晓  
壮士先亡 史册载余波



# 中国民主党主办

Sponsored by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 《在野党》杂志社

总编辑：朱虞夫  
社长：郑存柱  
出品人：景辉辰

### 荣誉主编：

毛庆祥（发起人） 谢长发（倡导人） 胡石根 陈西 吕耿松 查建国 陈树庆 许万平 刘贤斌 胡明君 黄燕明

### 副总编辑暨副社长：鲁慧文

副总编辑：彭小梅

轮值总编辑：黄吉洲

日本分社社长：漠北独侠 / 漠北孤侠

副主编：张致君 陆乾坤

编辑部：李聪玲（部长） 李晶（副部长） 钟然（副部长）

张娜（副部长） 胡丽莉 冯仍 王梦梦 周志刚 赵杰

李堃 韩立华 张宇 黄吉洲 胡景 Gloria

Wang Geoffrey Jin

收稿部：马群（部长） 彭小梅（常务副部长） 彭小亮 杨

长兵 田家元

校对部：冯仍（部长） 熊辩（副部长） 程筱筱（副部长）

王滨 孔祥庆 毛一炜

翻译部：彭小梅（部长） 吕峰（常务副部长） 周敏（副部长）

何兴强 戈冰 沈美花

美编部：胡海宁（部长） 阎梦菁（副部长） 刘敖（副部长）

宋佳航 傅贻红 张帆

采访部：缪青（副部长 - 旧金山记者站站长） 邢致远（副部

长） 胡向飞 陀先润 胡景 Rong 侯冰封 郝剑平

庄帆 贾嘉 韩震

宣发部：Gloria（部长） 彭硕（副部长） 曾群兰（副部长）

何愚（副部长） 夏体珊 黄吉洲 李延龙 程筱筱 张

晓丽 Rong 汪洋

信息技术部：卢新虎（部长） 卢超（副部长） 邢致远

李建伟 张湘潇 程筱筱 张荣鑫 姜俊良 吕峰

人权观察部：黄吉洲（部长） 张维清（副部长） 陈娟（副

部长） 何愚 老默

公关事务部：李享（部长） 王连江（副部长） 黄国安（副

部长） 宋娟华 翼超 张帅 刘乐源 蔡政

外联部：张致君（部长） 赵杰（副部长） 王海霞（副部长）

常坤 张俊杰 权录军 汪洋 Rong 史庆梅

财务部：朱晓娜（部长） 高晗（副部长） 朱小砚（出纳）

张致君

行政部：吕聪（部长） 张宇（副部长） 陈婷

法务部：陈闯创 郑存柱

### 投稿与联络方式

URL: www.ZYD1998.com  
Email: zaiyedang1998@gmail.com  
Tweet: @zaiyedang1998  
Address: 228 N Garfield Ave #202,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Telephone: +1-626-889-0419 (张致君)

### 亲爱的读者与战友们：

《在野党》是我们共同的火种，承载着无数中国民主志士二十七年来前仆后继的牺牲与期盼。这份刊物从1998年的呐喊中诞生，在铁蹄与暴力下中断，却从未泯灭我们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信念。今天，我们《在野党》重新出发，这不仅是一次杂志的复刊，更是为中国民主、人权与法治而战斗的庄严誓言！

一路走来，我们深知前方依然布满荆棘。但我们也更加明白，只要有您的支持，这盏希望之灯就能持续燃烧。您的每一份捐款，都将帮助我们支付杂志制作、印刷与发行费用，帮助我们搭建更加广阔的传播平台，也为我们调查迫害案例、组织采访交流提供有力保障，让《在野党》成为海内外民主力量集结的号角，让真相与呐喊直达世界各个角落。

历史的洪流正在前行，我们呼吁您与我们一起，不再沉默，不再退让！请扫描本页二维码，以 Zelle 捐款支持我们，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共同守望一份对自由的承诺、一份对正义的坚持、一份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您的善意将铭刻在《在野党》的史册中，您的力量也将成为中国民主进步最真实、最宝贵的见证！

如有国际合作与联系意向，也欢迎通过 zaiyedang1998@gmail.com 与我们取得联系！请关注我们的官方推特：@zaiyedang1998，与我们保持密切互动，共同见证并参与这场改变中国未来的努力！

抗共救国，我们是认真的！为了中国民主自由，我们更加坚定！

《在野党》杂志社 敬上



可直接转账到 Zelle 账号 zaiyedang20250625@gmail.com  
收款名称为：Opposition Party INC

### 《在野党》2026年6月接收的捐款信息如下：

| 捐款日期       | 捐款者姓名         | 捐款金额      | 捐款用途      |
|------------|---------------|-----------|-----------|
| 06.09.2026 | GUOJUN ZHU    | \$30.00   | 捐助杂志社     |
| 06.16.2026 | JINGHUI CHEN  | \$2000.00 | 捐助杂志社     |
| 06.22.2026 | ZHENG CAI     | \$100.00  | 定向捐助国内政治犯 |
| 06.24.2026 | FENGGE WANG   | \$1000.00 | 定向捐助徐光    |
| 06.25.2026 | XIAOLONG LIN  | \$200.00  | 周年活动经费    |
| 06.26.2026 | WEIQING ZHANG | \$100.00  | 定向捐助乌克兰   |
| 06.29.2026 | XIAONA ZHU    | \$300.00  | 定向捐助朱虞夫   |

## 幕 后 团 队

《在野党》并非在真空中完成。

从选题策划、内容编辑、事实核实与语言转换，到版式设计、校对、发布与长期维护，每一期的完成都依赖一支长期协作、分工明确的幕后团队。

团队成员分别承担文字编辑、资料核验、翻译协调以及版式与技术支持等工作。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出现在显眼位置，但正是这些持续、稳定的专业劳动，构成了杂志得以按期完成并保持质量的基础。

### 编辑与出版岗位分工说明：

#### 一、内容策划与选题统筹

由编辑团队共同完成选题方向的确立与内容结构规划，确保刊物在价值立场、主题连续性与公共讨论深度上的一致性，构成每一期内容生产的起点。

#### 二、记者与写作

由前线记者、特约作者及撰稿人员组成，负责采访、资料整理、事实核实与写作，为刊物提供第一手文本内容与信息来源。

#### 三、编辑与校对

由编辑团队对稿件进行结构性编辑与语言修订，并由校对人员对定稿内容进行文字、标点、事实与格式层面的复核，确保文本准确性、严谨性与出版一致性。

#### 四、翻译与语言支持

由翻译与语言支持人员负责中英文内容的互译与语言协调，确保各语言版本在语义、语气与信息完整性上的一致，为刊物的跨语言传播提供保障。

#### 五、版式设计 with 出版制作

由幕后制作团队完成刊物整体版式设计 with 出版制作工作，包括版式系统设定、页面结构规划、文字与图像编排、双语内容技术适配，以及印刷与数字版本的最终文件输出与校验。该环节承担将内容转化为可持续出版成品

#### 七、发行与传播支持

由相关支持人员协助完成刊物发布、传播渠道协调与读者反馈整理，使出版成果进入公共视野并形成持续影响。

## 荣 誉 墙



**鲁慧文**，中国民主党党员，《在野党》杂志社副总编辑暨副社长。星火相传，秉承前辈们艰苦奋斗的精神，2025年6月初接过复刊大旗并带领团队高效完成《在野党》第12期复刊，正式宣告《在野党》使命继续！

在具体工作中，她负责整个杂志社战略定位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跟进，负责整个项目团队流程的建立以确保团队的自发性运转，负责团队的整体战略布局、搭建，负责杂志社板块规划和运行，整体杂志社费用批示确保杂志社财务透明，杂志社宏观战略和为微观执行的全面负责。

用心、用爱、用一份责任去传承《在野党》的初心，让杂志社的创刊宗旨始终坚持下去，并通过轮岗制等方式使得团队成员得到成长并在任何不可控形势下确保杂志社得以健康运行。



**陆乾坤**，中国民主党党员，2022年11月因参与白纸运动遭受中共当局迫害，现任《在野党》杂志社副主编、中国民主党美南党部副主席。长期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积极参与海外民主事业，以文字记录时代，以行动践行信念，致力于传播民主、自由、人权理念，传承中国民主运动的精神薪火。

在《在野党》杂志复刊过程中，他积极参与整体策划与统筹工作，为杂志顺利复刊和持续出版贡献力量。现负责封底人物和民运同道栏目的策划与编辑，持续发掘民主运动中的代表人物、重要事件和民运组织的发展历程，以真实的记录致敬奋斗者，以鲜活的文字传承民主精神，让更多值得铭记的人物和历史被读者了解、被时代记住。

他相信，历史终将证明追求自由者的价值，文字终将留下时代的印记。愿以手中的笔和心中的信念，与所有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的人同行，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 吕耿鬆 (1956 - ) 中國民主黨人與自由精神的堅守者

他以筆為證，以身踐行，在漫長的歲月裏始終守護着對自由、民主與人權的信念。從講臺到書齋，從家庭到鐵窗，他為自己的理想付出了人生最寶貴的時光。一次次牢獄沒有擊垮信念，一次次打壓沒有改變初心。面對強權，他選擇堅持；面對遺忘，他選擇記錄。呂耿鬆不僅是一位長期堅守的民主黨人，更是一代中國公民追求自由與尊嚴的縮影。他的生命告訴世人：真正不可戰勝的，不是權力，而是人的良知與信念。

**歷史終將記住，每一個拒絕屈服的人。**

